

马来亚的反抗

1942—1945

罗武编著



海泉出版社

目次

马来亚的反抗

出版：海泉出版社

电话：〇·六六四七三七

承印：联兴印刷厂

九龙上乡道昌华工厂大厦七楼A座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定价港币九元

历史的补白（代序）	III
第一章 日本南侵的历史背景	1
一 当时的国际形势与马来亚的内部状况	1
二 英国的消极防御政策	7
第二章 马来亚攻防战的经过	11
一 英军兵败如山倒	11
二 保卫新加坡之战	16
三 新加坡的沦陷	28
第三章 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确立	31
一 成立马来军政监部	31
二 导演印度独立运动的丑剧	36
三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39
第四章 奋起抗敌的马来亚人民	47
一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诞生	47
二 马来亚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	58
三 抗日军在反扫荡中发展壮大	63
四 英军的反攻部署	101
第五章 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10
一 日寇投降和人民抗日军接管城镇	110
二 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	116

历史的补白(代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把“大东亚圣战”的战火引向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使这个地区的人民遭受一场空前的战争浩劫。在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之前，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一直坚持消极防御的方针，不愿意积极发动群众抗日，因而使得日军入侵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在日军的迅猛进攻之下，英国殖民政府的十五万大军以每天十英里的速度，大踏步地从北马向南马溃退，毫无招架之力。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连英国当局信以为固若金汤的新加坡要塞也被日军攻陷了，驻防军总司令白思华举旗投降，在英国的历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

新加坡沦陷后，马来亚人民开始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坚决拿起武器同凶狠残暴的日本占领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爱国者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用他们宝贵的生命换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可是，在战后出版的许多历史著作，对于马来亚人民反抗日寇军事占领的这一段史实却采取忌讳的态度，它们或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则只字不提，自欺欺人；有的甚至蓄意歪曲，散播谬论，极尽造谣污蔑的能事。这种不忠实的著述态度，在客观上造成了马来亚现代史上的一段“空白”，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

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尝试把被湮没了的历史事实重新显现出来，以填补这一段历史的空白，因而名之曰：《马来亚的反抗：1942—1945》。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多位当年荷戟沙场的老抗日军干部的热情协助和支持，提供宝贵的意见和补充资料，不胜感激，在此一并表示深忱的谢意。

作者识于一九八二年八月

第一章

日本南侵的历史背景

在我们叙述日本占领时期马来亚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和他们所进行的英勇卓绝的反抗之前，让我们先概括地检讨一下日寇入侵马来亚的历史背景。

一 当时的国际形势与马来亚的内部状况

首先谈谈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国际形势。

国际局势激烈动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制造了所谓芦沟桥事件，以此作为藉口，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战事爆发后，日本原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一举而鲸吞全中国，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武汉战役之后，它才发觉自己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的大部份兵力，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处在战略相

持阶段，日寇既无法征服全中国，中国人民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攻，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去。为了扭转在中国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日本认为必须截断英国人从南方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路线，使国民党政府陷于孤立，早日对日妥协，以恢复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的丰富自然资源如橡胶、石油、大米、锡等，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极想攫取它们来维持它的对华长期战争的需要。因此，从一九三九年起，日寇便积极部署南进计划。

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突然袭击波兰，两日后，英法两国政府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全面爆发。

大战爆发后，德国又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占领了荷兰和法国，威迫英伦三岛，在这种形势下，英国自顾不暇，更没有能力“保护”它在远东的殖民地了。加上这时美国国内孤立派又得势，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因此东南亚便成为西方势力的真空区域，这种形势更加助长了日寇南进的野心。

一九四〇年七月，日本的近卫文麿在军人势力的支持下再次上台组阁。他一上台就抛出所谓《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文件，宣称要“建立以帝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叫嚷要“在内外诸形势所允许的情况下，抓住良机行使武力”。接着外相松冈洋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声明，宣称要建立一个东起新西兰、西至印度、南到澳大利亚、北

达中国的大东亚殖民帝国，确立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同年九月，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它们妄图瓜分世界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纳粹军队又以闪电战方式突然进攻苏联，并在十二月五日推进到莫斯科郊外，切断了通往莫斯科的大部份铁路干线，被暂时的“胜利”假象冲昏了头脑的希特勒振臂狂呼：“苏联已经倒下去了！不能再站起来了！”

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实力派欣喜若狂，认为德苏战争解除了日本的后顾之忧，是南进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七月十二日，外相松冈向法国政府提出索取印度支那南部八个机场和享用西贡金兰湾海军基地的权利的强硬要求。同月二十三日，法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屈服，接受了上述要求，日军紧接着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占据了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扩张的桥头堡。战争是越来越迫近了。

十月十六日，近卫文麿的文官内阁辞职，成立了以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为首的战争内阁，至此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宣告完成。

在日本的南侵计划里，新加坡被列为是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原因是它不仅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而且又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只有夺取了新加坡，才能有效地控制马来半岛，并进一步占领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打开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

荣圈”的美梦。但是，日本军事当局又认为要确保南侵的军事行动成功，首先必须摧毁以夏威夷珍珠港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于是它一面假装同美国谈判，一面制订了突袭珍珠港的计划。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寇终于制造了珍珠港事变，南太平洋战争于是全面爆发。

另方面，让我们看看日寇发动侵略战争前夕马来亚的国内形势发展状况。

国内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由一九三四年起，马来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开始走向高涨。仅在一九三四年一年间，全国就爆发了三宗规模巨大的工潮。第一宗是在四月间爆发的一千八百名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这场斗争获得了新加坡以及全马各地其他行业工人的大力声援。第二宗是震撼全国的煤炭工人武装起义，愤怒的矿山工人占领了矿场，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与前来镇压的殖民地军警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战斗。第三宗就是新加坡水兵的抗英起义，这场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意义不凡，因为它反映了人民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反抗。

一九三五年，马来亚总工会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全马工人示威大游行。一九三六年，罢工浪潮更加汹涌澎湃，新加坡的清浩、运输、锯木、建筑等行业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在半岛各地还爆发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对殖民迫害的大罢工和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全马总罢工运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来亚华族群众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支援中国抗战。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陈嘉庚、侯西反等出面领导成立了“新加坡华

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以募捐、推销公债、招募机工回返中国服务、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战。次年十月，更有“南洋华侨筹赈会”的成立，以划一东南亚各地筹赈会的活动步伐，于是抗日救亡运动一时如火如荼，遍布东南亚和全马各地。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马来亚共产党也积极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各种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如工友会、互助会、读书会等，同时也组织一些半公开的团体，如华侨各界（分工、学、文、青、妇等）抗敌后援会，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英国当局的对日“绥靖”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形势的向前发展。

在这一年内，马来亚的工人运动更加高涨，仅在新加坡一地，就发生了三百二十七宗罢工事件，不过，情形最为严重的是雪兰莪州的加影树胶园工潮，参加斗争的工人达一万余人。另外，在当年年杪发生的峇株巴辖铁矿工人和甘马挽铁矿工人的反日政治罢工，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峇株巴辖铁矿是由日资创建的大型铁矿场，八百余名矿场工人在十二月八日举行集体停工，表示抗议日寇侵略中国；接着丁加奴州甘马挽附近的日资铁矿华工一百余人，也在同月十四日举行集体停工，表示抗议。这些斗争说明了当时马来亚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

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新加坡华印两族人民群众数千人为了响应英属印度政府所发出的“印度中国日”的号召，在克罗福码头集会，募集义款赈济中国伤兵和难民。集会结束后，群众列队举行反日大游行，情绪激昂，但是英国殖民当局竟然以游行队伍违法为名，实行暴力镇压，拘捕了群众一百五十多人。六月廿六日，又有新加坡华族

群众数千人结队游行，表示拥护英伦人民反对日机滥炸广州，结果又有三十人被拘控。八月，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与辜俊英等“四君子”被辅政司下令拘捕，爰引出境令递解出境。

在英国殖民政府的镇压下，马来亚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期间，马来亚工人阶级的反剥削和反压迫的斗争仍然继续向前发展。新加坡的电车工人、倒粪工人、人力车夫、建筑工人、海港局工人，柔佛新山的黄梨工人、森美兰马口的树胶工人、彭亨劳勿的锡矿工人、丁加奴龙运的铁矿工人、雪兰莪煤炭山的煤矿工人、新街场的锡矿工人、加影的树胶工人、霹雳近打的锡矿工人、梹城的码头工人等，都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一九四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加坡五万工人和人民群众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反殖反法西斯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华族群众运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结合影响下，马来知识份子也开始觉醒和组织起来。一九三七年，一批先进的马来知识份子开始组织了全国第一个马来民族的左翼政党——马来青年联合会，并出版报纸，进行反英宣传。这个政党的领袖大多数来自基层人民，受到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斗争的深刻影响，他们提出保护马来人的权益，反对马来贵族和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的口号，主张把马来半岛归并入印度尼西亚的版图中去，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份。它的主要领导人是依不拉欣·耶谷和依萨·莫罕默德。但是他们的活动刚一抬头，就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一九四〇

年，英国殖民政府爰引防卫条例，逮捕了该党的全部领导人和会员共计一百五十人，并宣布该党为非法政党。

英国殖民政府的这些压制抗日和反殖运动的措施，使进步力量的发展遭遇一定的阻力，也使得马来亚各族人民不能在日寇入侵之前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二 英国的消极防御政策

英国对于马来亚的防务问题，素来采取消极的态度，这是和它对日寇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分不开的。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鼓励日本北进，把矛头指向苏联，而不要南进，以免它在华南地区的巨大投资和它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殖民地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日寇当局也看透了英国的这个用心，因此每当它的进一步南进引起英国的抗议时，它便同时做出一种北进的姿态，以麻痹英美等国的警惕性，转移世界舆论的注意力。

英国对于马来亚防务的这种冷漠态度，只有等到法国沦亡后才开始有所改变，因为这时整个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已经属于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瓜分世界的危险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英国开始着手对它在远东的殖民地采取一些必要的防卫措施。

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刻，它所选择的仍然是传统的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即从英国本土以及它的属地调遣军队来防卫马来亚，而不是动员马来亚本身的人力物力来抗

击可能的入侵。就这注定了英军日后要吃败仗的命运！

当时英国在马来亚只有少量的驻军和两个马来步兵营，此外它在新加坡、檳榔嶼和马六甲三个海峡殖民地还各有一支由“海峡华人”组成的义勇军连队，每队的实力大约是一百二十人左右。单凭这样薄弱的力量是显然不足以抵御日军的入侵的。于是在一九四〇年，英国政府一面委任空军元帅波樊为远东英军总司令，开始增派军队驻防马来亚，一面又在马来亚实施强迫服役法令，征召所有英籍男子和海峡出生的男性居民参加义勇军。同年七月，它又着手组织一支纯粹由欧籍男子组成的所谓地方自卫团。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把所谓防卫马来亚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由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抽调来的雇佣军身上，它始终不愿意武装马来亚的三大民族，依靠马来亚人民的力量来抵御外侮。

一九四一年初，英国政府又决定在远东设立一个名叫“特别行动执行组”的机构，以制订应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策略，一个以基尔勒里为首的英国武官核心小组，在四、五月间秘密抵达新加坡。同年七月，他们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中心，叫做“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为当地的一些英国人和经过挑选的马来亚平民提供军事训练，以便一旦战事爆发后，可以派遣他们潜入敌后从事破坏活动。这个学校的校址设在新加坡西海岸，训育长是斯宾塞·查普曼。

尽管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马来亚的防卫问题，但是它仍然低估日寇立即进攻马来亚的可能性。在战事发生前的两个多月，即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英国在新加坡

召开了一次高级军政官员会议，检讨远东的局势，主持会议的是奉命前来调查远东局势的英国内阁情报部长库伯，参加会议的有远东英军总司令波樊，驻中国空军总司令莱敦、海峡殖民地总督兼驻马来联邦钦差大臣汤姆士、驻华大使、驻曼谷公使和澳大利亚驻英国战时内阁特使等人。会议认为新加坡海军基地面临日本军事威胁这一件事有过份夸大之嫌，因为当时日本正在集中力量应付苏联，无力南进，而且在从十月份开始的东北季候风期间，马来亚东海岸波浪滔天，日军是不可能登陆的。另方面，即使是英国首相邱吉尔本人也是抱着这种乐观态度的，他在十月二十六日对澳大利亚首相说：“我想在德国击垮苏俄之前，日本是绝对不敢点燃战火的。”不过，为着增强抑制日本的军事扩张的力量起见，英国仍然决定派遣战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到远东去。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军政当局的这些过份乐观的估计都是毫无根据的。

在日寇入侵马来亚前夕，英国一共从印度和澳大利亚两地调遣了三个师的兵力来增防马来亚。到了战事发生后，又有四万援军开到，总共有兵力十万之众。在空军方面，开战前共有飞机一百二十一架，开战后又有二百五十架驰来增援，共计三百余架，实力颇为强大。

但是，直到日寇入侵为止，英国当局对于马来亚人民的抗日要求始终采取漠视的态度。它拒绝当时全马唯一的政党马来亚共产党所反覆提出的合作抗日的要求，并继续查禁它们的活动。它也禁止工人组织合法工会，使另一个可以动员群众的渠道遭到堵塞。更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当时马来亚的二百二十二万华人当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日热忱，

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却一再遭到强力的压制，许多进步人士被拘捕，甚至被递解出境，即使是中国国民党的开明份子也不例外，例如筹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侯西反的被递解出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侯西反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被珊顿总督下令驱逐出境，理由是他组织了一个由星华筹赈会秘密领导的非法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且跟抗敌后援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他在九月间成功地调解了星华社会的两个敌对的私会党派系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他被驱逐出境的罪名之一，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了。其实，珊顿总督的主要忧虑是：华人的波澜壮阔的反日运动，“很可能改变成排日与抗英的运动”，因此他必须对抗日宣传运动实行压制的政策，以免失去控制。当时被捕的抗日份子还有共产党人林江石、杨果、陈锡清等。林江石在法庭上曾经不顾法官的阻挠，公开阐明马共的联合抗日主张，呼吁英国当局改弦易辙，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件。杨果、陈锡清等则于一九四一年底被驱逐出境，但是他们所乘坐的轮船在开往中国的途中正遇上太平洋战事的爆发，因而不得不折返新加坡。

英国政府的这种压制华人抗日的短视政策，终于为它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的倾覆种下了恶因。

第二章

马来亚攻防战的经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穷兵黩武的日本法西斯当局终于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同时进攻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和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等地。当天凌晨，日本十八师团在马来亚东北部的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峇鲁附近登陆，同时出动空军，大规模轰炸新加坡，一场帝国主义强加给马来亚人民的战争终于爆发了，马来亚人民从此经历着一场为时长达三年八个月的战争浩劫的考验。

一 英军兵败如山倒

制空权和制海权迅速丧失 当天晚上，大约七百名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占领了哥打峇鲁郊区的飞机场。当时负责驻守哥打峇鲁的是印军第三军第九师第八旅，这支豆腐军队在敌军的闪电袭击下，吓得魂飞魄散，立即仓皇放弃机场，并且紧接着退出了哥打峇鲁市，沿着南下的

公路一口气跑了大约三十英里，直到瓜拉吉来才停了下来。第二天，日本陆军航空队进驻哥打峇鲁，把机场略加修理后，就利用它作为航空基地，迅速取得了北马的制空权。

另一方面，日军的主力部队第五师团也在十二月八日凌晨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两地登陆。由宋卡登陆的日军取道合艾攻入吉打，由北大年登陆的日军则向北霹雳推进。当天下午二时，印军第十一师的两个营，曾经由霹雳边境的高乌镇越境进入暹罗，准备阻遏日军的前进，但是他们在十二月十日在勿洞镇以北二十一英里的地方，被日军所击败，立即撤回高乌，再由高乌向西撤退至吉打，向驻守吉打的英军主力部队靠拢。

在日军登陆成功后的第二天，英国军政当局所吹嘘的“不沉之舰”——巨型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巡洋舰击退号，就在关丹以东海面被日军航空战队所击沉了，指挥官菲立斯海军中将殉职，消息传开后，英军士气大受打击。这两艘军舰的被击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出航时没有空军的掩护。它们的被击沉，使英军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丧失了制海权。

日得拉防线的崩溃 经合艾向吉打推进的日军，于十二月十日到达马来亚的边境地区。负责防守这一方面的是印军第十一师的主力部队，其防线的布置是以日得拉为中心，左翼伸展至海岸，右翼则依靠着森林的丘陵地带，到处布满炮兵阵地。这条防线全长大约二十五英里，当时英军曾夸称它是“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以为至少可以固守三个月之久，但是谁知道在战事发生后，这个阵地竟在一

日之内就被日军攻陷了，真是始料所不及的事！在此役中，英军旅长加勒特还挂了彩。

十三日，日军占领吉打州首府阿罗士打，英军总撤退到牛仑，十五日，日军前锋进攻牛仑，印军第六旅又再吃败仗，旅长幸而逃脱，但丢失辎重无数。十六日，英军放弃双溪大年。

由日得拉防线退却的英军主力，决定沿着吉连河布防，扼守司南马镇，阻止日军的南下。十二月二十日，日军一面进攻吉连河英军阵地，一面由宜力路沿霹雳河向南推进，威胁太平镇。吉连河英军主力唯恐后路被截断，急由司南马撤退，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退到江沙一带，扼守霹雳河。日军于同日进占太平镇。

为了突破霹雳河英军的防线，日方特地调动担任后备任务的近卫师团的一部份兵力协助第五师团作战。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开始激战，至二十五日晚上，日军终于强渡霹雳河，威胁英军的后路，并于二十六日占领马来亚第四大城市怡保。英军恐受日军包围，又再撤退至怡保以南的金宝镇。

日军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经过霹雳河战役之后，分兵两路：第五师团主力沿公路南下，近卫师团则在海岸方面活动，互相策应。十二月三十日，日军一方面猛攻金宝，一方面在勿南河附近登陆，直取安顺，威胁金宝的后方，同时另有一支日军渡过金宝西面的近打河，威胁金宝的侧翼，形成三面夹攻的形势，印军第三军团司令禧斯大起恐慌，立即下令放弃金宝，退守仕林河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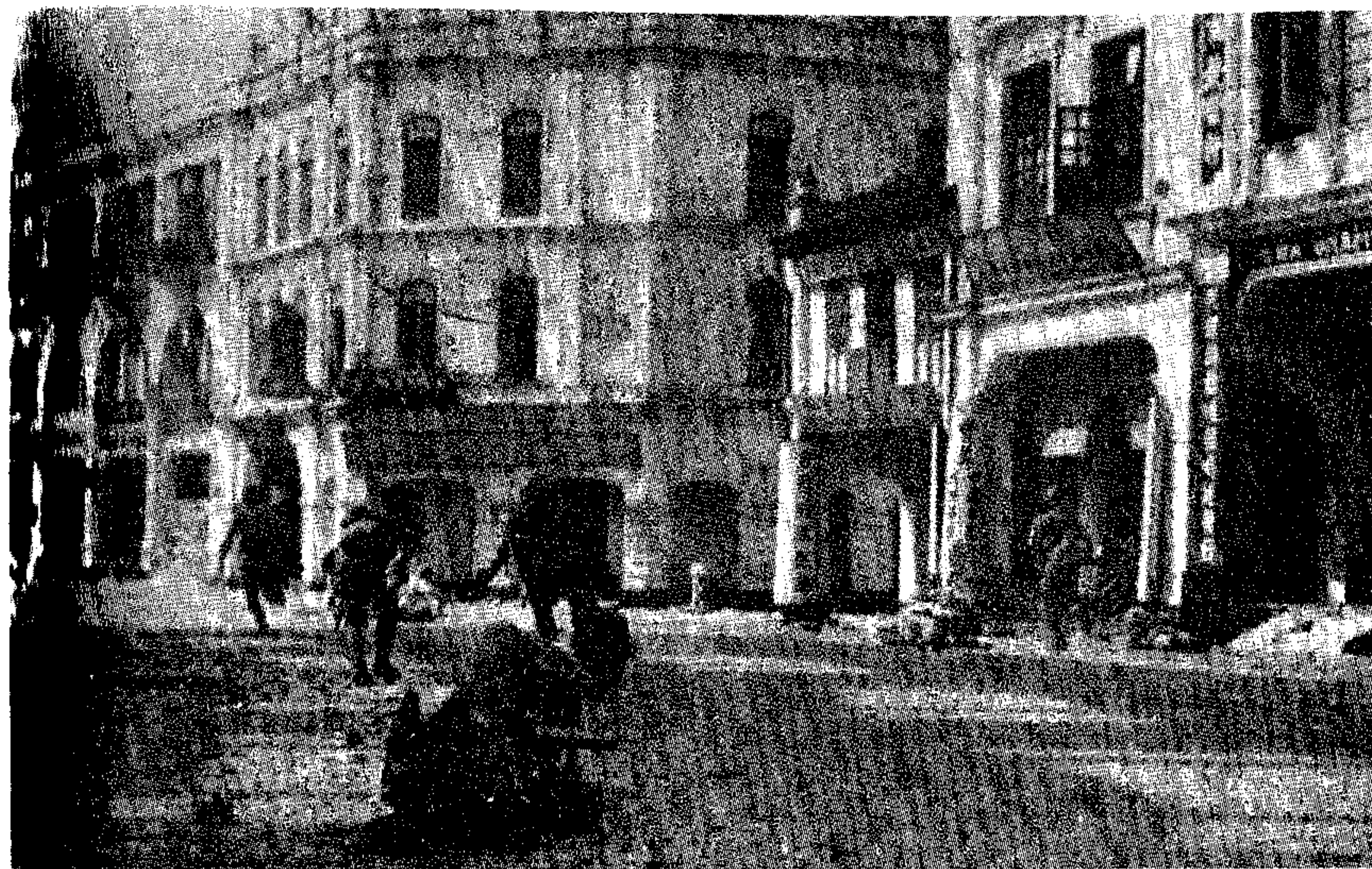
在东海岸方面，日军第十八师团在攻陷哥打峇鲁之后

，曾经一度沿着公路线和铁路线南下，但是他们到达瓜拉吉来之后，却折向海岸，穿过人烟稀少的丁加奴州沿海地区，直取东海岸的重镇关丹。驻守关丹的是印军第三军团第九师第二十二旅。十二月二十日，马来亚英军陆军总司令白思华鉴于驰援上的困难，下令放弃关丹镇。十二月三十一日，日军兵不血刃，顺利进占关丹。

仕林河坦克战 在仕林河战役中，日军又重施故技，派遣一支海上机动部队由邦咯岛出发，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在瓜拉雪兰莪附近登陆，另一方面，日军主攻部队则于五日推进到仕林河北面大约十英里的地方。六日，双方在勿南河一带进行坦克战，结果英军受挫。九日，在瓜拉雪兰莪登陆的日军开始进攻吉隆坡，使英军再次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英军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立即一口气从仕林河撤退到了森、柔两州交界处的金马士镇。吉隆坡于一月十一日沦陷，紧接着，芙蓉、马六甲等大城镇也相继沦陷。

战局至此，马来亚的半壁山河已经陷落于日本法西斯的手中。为了挽救败局，英军最高指挥当局决定在柔佛州重新部署防线，但是为时已晚矣。一月十五日，日军开始进攻金马士，并以空军配合作战，猛炸澳军阵地，澳军被迫向后退却。十六日，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在蔴坡登陆，猛攻印军第四十五旅，同时又在峇株巴辖附近登陆，围攻英军第十八师一旅。这两支新近开到马来亚战场的增援部队，更是不堪一击，伤亡异常惨重，尤其是印军第四十五旅，几乎全军覆没。

日军在蔴坡击溃印军第四十五旅后，意图渡过蔴河，



日军攻入吉隆坡市区的情景

向永平进军。这时驻守金马士前线的澳军唯恐永平有失，并且担心日本空军炸毁昔加末桥，截断退路，使澳军成为瓮中之鳖，于是连忙漏夜撤军，抢渡昔加末桥。一月二十日，柔佛州东岸的兴楼镇失守。二十五日，白思华在冷金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于一月三十日之前将英军全部撤退至新加坡，坚守孤岛。

一月三十一日，当最后一批英军渡过星柔长堤，退入新加坡岛之后，英国军事当局就以地雷炸毁了长堤，切断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之间的唯一交通纽带。至此，所谓马来亚之战宣告悲剧结束，新加坡保卫战即将开始。战后澳军第八师司令官孟纳少将曾经写了一本名叫《新加坡失陷的原因》的书，回忆这场战争的经过。他在书中说了一段精彩

绝伦的话，特录在此以飨读者：“整个战役似乎是不可置信的：五十五天撤退了五百五十英里，被仅仅两师的日军压退，这一支日本小军队乘坐劫夺而来的脚踏车，没有大炮的帮助。”这就是当时马来亚战场的一幅生动而又真实的写照。



日军利用掠夺而得的单车追击英军

二 保卫新加坡之战

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成立 当日军的铁蹄踏上马来亚的时候，马来亚共产党就向全国人民发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号召，并且致函新加坡总督

汤姆士，建议合作抗日。富有战斗传统的新加坡工人阶级首先响应了这个伟大号召，八大工团* 在十二月十日发表联合宣言，坚决主张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与此同时，全马舆论界也纷纷表示愿意协助英国殖民政府抗战，甚至远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这时也向英国大使表示，如果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的话，它将会命令华侨与英国协力抗日，这时，马来亚全国上下正在开始出现一个各党各派敌忾同仇的局面。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战争形势，英国殖民政府终于决定接受马来亚共产党所提出的合作抗日的建议，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新加坡跟马共代表进行了秘密接触，参加接触的共产党代表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莱特，另一名代表的身份未详，而英殖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则是政治部的两名华裔警官和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的负责人查普曼上校。会谈的结果是：英国殖民当局同意无条件释放被关押在马来亚各州监狱里的近两百名马共干部和党员，并且同意让共产党所选派的党员到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去接受游击战训练，而马共方面则答应党员在受训完毕后，接受英国军事当局的派遣，前往敌后发动游击战争，配合英军抗日。

十二月二十日，英国殖民当局释放了全马各地的共产党人和抗日份子，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林江石、杨果、黄耶鲁、陈锡清等。同日，马共所选派的第一批党员

* 八大工团是：新加坡火锯联合会、货仓工友会、米业运输工友互助社、驳业工友联合会、石业工人联合会、华人司机互助会、码头工友互助会、人力车工友互助会。

和干部开始在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当时被选派参加训练的共产党人共有一百六十五名，他们分批接受为期大约两个星期的训练。这些学员受训完毕后，就被派到马来半岛的森林内，从事敌后破坏活动。第一批被派往雪兰莪，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则因北上的交通断绝而滞留在森美兰、柔佛北部和柔佛南部等地区。他们后来成为马共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的主要军事干部。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的一部份教官，包括训育长查普曼在内，也跟随这些学员进入内地森林，作为日后英军国事当局与马共之间的联系桥梁。

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十分危急的时刻，英国殖民当局还是不考虑武装马来族人民群众的，因为他们怀疑马来民族在他们的封建统治者投靠了日寇之后，是否还会坚持战斗下去。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英国殖民政府唯一可以信赖和利用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盟友，却只剩下被他们目为“外侨”的华族居民，和被他们目为最危险的敌人的共产党人而已，这也许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声明，宣布它将竭力团结马来亚的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并协助英国殖民当局保卫马来亚，它也宣布将武装全体党员和民众，发动全面抗战，消灭第五纵队份子，并在敌占区组织秘密游击小组，展开全面的破坏活动，以反抗日寇的占领。

另方面，新加坡总督汤姆士也派遣官员跟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陈嘉庚接触，要求后者出面领导华人抗敌，以应付迫在眉睫的保卫新加坡的战斗。十二月二十八日，陈嘉

庚和华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二百余人应邀出席了汤姆士在总督府所召开的会议，共商抗日大计，其中包括甫从监狱中获得释放出来的共产党人林江石、黄耶鲁、林亚当等人。十二月三十日，新加坡华族各界代表集会于中华总商会会所，正式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到会的有闽、粤、潮、客、琼各帮社会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工人、学生、店员等各界代表，济济一堂，马共则派出以林江石为首的十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国民党代表和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等也参加了大会，显现了一派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热烈局面。“抗敌动员总会”的领导层成员不仅包括了华族社会的各界份子，而且包括了在政治上相互对立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成立“保卫团”和“劳工服务团”等议案。之后，共产党代表黄耶鲁又在会上提出“武装民众”的议案，但是遭到大会主席陈嘉庚的阻止。陈嘉庚认为大会的主要议案只是讨论和接受总督所提出的三项任务而已。但是由于参加大会的代表抗日情绪非常高涨，赞成武装民众意见的人数居大多数，黄耶鲁的动议终于获得通过。

十二月三十一日，抗敌动员总会又假总商会推举各股主任及委员，并决定设立办事处于武吉巴梭路晋江会馆。兹将各部主任名单抄录如下：

主席：陈嘉庚

总务部主任：叶玉堆 副主任：刘玉水

劳工服务部主任：林谋盛 副主任：刘牡丹

保卫团主任：郑古悦 副主任：黄奕欢、陈锡清

民众武装主任：林江石 副主任：姓名不详

宣传部主任：胡愈之 副主任：唐伯涛、邵宗汉

抗敌动员热火朝天 抗敌动员总会成立后，就积极开展抗敌动员工作。劳工服务部应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委托，大量招募华族劳工，以供政府调配使用，平均每日达二千至三千人，工资悉由殖民政府支付。保卫团则由市区及住宅区内的居民挑选组成，每街道设站岗一处至三处，由团员轮流守卫，其任务除了维持治安外，还担负防空及救护等工作，人数约为三千。民众武装部所招募的星华义勇军，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报名的人数就已高达三千人，其后陆续增加至近万名。与此同时，柔佛州的数万名橡胶园工人和黄梨种植园工人也坚决表示要同义勇军配合作战，打击日寇侵略者。

一月下旬，马共新加坡市委集中了第一批应征入伍的党员约六十人，在巴耶礼峇区某华文小学内开会，中央军委刘文到会作了关于党员入伍的指示，号召党员要成为义勇军的作战模范，并指定第二批获释的共产党员罗须磨、陈水鸭、林潮三人为义勇军三个连队的党代表。马共总书记莱特到场讲了话。一月三十日，英军炸毁柔佛长堤，新加坡防卫战更是迫在眉睫了。

二月一日，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大势危殆，终于决定给星华义勇军发放枪支弹药，并宣布给予义勇军战士和英军平等的待遇。星华义勇军在这一天正式编制，实力为一千三百人，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司令官是原任副警察总监的英国人打理少校，副司令官是星洲日报编辑胡铁君少校。但是他们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领到的只是一千支十九世纪的旧式步枪和平均每人十五发的子弹而

已。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英国殖民当局即使是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也还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不愿意真心实意地武装人民抗日的。

据副司令官胡铁君后来的记述，星华义勇军的组织是以团为本位，“团以下是连，连之下是排，排之下是班。每班十四人，每三班是一排。每三排是一连。连的战斗员约一百三十四人，加上指挥官、勤务员、炊事兵，大约是一百五十人。总共司令部统辖八个连。总司令官亦即是团长。……正连长是英国人，副连长都是华人，不过这里加了一个翻译员。”*

星华义勇军的军装为蓝色制服，左臂上有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头缠黄巾。读者可能要问：星华义勇军为什么要头缠黄巾呢？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新加坡找不到钢盔及其他军帽的缘故！

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马共第一次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权利。新加坡市委每日派出宣传队，分赴市内各处作街头宣传鼓动工作，民众武装部也利用新加坡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作动员广播。另一方面，一批从中国南来的进步知识份子如胡愈之、王任叔、郁达夫、杨骚等人也在十二月下旬假爱同学校召开全星文化教育界座谈会，讨论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事宜。座谈会即席选举郁达夫为文工团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并议决成立战工人员干部训练班和组织歌咏宣传队。青干班一共招收了两批学员，正式开课时间是在一九四二年正月下旬，地点是在金炎律

* 胡铁君撰：《致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白克登公开信》。

南侨师范学校，目的是训练青年政工人员，以便在星华义勇军内部执行政训工作。他们积极进行文字、漫画以及口头宣传。在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新加坡各阶层人民群众都积极投入抗日行列，挖壕筑防、锄奸捉特，捐款捐物，霎时间全市掀起了一片武装抗日的热潮，人民群众个个斗志昂扬，准备跟敌人决一死战，此种情景恰和垂头丧气的英军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星华义勇军浴血奋战 二月一日，日本陆军航空队对新加坡作第五十六次轰炸。英国殖民当局在同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报告说，军港船坞已经自动凿沉。二月三日，抗敌动员总会上层领导人物陈嘉庚、刘玉水等人鉴于局势严重，纷纷乘搭小船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抗敌动员总会这时实际上只剩下了共产党人林江石、陈锡清等坐镇指挥。在日机的日夜空袭之下，新加坡的局面一片混乱，所有的政府机构都陷于瘫痪状态，只有抗敌动员总会实际上行使着战时政府的职能。当天，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新加坡的主要粮仓之一丹絨巴葛货仓中弹燃烧，三百多名义勇军战士在接到抢救命令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冲入炽热的火海之中，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在抢救之际，敌机又来轰炸，结果，这一役义勇军牺牲了三名战士，伤五、六十人。

二月四日，日军在柔佛海峡北岸安装大炮，开始大规模炮轰新加坡。战事告急。义勇军第一连奉命出发防守新山长堤一带。出发之前，义勇军总部召开誓师大会，由林江石向全体义勇军作动员讲话，此外，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也作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谈话，以鼓舞士气。连队党代表罗

须磨代表全连战士致了答词。之后，全连战士就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战场。他们一上前线，就击毙了日军海上巡逻队员数名，并且击沉敌人橡皮艇数艘，取得显赫的战绩。五日，义勇军第二、第三和第四各连陆续出发，防守裕廊十八碑、林厝港十九碑半、巴丝班让十三碑和后港、樟宜等地区。

当时日军实行的是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表面上集中炮轰新加坡东北部樟宜一带，骨子里却部署在西北部登陆。二月七日，日军甚至进一步占领了柔佛海峡东部的乌敏岛，藉此转移英国军事当局的注意力。在二月五日到二月七日期间，防守裕廊和林厝港一带的义勇军战士曾经巧妙地伏击敌人，全歼敌人橡皮艇三十多艘，打沉日艇三艘，有力地阻击了日军的登陆企图，为新加坡保卫战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显示了人民武装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二月八日，新加坡几乎整日受到日军的炮轰，特别是从傍晚起，炮声更加频密和激烈，预示着日军的总攻即将开始。深夜十一时，炮声突告沉寂下来，至十二时十分，日军即发动全线进攻，开始强渡星柔海峡。日军进攻新加坡的战略部署，仍以第五师团担任中路，由长堤的西面登陆，以在马来半岛东海岸作战的第十八师团担任西路，协助中路的进攻，这两路日军都是在八日深夜强渡海峡的。近卫师团则担任长堤正面及长堤以东的进攻路线，此时还在待机未动。

日军在新加坡西北岸登陆后，立即遭到星华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义勇军战士虽然只经过短促的训练，而且装备简陋，但是负责防守裕廊路一带的星华义勇军第二连战士

却斗志旺盛，极力协助防守该线的澳军第廿二旅作战，痛歼来犯之敌。他们奋战了整整一昼夜，死伤甚重。二月九日破晓，日军推进到丁加机场附近。英军在这一带抵抗至晚上七时，机场终于失陷，于是退守格兰芝河与裕廊河。日军第十八师团司令牟田口这一天在前线负伤。

二月十日，日军渡过格兰芝河，战局急转直下，星华义勇军被迫和英军一道退守武吉知马防线。另一方面，近卫师团也于二月九日晚到十日晨渡过海峡，向实里达机场展开进攻。武吉知马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制高点，控制着主要公路的交叉处，而且在它的东面掩蔽处还设置着粮食，汽油和弹药仓库。为了加强这条防线的防卫力量，驻守巴西班让和樟宜一带的义勇军，立即奉命驰援武吉知马防线。二月十一日，武吉知马争夺战在白热化中进行，东部日军朝淡申路附近的蓄水池南下，中路日军则进攻武吉知马的英军阵地。十二日，英军在武吉知马村反攻失败，敌军各路继续向市区推进。十三日，武吉知马附近的英军阵地被日军坦克突破，一部份退到淡申路，而淡申路附近的蓄水池的防军也被迫向市区方向退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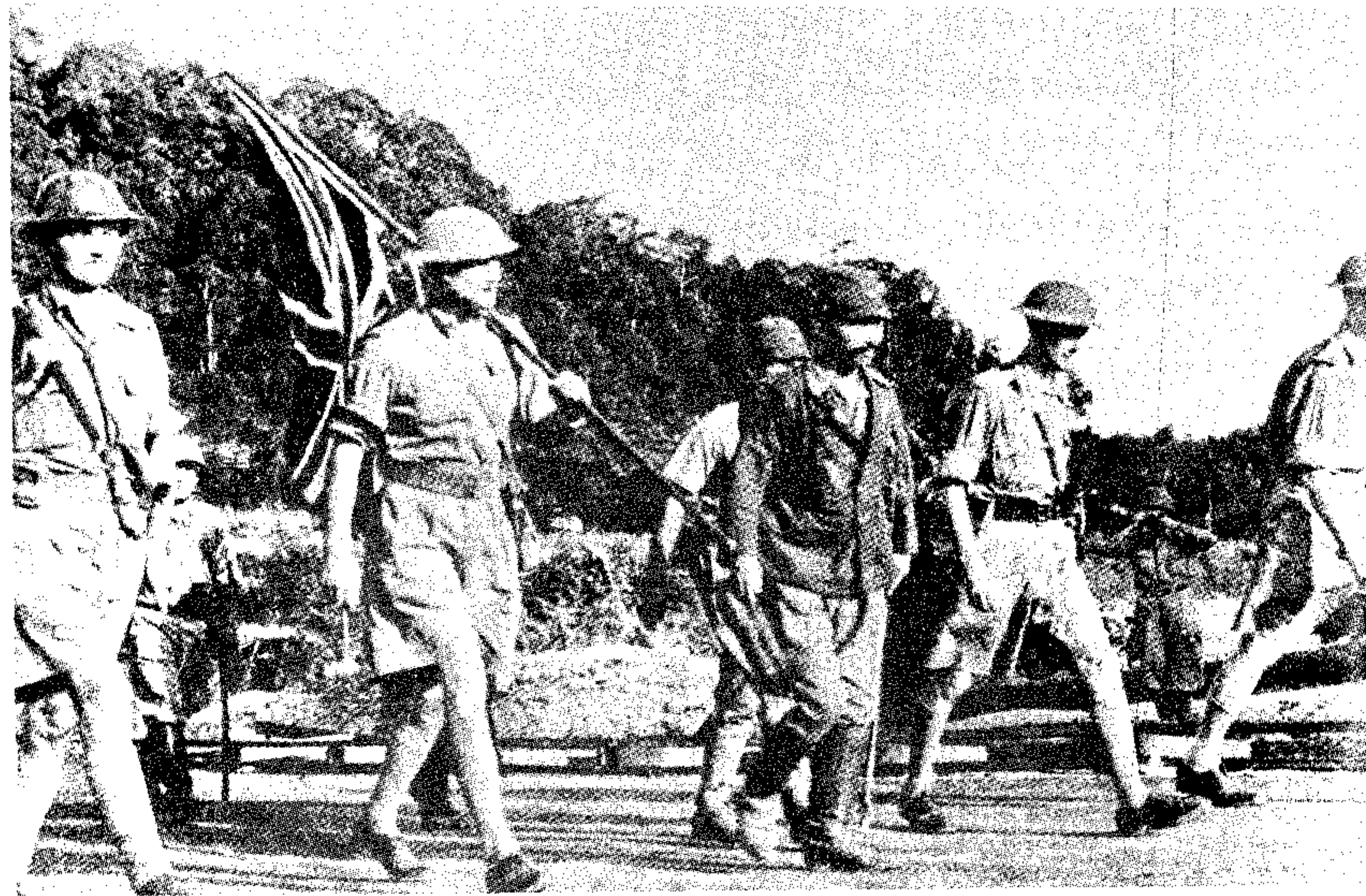
然而，正当新加坡人民的英雄战士在前线日以继夜地奋勇杀敌的时候，被日军的炮火吓破了胆的英军将领却在积极地进行投降部署。十二日上午，英陆军总司令白思华在康宁炮台召集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出席的各军将领都垂头丧气，认为不能再战下去，白思华于是拍电报到万隆给远东英军总司令魏伐尔，提议向日军投降。但是魏伐尔却覆电说：“不准投降，必须战至最后！”魏伐尔之所以作出这样坚决的答覆，原因是他在两天前还刚接到

英国首相邱吉尔的电报，指示他：“这一战必须以全力打到底。”邱吉尔的电报是这样说的：

“帝国参谋总部向内阁报告：驻守新加坡的白思华将军拥有十万军队，其中三千名为英军，一万七千名为澳军。内阁对进攻马来亚的日军是否也有十万人，表示怀疑。守军在人数上比进攻者为多，他们应可将侵略者击退。如果打得出色，在现阶段勿考虑挽救军队及居民的生命。这一战必须全力打到底。第十八师应可名留青史，司令官及高级军官，应同其部下一同殉职。英帝国及英军的荣誉，均在此一战。”

可是，绝望的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却没有“全力打到底”的决心，更没有“同其部下一同殉职”的勇气。英国军事当局在当天决定撤退军政人员，烧毁纸币，爆炸油库，并且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为屈膝投降作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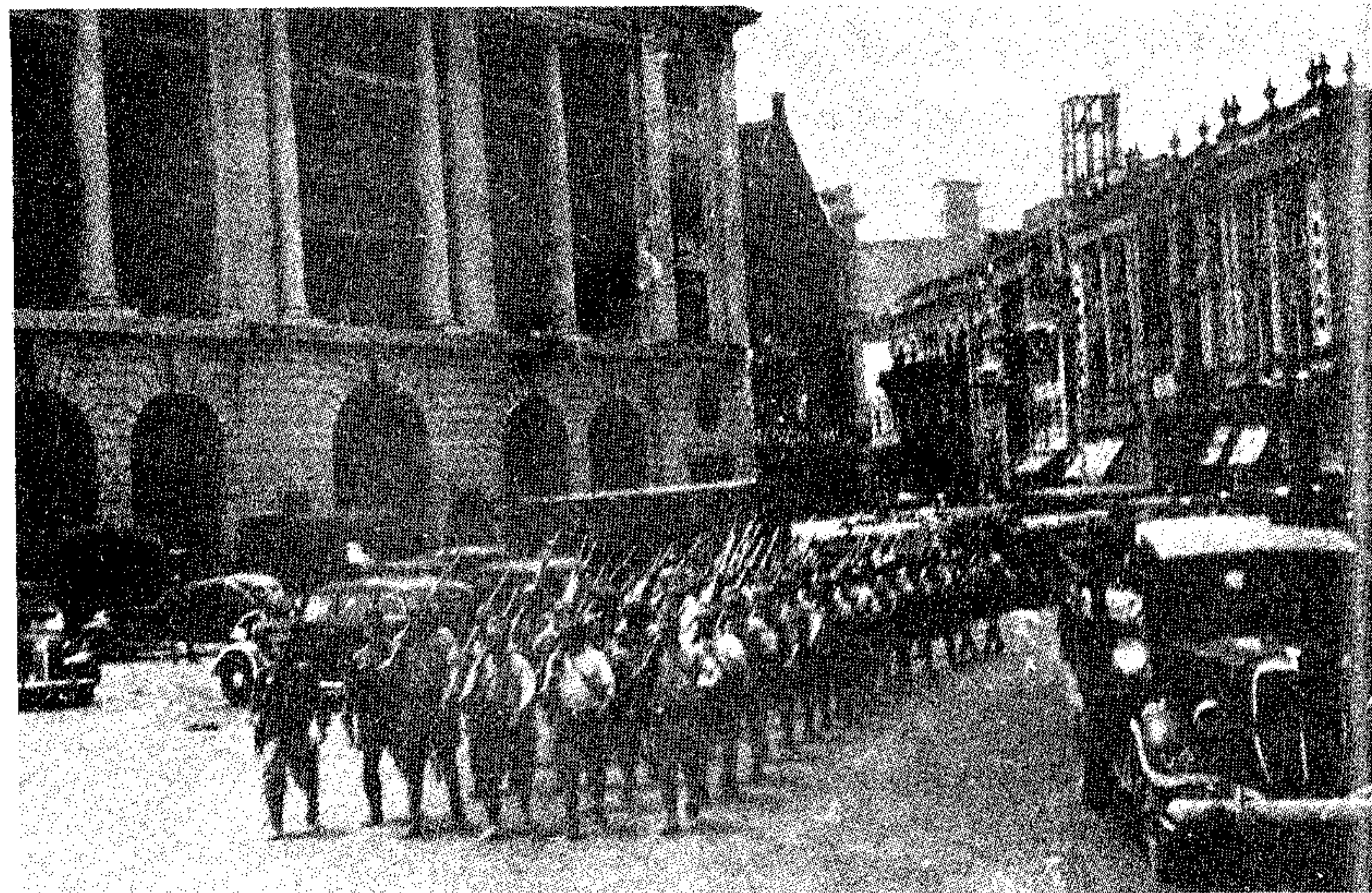
在捍卫新加坡的战斗中，星华义勇军的一千三百名壮士以血肉之躯在裕廊前线和武吉知马山头苦战十一昼夜，有力地阻击了敌寇的进攻，为保卫新加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马来亚历史上写下了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页可歌可泣的篇章！星华义勇军虽然在新加坡沦陷前夕被英国军政当局强令解散了，但是它的许多优秀队员后来陆续转移到马来半岛的内地去，加入新生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继续在山林溪谷和原野农村中，与日寇血战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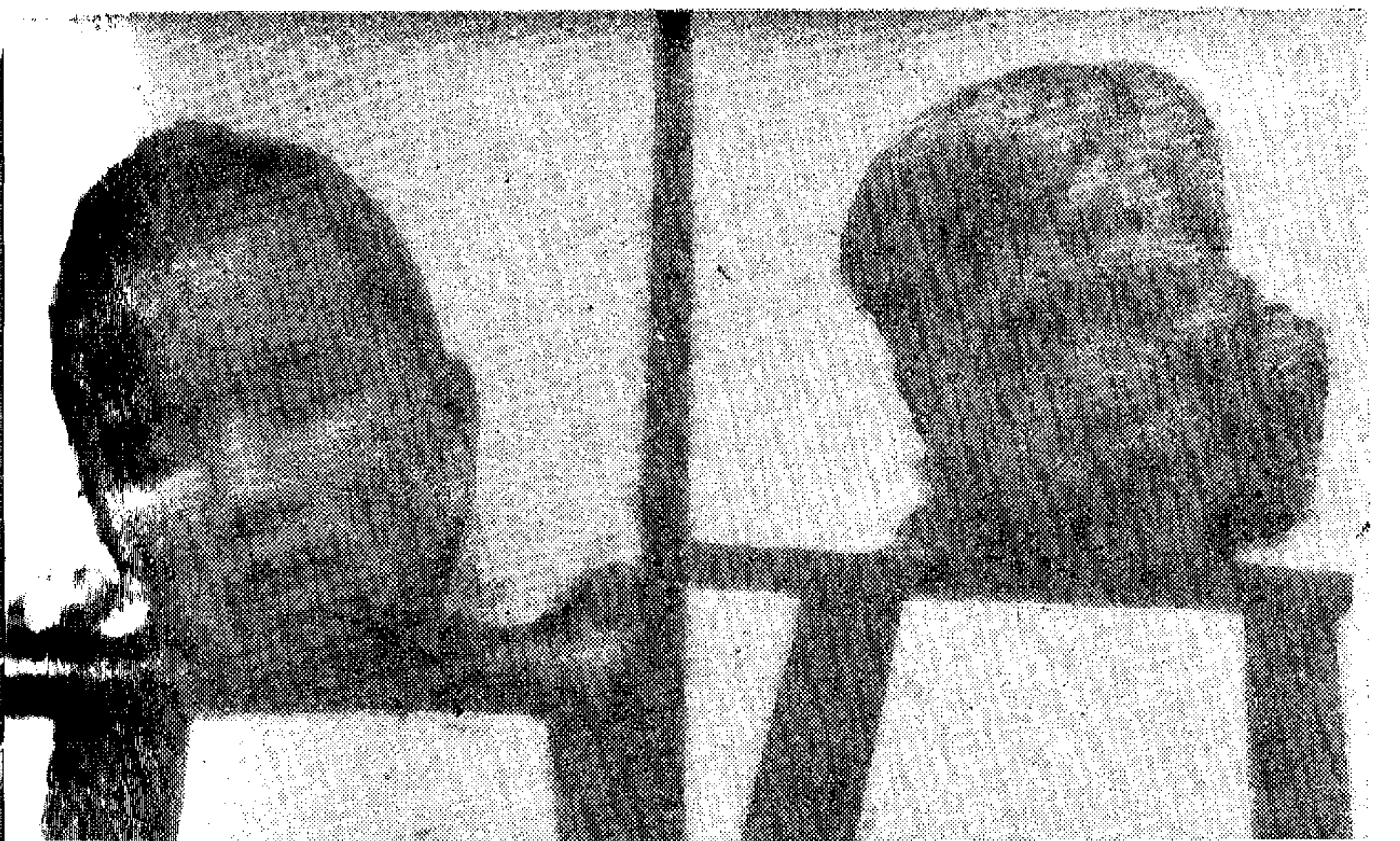
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亲自前往日军指挥部签订投降书。



日寇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



“东方直布罗陀”的沦陷



日寇在吉隆坡所陈列的人头

三 新加坡的沦陷

白思华签定投降书 二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白思华又在康宁炮台召集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与会的将领一致主张投降，于是白思华决定派遣副官纽美坚准将和副辅政司弗烈沙二人为投降代表，驱车前往武吉知马日军总指挥官山下奉文的本部，要求于下午三时半停战，并保留一部份武装，用以维持市内秩序，但是山下奉文拒绝接见英军的投降代表，他坚持要白思华亲自来求降，方予接受，白思华无奈，只得手擎白旗，亲身到山下那里去签定投降书。停战时刻定于晚上八时半，至此，号称“坚不可摧的要塞”和“东方的直布罗陀”的新加坡终告失陷。

新加坡的沦陷，使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势力“一朝土崩瓦解，如扇之无柄，伞无头。”（山下奉文语）* 难怪邱吉尔在接获消息后，痛呼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和规模最大的投降。白思华在福特汽车厂签署投降书之后，就向山下奉文恳求说：“将军，我有一个恳求，希望日本皇军保护英国的妇孺老幼。”这个英国殖民地军队的总指挥官，即使是到了这个屈辱的时刻，在他的心目中也还是没有马来亚的各族人民群众的！

据日方发表，日军在马来亚之战中一共俘虏了英军九万七千八百人，其中在新加坡沦陷时被俘的有七万三千

* 见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一日《昭南日报》载大日本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声明。

人，缴获的各种大炮有九百九十六尊，机关枪二千八百二十一架，步枪六万二千二百六十四支，战车四百七十六辆，汽车一万二千九百四十辆，船舶二百九十五艘，铁路车厢一千八百五十九辆，飞机十架，此外炸沉和炸毁的船舶有八十八艘，击坠飞机一百七十架，击伤飞机二百零四架，英军自北马至新山遗尸八千二百一十具，堪称“战果辉煌”。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战争中，英军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败于日军之手的。在战事结束时，日军的大约六万名前线部队在整个马来亚战场上——共俘虏了十三万英军，远远超过了日方自己宣布的数目！

南京大屠杀* 的重演 二月十六日，日本侵略军开进了新加坡市区，宣告了日寇对马来亚的法西斯统治的开始。山下奉文的部队进占新加坡市区后，就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并把全岛划分为四大警备区。山下奉文为了报复新加坡人民对日军入侵的抵抗，立即下令昭南警备司令官河村参郎实行大检证，把全市划分为六大检举区，检举的地点主要设在街坊、路口或学校草场上。在检举之前，日军先将检举地点四周用坦克、沙包、铁丝网围起来，严加戒备，然后挨家挨户强迫十八至五十岁的几十万华族居民到指定的检举区集中，由二月廿一日起至廿三日止连续进行为期三天的所谓大检证，藉肃清“不良份子”为名，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占领中国南京市后，大事奸淫掳杀，有数万市民被用机枪集体扫射致死，或连船一起沉入河中淹死，或被推入大坑中用汽油烧死。

山下奉文为了协助警备司令部解决宪兵力量不足的问题，还派遣了第五师团的精锐步兵一连担任助理宪兵。检证进行时，由蒙面的告密者向日寇宪兵指认所谓“不良份子”。关于不良份子的标准，各区不尽相同，但是居于榜首的是：共产党人。由于日军当局认为中学生、码头工人和海南人多是共产党人，因此凡属此类的居民一经检举出来，立即格杀勿论。其次是与南侨筹赈会或其他抗日活动有关联的份子，也属于肃清之列。此外报人、教师和资产超过五万叻元的人，也被认为有参加抗日活动或有抗日言论之嫌而遭检举。英国殖民政府雇员、新客等，则被认为有亲英倾向，也必须予以肃清。

被检举出来的人士，或在拘留所内受尽折磨而死去，或被运往郊外和海滨集体枪杀，或被用小船载往海港中，迫令跳海，然后用机枪扫射。据调查，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共有二十多处之多，被杀害的华族人民大约二万五千人左右，凄惨万状，真是满城腥风血雨。日军当局紧接着新加坡大检证之后，又在马来半岛各地实行同样的大屠杀，据估计，全马各地被杀害的华族人民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日本法西斯进行这项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吓阻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族人民的抗日运动，使他们不敢起来反抗日寇的残暴统治。但是，具有长期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斗争传统的马来亚人民，是绝不会在敌人的刺刀下屈服的，他们开始在广大的森林和农村中聚集力量，准备给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

第三章

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确立

经过了所谓大检证之后，日寇在马来亚建立起全面的法西斯统治，把马来亚变成为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组织部份，妄图实行永久的殖民统治。

一 成立马来军政监部

马来军政监部的成立 日寇第二十五军在攻陷新加坡后，就把它的军政部改称为马来军政部，成为军事统治的最高行政机构，首任马来军政部长是马奈木敬信。马奈木原是第二十五军副参谋长，不久即因政见不同而遭第二十五军参谋长之忌，于三月一日被调职，在任仅半个月左右。继任的是渡边，而马来军政部也随之改称为马来军政监部，设总部于昭南岛浮尔敦大厦内，下分各市政厅和州政厅。军政监部不仅管辖马来亚全境，而且范围扩及苏门答腊岛。

三月十五日，前日寇华北军最高顾问大达茂雄抵达新

加坡，就任昭南岛特别市市长职，着手恢复市政的工作。新加坡在沦陷初期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商业活动几陷于停顿的状态，为了争取华人的合作以及早日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日军占领当局的温和派份子条崎护说服了军政部长和警备司令官，同意让他争取前厦门大学校长、大实业家林文庆出面组织所谓“昭南岛华侨协会”，作为日军当局与华人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在日寇的淫威胁迫之下，林文庆、吕天保等一批华族资产阶级份子全部低头屈服，在原中华总商会的会所内挂起了华侨协会的招牌，充当日寇的走卒。其后，全马各地的日寇军政当局也纷起效尤，网罗当地的资产阶级妥协派和民族败类，拼凑了各州的华侨协会或维持会的组织。

条崎护等“温和派”份子以为昭南岛华侨协会成立后，就可以通过它来争取整个华人社会的合作，以恢复各种商业经济活动，但是没想到新上任的军政监部长渡边却把这个机构接管过来，交给他的助手高濂去领导，使他们的希望落了空。渡边和高濂两人都是“强硬派”，极力主张对华人采取高压政策，他们接管华侨协会后，就利用它作为压迫工具，对整个华人社会实行极其残酷的压迫政策，其最著名的“德政”就是勒令全马华人捐献五千万元“奉纳金”，作为华人以往从事反日活动的赎命钱。

日寇在占领初期对华人的血腥大屠杀和骇人听闻的经济勒索，不但激起了华人的深刻仇恨，而且也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殷切期望的“劝诱及邀请华侨把资金投入主要的工业，利用华侨的设备，收集及分发零售货物，同时引导华侨的银行同日本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实行合作”①的希望

变成了泡影。

在设立华侨协会的同时，以条崎护为首的日军温和派也着手组织欧亚混血人协会等机构，作为日寇占领当局与欧亚混血人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为了争取和利用马来封建贵族的势力作为它的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日寇还在新加坡召开了所谓马来各州苏丹的代表会议，让他们建立常设机构，协助日军当局推行其各项奴役人民的政策。在日寇的统治下，马来亚各州苏丹的行政机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只是昔日的英国顾问官的地位被现在的日本顾问官所取代而已。

攻马日军总指挥官山下奉文在攻陷马来亚之后，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在四月二十九日昭南岛庆祝“天长节”②的集会上致词的时候，竟然把台下的各民族代表称为“归附帝国‘的’大日本帝国臣民”，这件事在东京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当时东京当局对于如何处理南方占领地区的原居民的政治地位问题，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策的缘故。与山下奉文素有嫌隙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就抓住这个机会在大本营奏了他一本，结果天长节过后不久，当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把军司令部移驻到新加坡来的时候，也同时带来了东条的密令，着令山下奉文立即前往满州牡丹江履新，接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的职务，这个骄横跋扈，双手沾满马来亚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只得黯然离去。继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是齐藤弥平太。

①明石阳至撰，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1941—1945）》。

②即天皇诞辰。

不久，由于日本占领军内部的利害冲突尖锐化，南方军总司令部不得不下令将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和军政监部移驻苏门答腊，另设二十九军司令部和马来军政监部于太平，而昭南特别市则‘升格’为总司令部的直辖单位，另设第七方面军司令部于此，由土肥原出任军司令官。不久，土肥原他调，另由板垣征四郎接任，直到日寇投降为止。

一九四三年三月，渡边被调回东京任新职，继任马来军政监部长的是藤村。藤村在担任军政监部长期间，仍然贯彻执行前任部长渡边的高压政策，使日寇占领当局与马来亚各族人民的矛盾继续加深。八月，昭南特别市市长大达被调回东京另任新职，另由内藤宽一接任。

玩弄政治改良的骗局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日本帝国大本营和政府连络会议通过了所谓“大东亚政治指导之一般纲领”，决定让‘南方地区’土生人民根据本身的能力，参加当地的政治事务，以此加强亚洲国家的团结^①。六月二十六日，连络会议又通过一份称为“土生人民参加政治”的文件，规定各国华侨参加政治的时机应当依照土生人民参加政治的进度来决定。

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马来军政监部在十二月间开始导演所谓“土生人民参政”的丑剧，在昭南岛和马来各州相继成立了包括各民族‘代表’在内的所谓咨询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们大多数是由日寇一手挑选出来的地方败类，他们并没有厘定政策的实际权力，其主要任务只是向日寇当局汇报地方的社会情况和抗日军的活动消息，并执

^①明石阳至撰，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1941—1945）》。

行军政长官的各项指令而已，与“参政”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一九四四年一月，新总务部长滨田到马来亚履任，开始对华人采取怀柔政策。他在三月份举行的各州知事会议上提出他的新政策，尝试消除华人所受的各种歧视，并暗示日本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日本的公民权发给华人。州知事会议接纳了滨田所提出的新政策建议，决定要进一步给予华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以便“最充份地利用他们的才干，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才干”。会议同时也决定要“遏制日本商人和军人过份干涉华侨的商业事务”^{*}。但是滨田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推行他的怀柔政策，因为到十月间他就被调职了。

另一方面，日寇在占领初期还积极推行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合并的计划，但是后来因为两地的马来封建统治者反应冷淡，他们才被迫在一九四四年予以放弃。

分裂各民族的抗日团结 为了达到分裂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抗日团结，实现其分而治之，长期统治的目的，日寇在踏上马来亚领土的时候，曾经提出两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一个是“日本人驱逐英国人出马来亚，是为了解除马来人的痛苦”，另一个是“日本人来马来亚是为了帮助马来人收回被华人占去的财产，因此马来人必须杀尽华人”，第一个口号的目的是要极力加深马来人民群众对于英国的失望情绪，转而支持他们，第二个口号的目的是要煽动马来人民群众对于华族人民群众的排斥情绪，以分裂两大民族的抗日团结。在日寇统治期间他们招募马来群众

^{*}明石阳至撰，张清江：《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1941—1945）》。

参加所谓“兵补”，即后备军，而不容许华人参加，这些兵补有名无实，并没有配备枪械，其主要任务只是带领日军去扫荡抗日军而已。有些兵补更是为虎作伥，穿着军服，到处为非作歹，甚至带领日军去蹂躏华族妇女，造成华马两族之间的仇恨和冲突。

但是，日寇的屠刀是不分民族的，在日寇的法西斯统治下，广大的马来族群众同样蒙受其害。在粮食缺乏和消费品不足够情况下，马来族群众也和其他各族人民群众一样，挣扎在饥饿线上。另方面，日本军政当局的大批驱使马来农民进入种植园，以取代被征调去建筑“死亡铁路”的印度族工人，也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使马来农村濒于破产的境地。

在战火的洗礼和现实的教育之下，一部份马来青年爱国者开始觉醒，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另方面，日寇统治当局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横蛮宣布把马来亚北部的四个州，即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割让给暹罗王国，也更进一步激起了马来爱国青年的愤懑，使他们认清了日本法西斯的伪善面目。吉打州和玻璃市在被归并入泰国版图后，即被改名为西武里，直至战争结束后才重归马来亚的版图。

二 导演印度独立运动的丑剧

为了利用印度民族主义的力量来打击英国在亚洲的势力，日寇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对于马来亚的印族群众特别采取怀柔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印军战俘和当地的印度族社

会领袖，更是极力争取。在马来亚沦陷后不久，日寇军政当局就着手组织所谓“印度独立同盟”，自编自导印度独立运动的丑剧。一手策划这幕丑剧的是以藤原为首的一个特务机构，叫做藤原机关，但是到了后期则转由岩畔机关接手处理。印度独立同盟的总部设在新加坡，分会遍布全马，几乎所有的印度族上层社会人物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花拉公园的印度军队临时俘虏营中举行大会，胁迫所有被俘的印军官兵加入他们一手策划的所谓“印度国民军”中。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导演的这齣丑剧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它想利用印度民族主义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势力，特别是后者在印度的统治基础，而印度民族主义者则想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来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双方都想互相利用对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最高军政当局从东京把一个名叫拉什·比哈里·鲍斯的印度人接到了新加坡，充当所谓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比哈里·鲍斯从一九一六年起就一直避居在日本，是在日本的卵翼庇护下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傀儡。他于六月间在曼谷举行的印度独立同盟大会上被推举为主席，积极为日寇的军事扩张政策效劳。印度国民军的领袖则是一个被俘的前英印军队上尉，名叫摩汉·辛格。

日本军事当局原先的意图，是想利用印度国民军从海路进攻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作为“解放”印度的第一步。但是，这项计划并未能付诸实现，原因是东京当局不肯答应摩汉·辛格所提出的一些先决条件。摩

汉·辛格要求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公开宣布日本不会损害印度未来的独立，同时要求让他指挥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庞大军队。此外，他还要求从柏林召回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贞德拉·鲍斯，以取代拉什·比哈里·鲍斯的领袖地位。苏巴斯·贞德拉·鲍斯是一位真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主张以武力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曾经获选为印度国大党全国主席，但遭英国殖民政府的逮捕入狱，后来因为跟甘地、尼赫鲁一派的意见相左，因而流亡在德国柏林。日本当局对于摩汉·辛格的这些要求予以断然拒绝，摩汉·辛格一怒之下，竟然着手解散国民军，但是在他的行动获得成功之前，日寇当局已经先下手为强，采取行动制止了他，把他和他的一批跟随者拘捕起来，放逐到新几内亚的一个拘留营去。经过这场波折后，日本军事当局想利用印度民族主义的力量进攻英属印度的计划也就受挫了。

为了使所谓印度独立运动的死灰复燃，日寇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通过德国潜艇，把苏巴斯·鲍斯从柏林送回了槟榔屿。苏巴斯·鲍斯抵达马来亚后，立即在新加坡召开另一次全亚洲的印度独立同盟代表大会，极力为复兴印度独立运动而奔波。但是这时亚洲的战局已经改观，日本当局想从海上进攻印度的东南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贞德拉·鲍斯在新加坡宣布“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成立，他是国家元首兼战争部长、外交部长和国民军最高统帅。这个傀儡政府成立后，立即获得日本、德国、满洲国、汪精卫政权、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承认。十月廿四日，所谓“自由印度”

政府正式向英美两国宣战。第二年二月，自由印度政府总部更从新加坡迁往缅甸，并且开始由陆路进攻印度。日印联军曾经突破印缅边界进入印度，但是在英帕尔平原被英印军队所击败，此后竟然一蹶不振。在盟军的反攻下，缅甸首都仰光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光复，贞德拉·鲍斯和他的临时政府被迫撤退进入泰国。八月十八日，鲍斯在离开新加坡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的途中，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所谓印度独立运动的丑剧也就随着日寇的战败而宣告结束了。

三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一切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 在日寇统治期间，马来亚人民丧失了一切言论、行动、出版和结社的基本自由。日寇为了防范马来亚人民的反抗，在占领新加坡后的第三个月，便开始实行户口调查，并根据户口证上登记的人口数目配给大米和糖盐等生活必需品。第二年，他们又在新加坡推行所谓“协警制度”，把全市划分为七个大区，每个大区之内分为若干区，归区长管理，每个区之内又再分为若干小区，归小区长管理，每个小区之内又各统管十个组，每个组各统管三十户。日寇企图通过这个类似中国保甲制度的制度，对全市居民实行严格的政治监视。另方面，在马来半岛各州的市镇和乡村，则有“自警团”的设立，以十户合成一班，十班组成一分区，十分区组成一区，强迫所有壮丁成为自警团员，担负所谓维持治安及秩序的工作。在槟榔屿，则有所谓“邻保制度”，名堂不同，实质则一。

在这些制度的严密监视下，马来亚人民完全丧失了言论与行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寇还查封了所有民间社团组织，取消了人民自由结社的权利，所有的邮件都受到严密的检查，而且一切舆论宣传工具都受到日寇的严密控制。日军占领全马后，很快就接管了所有的官办的和民办的宣传舆论工具，如报纸、电台等，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和愚民宣传，每天千篇一律地宣扬所谓皇军的赫赫战果和它对马来亚统治的所谓“繁荣胜利”。当时在日军操纵下出版的报纸，计有《昭南日报》（华文）、《昭南时报》（英文）、《马来新闻》（马来文）、《彼南新闻》（华文）等。

在日军占领期间，马来亚的各民族教育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在沦陷初期，日本军政当局曾经下令关闭所有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待到后来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日寇才着手恢复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公立小学，但是华文小学仍然延迟至十月间才获准重开。他们对于华校的管制最为严厉，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颁布了所谓“有关华侨新教育政策”，宣布废除“华文私立学校”，同时禁止“在公立学校中以华语教学，以便加强日语课程”等等，妄图消灭华文教育。新政策规定所有华文教师必须到训练中心去参加训练班，并要按照日军规定的条条框框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如东京遥拜等，以灌输所谓“大日本思想”。

掠夺人力修筑战略铁路 一九四二年初，日寇东京当局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决定赶筑一条贯穿泰国和缅甸部分地区的战略铁路，以缩短日军的供应线。为了赶修这条长达二百五十英里的战略铁路，日寇不仅驱使了大批

英军战俘前往筑路，而且还在马来亚各地强征了十五万民夫前去服役。这些被迫参加修筑铁路的人员，在工作中受尽折磨，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他们不仅劳务繁重，工作时间冗长，而且住处漏雨积水，衣不蔽体，饥肠咕嘈，以致疾病丛生。他们还经常遭受日军的严酷迫害，稍有不慎，就惨遭各种刑罚，尤其是妇女劳工，还受到兽兵的百般凌辱。在日军的残暴迫害之下，筑路工人死亡率极高，据统计，在筑路的总人数中，约有一半人员被摧残致死，其中以印籍劳工的死亡率最高，在全部被驱往筑路的六万名印籍劳工当中，仅得二万人在战后生还，因此当时人们称这条铁路为“死亡铁路”。

敲骨吸髓的经济压榨 马来亚人民在日寇的法西斯统治下，在经济上也遭受到极其残酷的压榨。日本法西斯除了任意霸占人民的房屋财产，拚命搜刮民间的物资以供应战争的需要之外，还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极力榨取人民的血汗钱。在日寇统治期间，仅是人民的征税率一项就跃增了四十倍。此外，他们还巧立各种名目，强迫人民缴纳什么“防务基金”、“新昭南模范村筹备基金”、“职业登记费”等等，以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据记载，仅马六甲一地，所捐献的“防务基金”数目已达三百四十余万^①，而新加坡一地所捐献的“新昭南模范村筹备基金”的数目也“达千万元以上”^②，着实令人乍舌。但是，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勒令全马华人缴纳五千万元的所谓“奉纳金”。

^①见吴体仁撰：《日本压迫下的马华经济》，载《大战与南侨》

^②见洪锦堂撰：《新加坡沦陷期间回忆记》，载《大战与南侨》

这笔奉纳金虽然经过日寇的傀儡机构“华侨协会”三申五令，甚至按户口征募，仍然未能在日寇的限令期满之日达到预期的数目，结果只得向日本的正金银行贷款二千一百万元，遭受日本财阀的进一层剥削。此外，日寇还通过发行所谓“昭南证券”和“彩票”等，尽力榨取人民的资财。

在日寇统治期间，马来亚的通货膨胀现象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主要是由于日军当局大开印刷机，滥发“军用票”所造成的恶果。在占领初期，日军所发行的军用票是印着连续号码的，其价值和英国殖民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相等，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后，市面上的英国殖民政府的旧货币已经绝迹，而军用票上的连续号码和水印也取消了，只留着罗马字母，可是到了一九四三年正月过后，甚至连罗马字母也取消了，这样就连日寇军政当局最后也无法知道自己究竟发行了多少货币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百元面值的军用票开始在市面流通，通货膨胀更趋恶化。仅以大米价格为例，在沦陷前夕，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每斤的价格仅为六分，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日军投降前夕则上涨至七十五元，涨幅为一千二百五十倍，升斗居民的生活窘况可想而知！其它的食品价格，如白糖、猪肉、鸡蛋等，也不例外，涨幅由几百倍至一千余倍不等。

为了控制马来亚的工商业，日本垄断财团紧跟日军的刺刀与战车之后，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蜂拥而至，组织各种“组合”和“利权屋”，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马来亚的重要经济部门，都由日寇军政监部所委托的组合或利权屋进行管理，例如马来亚的丰富锡矿资源，就是由军政监部委托的财阀集团如三井矿山、东洋矿山、日本矿业、顺安

砂金等株式会社从事开采及收买的，胶园则由昭南护膜组合经营，收买工作则由千田商会和东印度殖产株式会社专利。这两个专利机关，又在各地委托商店按照官价收买，造成马来亚的民族资本胶园和锡矿等，因为无利可图而纷纷陷于停顿。在商业方面，主要的进出口贸易，都由会社或组合专利，例如米粮是由三菱所垄断，食盐则由三井所垄断。

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和垄断组织及奸商的层层盘剥，马来亚各阶层人民在日治时期的生活极端贫困，其中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最为悲惨。以战前全马来亚最大的铁矿场龙运铁矿为例，在日据时期，该矿场即转变为日寇官商合办的株式会社，拥有华印工人四千名左右。日寇为了节省货船的运载吨位和打破战时交通的阻碍，由一九四三年起开始就地制炼铁块，然后经暹罗转运日本或直接售与暹罗作为制作和铺设路轨之用。工人在矿场中除了担当繁重的劳动外，还要经常遭受日本管工的无理殴打。日寇在建成炼铁高炉之后，又强征壮丁二千余人前往担当烧炭的苦役，这些工人因为粮食恶劣，营养不足，结果病亡的不计其数。工人患病后往往即被场方驱逐，因此当时龙运港口的街道上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华印族失业工人，他们流离失所，饱受饥寒和死亡的威胁。龙运铁矿在日治时期有“人间地狱”之称。*

又以马来亚最大的煤矿场雪兰莪州的煤炭山为例，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占领初期，煤炭山的矿场、三夹板厂、电

* 参见冯成蹊撰：《龙运港日寇为害记》，载《大战与南侨》

炭制造厂、蒸馏厂、砖厂共有工人一万三千人左右，其中印度族工人约占四千人，余为华人和少数马来族工人。在日寇统治时期，矿山工人的境遇十分悲惨。他们除了遭受日寇的毒刑拷打和屠杀之外，还被拉夫到暹罗去当苦役。但是，在地下工会“煤炭山工友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以怠工、慢性破坏机器等方法积极破坏敌人的生产机构，使得煤的生产量减少了一半，影响所及，火车的正常通行班次也不得不被迫削减，另方面，不少工人响应了抗日同盟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了抗日军，充当抗敌后备队和武装战斗员。*

为了抑制通货的恶性膨胀，日寇当局在占领马来亚后不久曾经推行所谓“增产运动”，以求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是没有获得人民的响应，后来转而采取强迫手段，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开始组织所谓“勤劳奉仕队”，规定每一百五十个壮丁必须派出二十人从事劳动。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寇更进一步颁布所谓“男子就业限制法令”，强迫店员、小贩、厨师、裁缝等行业的壮丁一律转业务农，但是即使如此，所谓增产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

城市居民疏散计划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战局开始对日寇不利。在半岛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日渐强大，游击队四出打击敌人，使敌人坐立不安。另方面，澳大利亚的蛙人特务也在九月廿七日潜入停泊在新加坡海外的七艘大型军用船底下安置定时炸弹，炸沉了这些敌船，使日寇大起惊恐。在时局日趋严重下，日寇新加坡驻军第七方面

* 参见吴柳斯撰：《煤炭山工人的抗日斗争》，载《大战与南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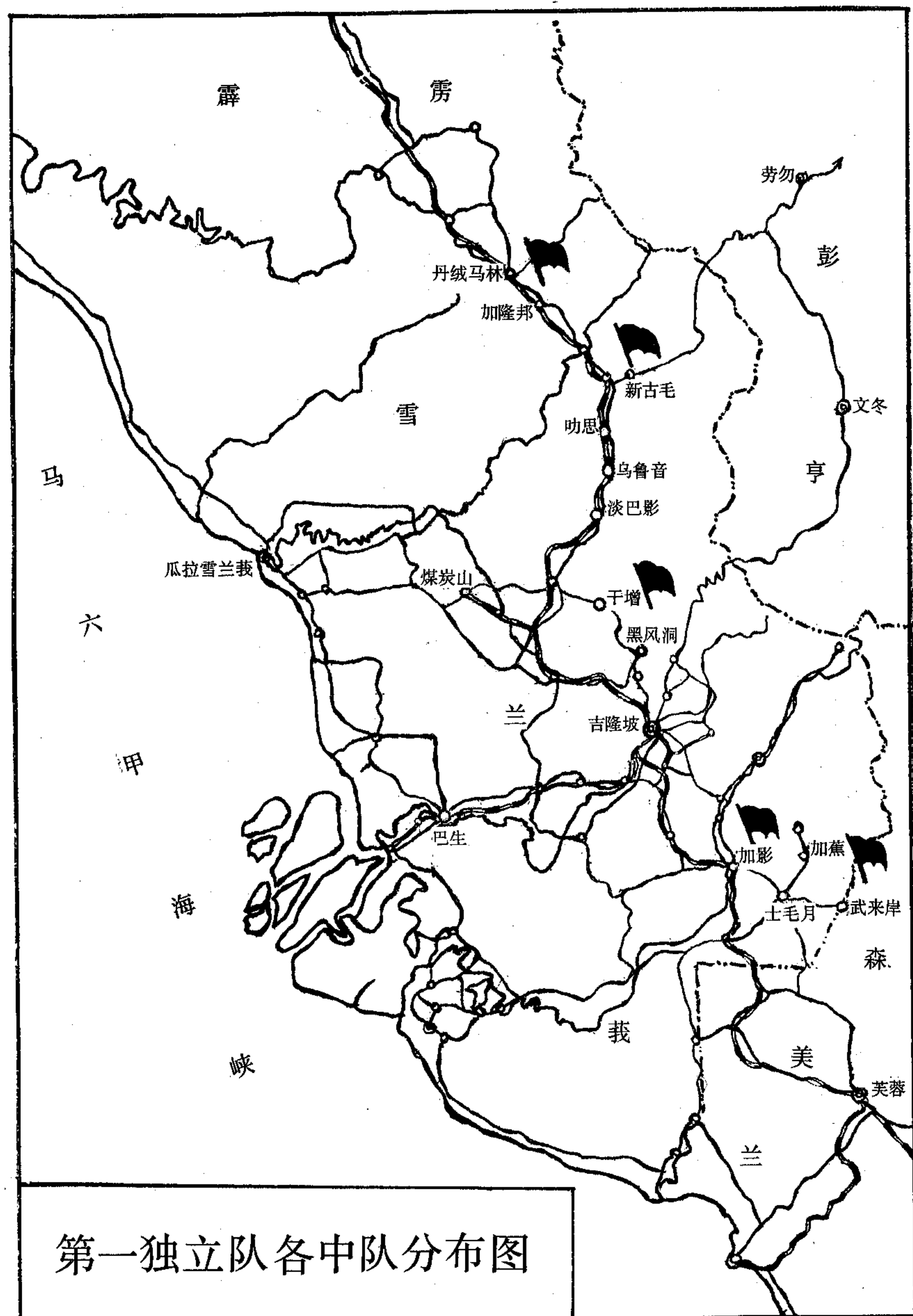
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向所谓“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下达了作战命令丙第一号，命令迅速实施新加坡市民疏散计划。命令内容为：

“昭南特别市长应迅速实施昭南市民疏散计划。疏散人口以三十万为最终目标，疏散地则以马来各州，由特别市自行选定。特别市速将疏散目的地选定后应急将实施细节呈报。马来军政监部须协助上项计划之实施，诸如疏散必需的运输车辆，必要器材等的提供，以便早日完成疏散任务。”^①

被选定为第一个疏散地的是柔佛州东北部的兴楼河右岸地区，日寇美其名曰：“新昭南模范农村”。另一个疏散地是彭亨州马口的天主教新村，被疏散往那里的多是欧亚混血种居民。此外，还有位于新加坡岛外的宾旦岛的一个疏散地，居民多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但是，到日寇投降为止，上述地区的移民总数不超过一万人，^②仅及日寇疏散人口最终目标的三十分之一而已。人民对日寇统治的反抗，由此可见一斑。

① 见条崎护著：《星洲日军暴行录》。

② 见洪锦堂撰：《新加坡沦陷期间回忆记》。



第一独立队各中队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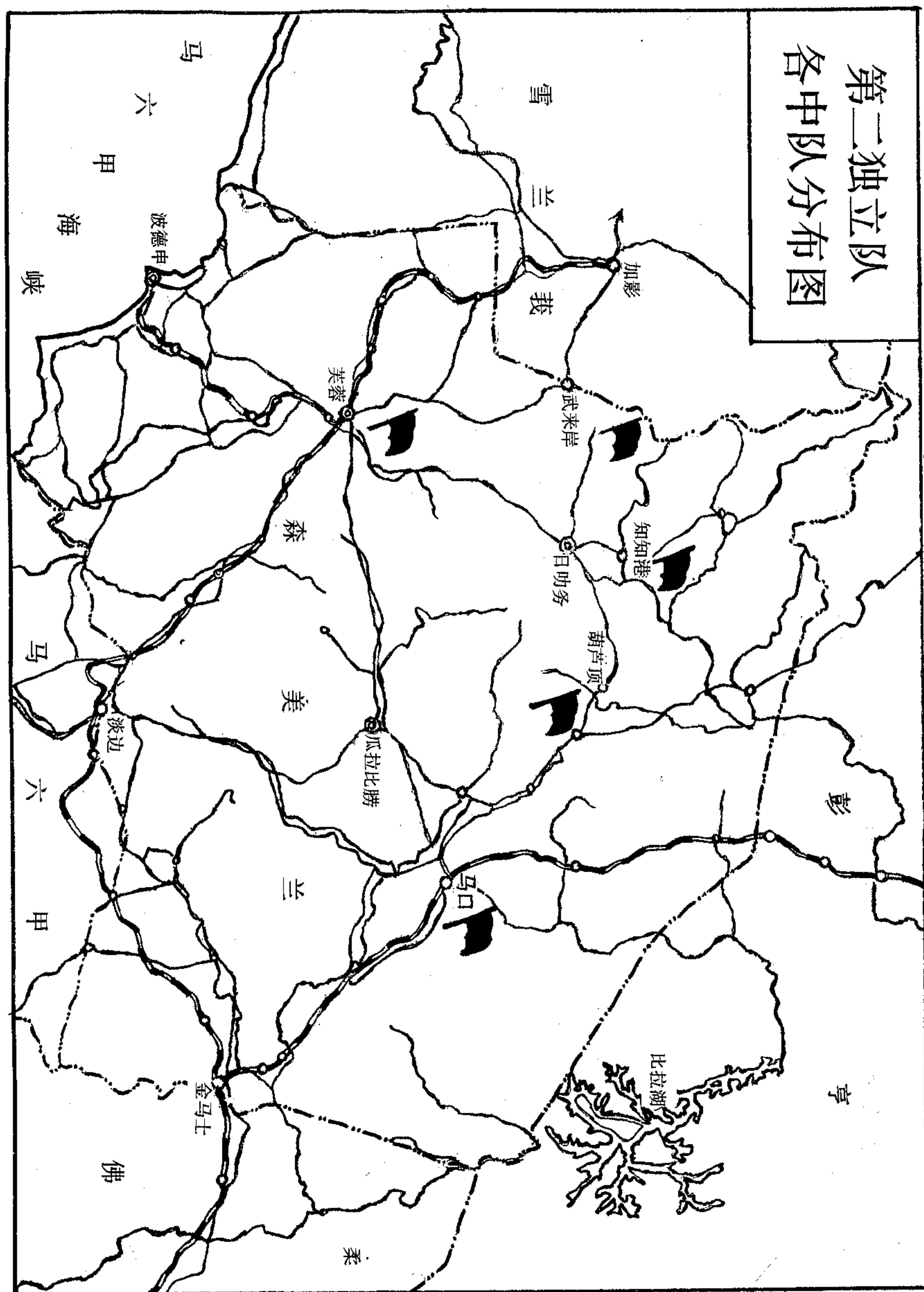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奋起抗敌的马来亚人民

新加坡沦陷后，大批抗日志士和星华义勇军战士，纷纷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马来亚内地去，继续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深入各州的农村和城镇，与参加过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的共产党员一道，积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着手组织人民抗日军。

一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诞生

四个独立队相继成立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在雪兰莪的双门单宣告诞生。这是马来亚历史上第一支由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武装部队。这支军队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人，主要由派往新加坡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受训的三十名党员组成，领导干部是许庆标、陈天庆等人，开始时暂编三个分队，第一分队活动于新古毛地区，由党代表李白和队长彭少雄领导；第二分队活动



于淡巴影地区，由党代表斯符和队长王青领导；第三分队则驻在石山脚地区，由党代表阿方和队长阿炎领导。不久，第三分队改编为规范中队，活动范围也扩大到干增地区，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也分别改编为第三十五中队和第二十九中队。以后又划分为北区和南区两个司令部，北区司令部下辖三中（在干增）、二十九中（在丹绒马林）和三十五中（在古毛）；南区司令部则下辖十二中（在加影）和八中（在武来岸）。

紧随着第一独立队之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第三和第四独立队也分别在同月内在森美兰州、柔佛州北部和柔佛州南部宣告成立。

二独的骨干全部来自霹雳州的马共党员，他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党中央的命令在金宝的双溪古月某农村集中，然后南下新加坡，于十二月卅一日进入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他们原计划在受训完毕后即返回霹雳州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来因为吉隆坡沦陷，因此滞留在森美兰州。当时受训的队员共有三十二人。受训结束时，英军发给英式重机一挺、轻机二挺、手提机枪十支，步枪十五支、短枪十五支、手榴弹十箱及炸药一批。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他们分乘两部军用卡车，奔向炮火纷飞的抗日前线。当他们到达森美兰州的淡边镇时，就听到吉隆坡已经沦陷、日军正向芙蓉推进的消息，领队的英军军官立即下令全体人员下车，然后自己掉头赶回新加坡去了。这三十二名队员只得暂时化装成难民，混在难民营中隐蔽起来，后来派人找到了柔北的地下党组织，才被安排到马六甲野新地区的黄梨山一带住了下来。一月下旬又撤

回离淡边约五英里的哥道山集中，并建立营地。但是驻地周围的群众条件不好，粮食供应异常困难，每天只靠吃杂粮充饥。为了改变环境，司令部决定派党代表赖莱福和队长黄国平分头出发寻找马共中央和森州地委的关系，争取早日把队伍转移到群众条件比较好的知知港去。赖黄二人刚走几天，驻地就被敌人发现，日寇马上调来军队，展开围攻。为了避免吃亏，队伍决定分两批撤走，约定先至瓜拉比劳，再转往知知港。其中由副队长刘冠文率领的队伍，在行军途中，因为迷失道路，便把长武器藏在丛林里，然后到瓜拉比劳的交通站去找联系，不巧收藏武器的地方被敌奸发现，报告了瓜拉比劳警察局，待到大家联系回来，武器已被敌人搬走。为了夺回武器，队伍立即决定分数路向警局发起进攻，但是因为缺乏作战经验，各路配合得不好，其中一路过早暴露了进攻的意图，引起敌人的警惕，致使正面的进攻不能得手。加上又是在白天，不利于久战，最后只好赶快下令撤出战斗。此役共牺牲三人，伤数人，副队长刘冠文也中弹牺牲，付出了血的代价！队伍经过长途跋涉和克服重重困难后，终于在二月底胜利抵达目的地——知知港，并在那里和其他方面的队伍会合起来。知知港是森美兰州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余郎郎山则是知知港地区最先建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独的队伍抵达时，该地已集中了几方面的人员：一部分是马共森美兰州组织的地方队伍，另一部份是从雪兰莪州撤来的由马共党员刘石带领的进步文化人士和学生。此外，还有几十名被收容的英澳散兵游勇。二独根据中央的指示，将地方部队编入队伍，而刘石带领的那部份队伍则打算重返雪兰莪州开辟抗日游

击区域。但当他们行至加焦附近时，却遭到日寇的伏击，交了一战，被困在山上数天，后来被迫突围撤回余郎郎山。刘石不久病逝，其队伍一部份编入外地工作。几十名英澳士兵则因不服水土和经不起森林生活的考验，大部份患上疟疾和伤寒，相继病亡。

二独建队初期只有两个中队，约二百三十人，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即增至四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共约五百二十人。另有后备队员数百人，其主要负责人和活动地区如下：

模范中队（直属司令部）：党代表爱克，队长邓昌，于知知港简塘尾一带活动；

第四十三中队：党代表黄爱平，队长汤运兴，于知知港半芭梨望、双溪罗丹一带活动；

葫芦顶中队：党代表胡力，队长徐国保，于葫芦顶一带活动；

马口中队：党代表陈辉，队长半天（邬玉民），于马口一带活动；

独立分队：于芙蓉郊区活动。

第三独立队成立时约有六十名骨干，都是从雪兰莪州各地挑选出来的马共党员。他们离开吉隆坡后的第二天，吉隆坡就沦陷了。当他们在新加坡军训完毕时，战事已经发展到昔加末——麻坡一线以南。因此他们原定的回返雪

兰莪州打游击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上午，三独的成立大会在新加坡芽莪二十三巷的一间平房里举行，由马共中央代表当场宣布独立队和属下的两个中队的负责人名单如下：党代表陈书，队长小杨（吴科雄）、副队长林亚炎，政治部萧尔新。第一中队党代表陈田*，队长林文光，第二中队党代表胡萍，队长李开发，仪式过后，即乘车开赴前线。

车过阿逸依淡不远，在前头带路的英军联络官便不愿再前进，他交代了几句话后，便自己掉车走了，因为当时有消息说，日军已经到达了三合港。战士们不顾危险，仍然继续前进，过了永平不远，便向左拐进一件黄泥路，找到了先头出发的人，就在一个难民营附近下了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草草用了晚餐后，战士们就点起火把，朝森林进发。有谁知道，在这六十个抗日战士当中，只有十八人活着下来，盼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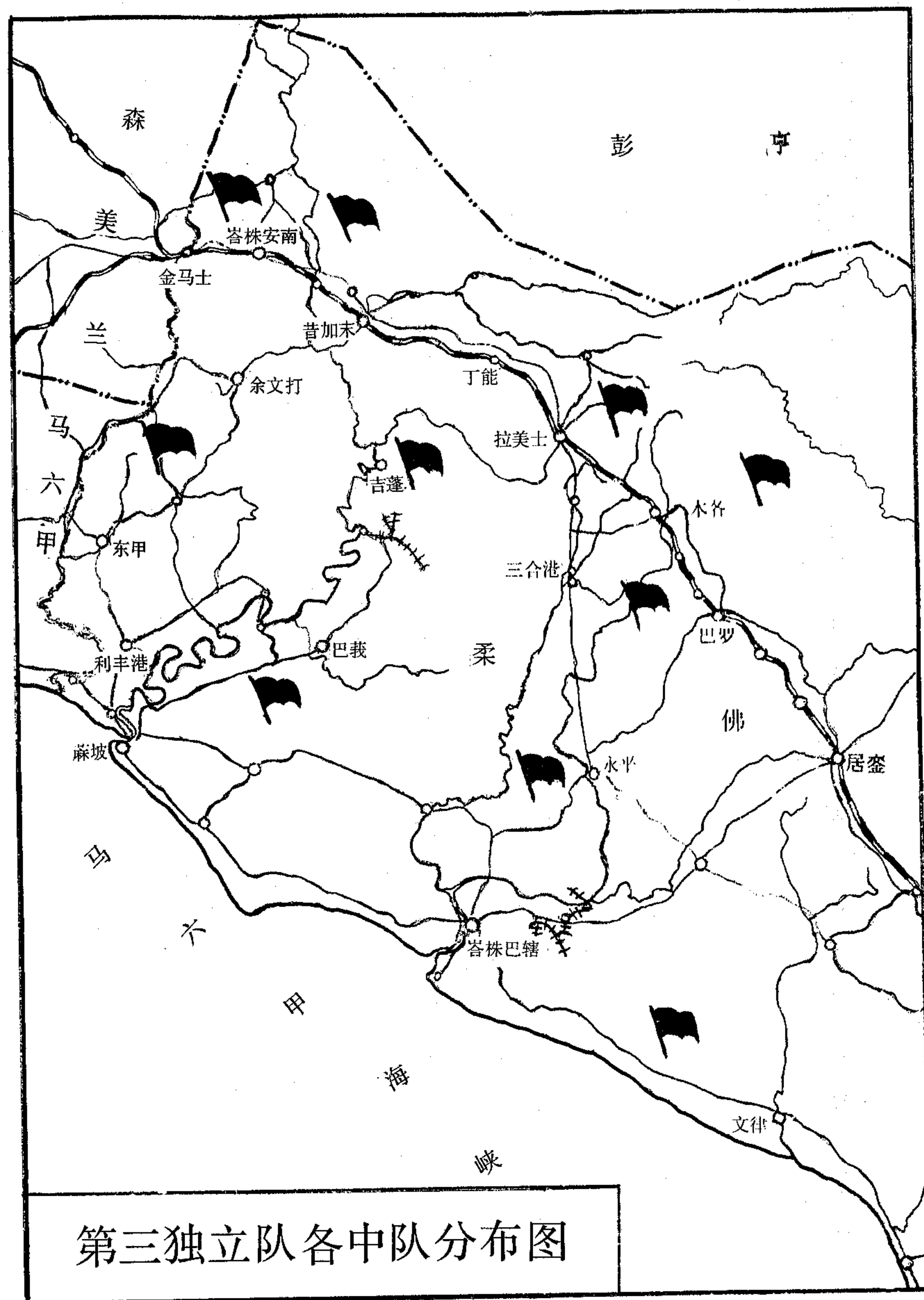
队伍进入森林后，司令部即决定：一中向北出发，通过甲蓬到余文打一带活动；二中向东出发，到三合港和巴罗一带活动，同时成立第三中队，由小刘任党代表，小玉任队长，向南到麻属一带活动。这年年底，又成立了四中，在永平一带活动。三独司令部则跟在一中后面，企图通过金山打通北上的路线，后来在金山顶遭遇了敌人，又被迫退了回来，只好决心留在柔北地区发动群众跟敌人周旋到底。

* 陈田后来转调四独英军特别队担任通译工作，并未到一中赴任。

这时，日寇正在全马强征“奉纳金”。一中决定打击日本鬼子这一掠夺阴谋，于同年四月底对余文打华侨协会发动突然袭击，结果没收了现款数千元。事件过后，日寇加强了对柔北地区的注意，增派兵力驻守各城镇。这年八月，日寇向一中的外围据点如刘厝港、武吉都亚等地发动进攻，抓去了一部份群众。同时，也在三合港等地向二中、三中进行扫荡，但都徒劳而无功。这时，部队的处境逐渐困难起来，粮食不继，疾病流行，几乎没有一个战士是完全健康的。

第四独立队是在马来半岛的战事已近尾声，英军仓皇退守新加坡的情况下宣布成立的，成立大会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某华文小学举行，由马共中央代表致词后，即公布司令部负责人名单如下：党代表陈路，正队长阿福，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亚川、亚浪，管理部亚辉、南学。会后战士们即乘车奔赴柔南士隆港。其时星柔长堤已经安置好炸药，随时准备引爆，新加坡保卫战即将开始。

队伍到达驻地不久，即以受训的六十名队员为骨干，结合自愿前来参加的队员，宣布成立四个中队：第一中队党代表卢成，活动范围士乃至姑来一带；第十二中队党代表小钦，驻玻璃城、士隆港一带；第四中队党代表南学，驻居銮地区；第九中队党代表阿忠，驻黑水港。不久，又成立了第十三中队，党代表袁振耀，驻文律地区。一九四二年五月间，马共柔南地委及四独司令部委派亚浪带队到东岸地区活动，以恢复南巫地南、哥打丁宜等地的地下组织，并建立第七中队，委任南学为党代表，王琼光为中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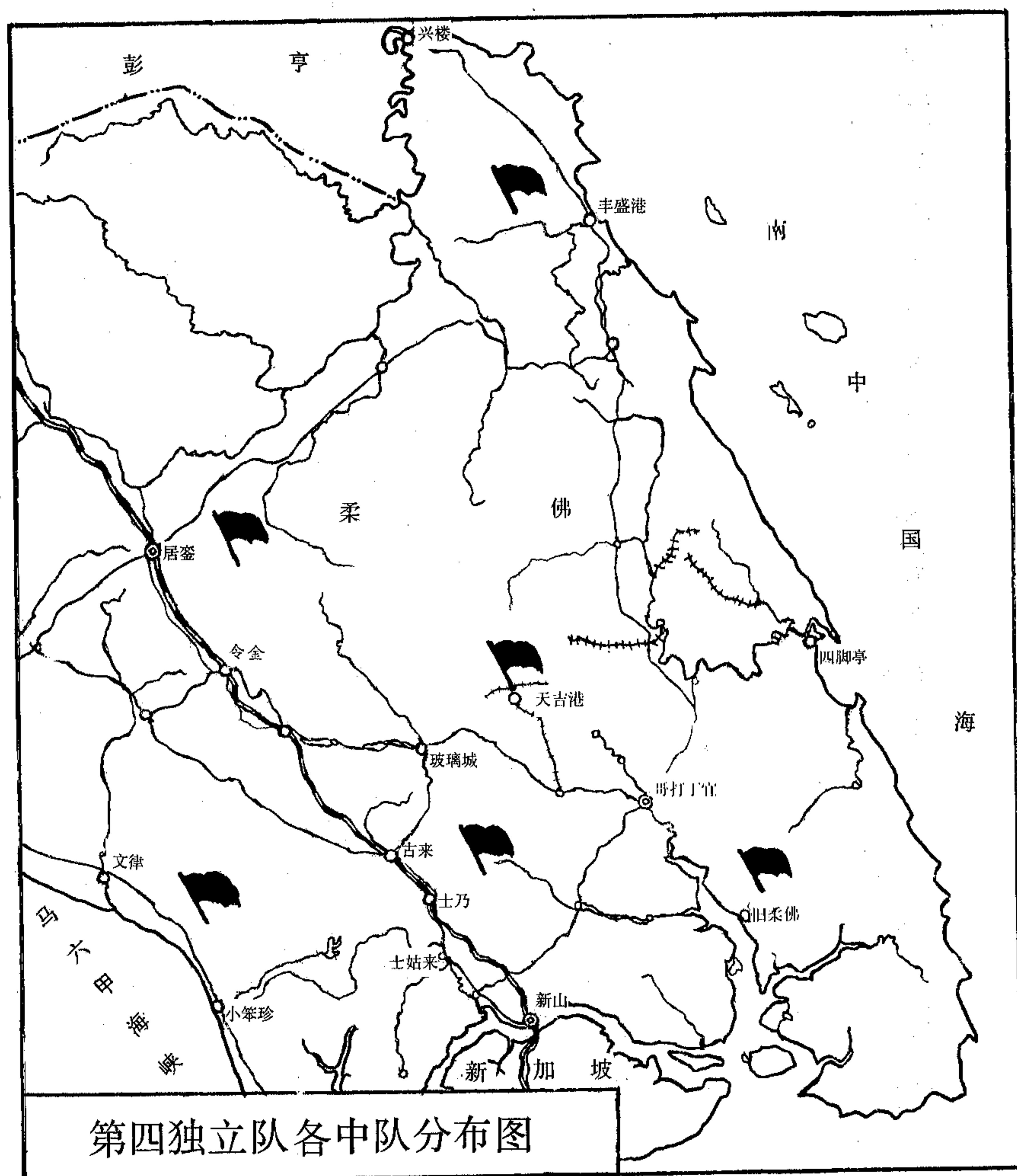


长。后来又建立模范中队于哥属天吉港，任亚浪为党代表。

在困难中坚持斗争 各独立队在建队初期，都遭遇极大的困难。首先是日寇挟着它的军事胜利的余威，在全马各城镇实行检证大屠杀，并对乡村地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其中以柔南地区遭受日寇的蹂躏最为惨烈！柔南地区毗邻新加坡，战前的抗日救亡活动比较蓬勃，所以日寇的烧杀尤其残酷，例如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十八日止的数天之内，日寇在哥打丁宜市十英里的范围内，就屠杀了华人数千名，而仅在哥打丁宜一小镇，被害人数就已超过千人，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又如文律属的巴力士隆和张厝港等处，被杀害的人数也达千人以上，其他各地如振林山、士乃、文律等地被杀者也各有数百人之多！农村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夷，幸存的群众一般都存有畏惧心理，不敢或不愿意积极支持抗日军。这些都给抗日军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另者，日寇在屠杀无辜群众的同时，还对抗日军展开猛烈的进攻，各独立队因成立不久，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都很不足，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只能采取“敌来我退，敌去我还，在适当时机予以打击”的游击作战方针，所以各部队经常处在流动作战的状态中，粮食和医药的供应都很困难。一独有一个时期就仅靠吃榴连核过日子，三独有一个时期只吃木薯干送开水，四独则一连几个月单以黄梨和薯叶充饥，还有一些队伍则长年吃着木薯粉，没有油、没有盐、没有米都是很常见的事。营养不足是当时抗日军战士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三独立队各中队分布图



但是，粮食和物资的缺乏还不是人民抗日军战士所面对的最大困难。他们的最大困难是：缺医缺药。森林中最肆虐的疾病是：疟疾和伤寒。由于人民抗日军在战争初期还不能普遍展开民运的工作，因此药品的供应十分困难，许多指战员在患上疾病后都由于未能获得药物的及时治疗而牺牲，例如在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中曾经和林江石并肩战斗，后来奉党的命令到柔南第四独立队担任政治部工作的陈锡清^①，就是在到达部队后不久，由于患上伤寒症，缺医缺药而牺牲的。当时他才二十三岁，他的牺牲无疑是进步文艺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据统计，在抗战期间染病身亡的指战员，约占几年牺牲的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当时森林斗争环境恶劣之一班。

因此，在沦陷后的第一年内，各独立队的人事变动甚大，即以第四独立队为例，在短短半年内，党代表就更换了四位^②！这种恶劣的处境只有直到各独立队建立了自己的稳固的根据地后，才能获得基本的改变。

在这一年里，各独立队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力量教育群众，团结群众，训练队伍和创建根据地等，并配合小规模袭击行动，来打击日寇的反动宣传。第一独立队的数次袭击敌营，伏击敌军，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第二独立队袭击瓜拉比劳和知知港警察局，伏击敌军，第三独立队

^① 别名杨励。

^② 首任党代表是陈路，后来据说因为犯错误而被革职，由林江石接任，但林江石在乘夜横渡星柔海峡赴任途中被日寇所捕，党代表一职暂由中央代表刘文兼任，后由朱佬继任，但不久朱佬即在“九一”事件中牺牲。

的没收日寇奉纳金，消灭敌奸走狗，反击鬼子的扫荡，第四独立队的八次战斗和袭击冷金警察局*之役，都大大增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消灭了敌寇的威风！

经过一年的艰苦战斗后，抗日军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人民的抗日斗争情绪逐渐高涨，抗战的烈火很快就蔓延到全马的各个角落。

二 马来亚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

莱特的被捕与叛卖 新加坡沦陷后，星柔长堤交通断绝，柔佛海峡又被日军所封锁，因此马共的大部份高级干部都无法偷渡到马来半岛去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只能暂时匿居在新加坡。日寇在紧接着检证大屠杀之后，又掀起大逮捕的浪潮。各宪兵队根据落入他们手中的抗敌动员部、捐款芳名册，抗日义勇军编成表等资料展开搜捕行动，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遭受日寇的逮捕。首先被捕的是担任过抗敌动员总会武装部主任的林江石。不久之后，一贯充当英国殖民政府代理人的马共总书记莱特也被日军秘密逮捕。莱特被捕后，立即屈膝投降，从英国殖民政府的代理人摇身一变而为日本法西斯特务。

关于莱特的身世，迄今还是一个半解开的谜。许多资料显示，他原是法国殖民政府的特务，后来被英国特务机关所收买，安插在马共党内，成为代理人。关于这一点，英国人是直认不讳的。例如曾经担任海峡时报编辑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凌晨四时人民抗日军袭击了冷金警察局，救出了被捕的抗日志士，并将警察局捣毁。

哈利密勒在他所著的《马来亚之危机》一书中就供认说，他在马来亚曾经听到一项传闻，说一个新加坡英国警官，曾于一九三〇年初在香港把莱特收买过来，置于马共党内，充当英国的特务。另外一个英国作者理查德·克拉特巴克也在他所著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间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暴动与命命》一书中提到说，关于莱特是由英国政治部安插在马共党内一事，他曾经获得一度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艾伦·布莱兹的证实。

此外，在战时曾经担任盟军一三六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副区长职务的庄惠泉也在一九七三年揭露说*，当他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廿五日和林谋盛二人奉命乘搭潜艇回返马来亚敌后工作时，领队方雅阁上校曾经拿出上级的一项指令向他们宣读，其中即提到马共总书记莱特在安南领导共产党时，曾经与法国政府合作，后来因为事态败露，才由法国政府介绍给英国政府，让他潜伏在马共党内，夺取马共最高领导地位。由于莱特具有这种背叛性格，因此林谋盛和庄惠泉的上级提醒他们说，莱特这个时候很可能再与日本人合作，指示他们在潜入马来亚之后，要避免跟莱特在一起，以免被出卖云云。可见莱特充当英国政府内奸一事，确实无疑。

莱特被英国政府收买后，就在一九三四年杪从香港来到了新加坡，然后钻入党内，并于一九三九年第六届中央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党的总书记。

至于莱特遭受日寇秘密逮捕后，再次变节投敌，出卖

*庄惠泉撰：《我所知道的莱特与耶鲁》。

同志的事，也是无可置疑的。战前奉命在新加坡执行间谍工作任务的日人条崎护后来在他所著的《星洲日军暴行录》一书中指出说：“新加坡沦陷初，曾逮捕马来共产中央委员兼马共书记长莱特（又名黄金玉）的大西宪兵队，奉命担任讨伐马共的工作而以特别警察队活跃。大西队活用了间谍组织以完全肃清新加坡的共党分子后，即从事讨伐马来半岛上的马共恐怖分子。”

另者，在被捕后变节投敌，充当日寇通译的黄耶鲁在战后也公开揭露说，莱特在日本统治期间出卖了大批共产党和国民党干部，其中包括他本人在内。黄耶鲁的公开指责莱特，其目的或许是为了替自己的变节行为洗脱罪名，但是他所叙述的事实却是大体可信的。

据说莱特从英国特务变成日寇特务后，曾经千方百计地企图取消抗日武装斗争，主张以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作为重点，并以发动群众为藉口，主张把游击队的武器收藏起来，把部队分成小组，到群众中进行活动。但是，由于党内大部份干部执行原先制定的武装斗争路线，他的目的才未能达到。条崎护还证实说：“战争结束时，大西队曾给莱特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作逃亡之用，可是莱特却留在新加坡接近戴维斯上校，当英军间谍。英军从日本宪兵队的报告上得知莱特的庐山真面目后，此后的一年半曾巧妙地逆用他。”

新加坡地下党组织的瘫痪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日寇大西宪兵队根据莱特提供的情报，在新加坡再次展开大搜捕，在不同的地点同时逮捕了马共的一批高级干部，其中包括黄诚（又名黄石）、张白衣（又名克夫）、小路

（又名陈培青）、郑亚宁（原名郑声烈）等数名中央委员。次日凌晨，日寇又根据莱特提供的线索，以巡逻汽艇在柔佛海峡拦截和逮捕了马共中央委员林江石、林亚当和邱联杰三人，当时他们正奉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乘夜偷渡海峡，想要潜回内地领导武装斗争，但是不幸他们的行动部署，事先被莱特所知道，通报了日寇，因而被捕。林江石原本已于四月初被敌宪所逮捕，但是后来击破洗澡房的窗口脱逃，这次由于莱特的出卖而再次被捕，惨受敌寇的百般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日寇无计可施，最后只得在七月十八日把他杀害了。林江石不愧是马来亚千万抗日英雄的典范人物。

六月三十日，马共新加坡市委会在后港召集干部联席会议，讨论斗争形势问题，莱特又再一次把情报通知了敌人，而且事先把通到会场的道路绘写清楚，交给日军宪兵队长大西觉，因此在会议进行之时，会场突被日军包围，市委领导干部王小黑、林逢春、陈文庆、谢达、黄志声、陈桂丛等人被捕，只有少数干部侥幸逃脱。

在莱特的出卖下，马共新加坡市委组织一再遭到敌寇的严重破坏，逐渐陷于瘫痪的境地。莱特除了出卖干部之外，还把由他负责指导埋藏前星华义勇军所遗留下来的两百多支步枪的两个秘密地点透露给日寇知道，使这些枪械全部落入日寇的手中。

由于党组织的一再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新加坡市委会在日寇占领期间一直无法领导人民进行地下抗日武装斗争。

一九四三年四月，又有一批地下党负责人由于莱特的

出卖而被捕，他们是市委书记蔡亚业、市委李应炭、王美德、陈景云、曾斗、李秋萍和中委蔡克明、柔南地委亚潘等。

石山脚事件 尽管新加坡的地下党组织遭受敌寇的严重破坏，马来半岛的武装斗争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取得长足的进展。在抗日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马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以确定新的斗争方针。莱特认为这又是一次出卖党的干部的绝好机会，于是跟大西觉商量，亲自布置了一个妄图一举扑灭抗日武装斗争烈火的极其恶毒的阴谋。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预定在距离吉隆坡九英里的石山脚农村里举行，出席会议的将有：中央委员、各州地委代表、抗日军各独立队司令部代表等。担任会场警卫工作的是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队长阿炎和他所率领的一班战士和数名服务员，人数共计四十多人。八月卅一日晚上，除了新加坡、彭亨东部和第二独立队的代表* 还没有到达会议地点之外，各州和各独立队的代表都已参加了预备会议。

但是，由于莱特的出卖，日本法西斯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从各地调集了精锐部队二千余人，在当天晚上对会议地点布下了四道包围圈。

九月一日拂晓，日军主力部队开始逼近会场，但立即被哨兵和警卫战士发觉，鸣枪报警。正在酣睡中的干部听到枪声后，全部惊醒，立即组织突围。在警卫员的掩护

* 二独队长黄国平在出席会议途中被捕，叛变投敌。

下，全体与会干部按照中央常委阿川的指挥，分作两组实行突围，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大部份干部终于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包围线，成功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据抗日军后来宣布，在这场战斗中共打死打伤敌军四百名，其中包括打死敌军中佐一人，尉级军官和军曹十多人，敌兵一百多人，而马共方面也牺牲了九位领导干部、六位警卫员和三位服务员，他们是：中央委员李小忠、柔南地委小康、中委兼四独党代表朱佬、四独队长余洪（又名阿福）、一独党代表许庆标、（正在筹备中的）五独党代表张万廷（又名张奇生）、吉打地委陈炳宏、三独党代表陈书、檳城地委文燕、会议警卫队长阿炎、警卫战士黄光、彭友、宝伦、小林、刘发，会场服务员刘三耐、刘坤和张冠凤（女）。

战斗结束后，日寇还砍下烈士和许多无辜群众的首级，挂些吉隆坡街头示众，借以宣扬他们的赫赫战果和吓唬抗日军民。但是，坚决抗日的马来亚爱国者决不会在敌寇的屠刀下屈服，就在同一年的十二月一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又在马来亚北部的霹雳州胜利诞生，宣告了敌人的妄想的破产。

三 抗日军在反扫荡中发展壮大

日寇大举进犯一独根据地 在沦陷后的第一年中，尽管马来亚共产党的组织遭受日寇的严重破坏，无数的领导干部惨遭杀害，但是它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仍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不但克服了森林中的疾病侵袭、医药缺乏、粮食不足、武器弹药匮乏等等困难

而且成功地反击了敌人的大规模军事扫荡，逐渐把抗日战争的烈火，从中、南马扩大到北马和东马的广袤地区。

“九一”石山脚事件过后不久，日寇就紧接着向一独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妄图消灭抗日军。十月十五日，日军开始向雪北乌鲁音地区的抗日军根据地发动扫荡，当天早上，敌军首先在乌鲁音火车站建立它的作战指挥部，然后开始部署兵力，形成一个长约廿五英里的包围圈。下午三时，日寇即以二百兵力，分作五路向抗日军进扑，但是，敌寇的行动部署事先被抗日军所探悉，于是抗日军也相应分作五组，分别在各个山头上埋伏，准备狙击来犯之敌。三时三十分，第一路敌兵闯进抗日军的埋伏圈，遭到抗日军战士的迎头痛击，其后，其他各路敌军也陆续中伏，遭到重大伤亡，至下午七时，日军终于狼狈退出战斗，估计是役敌军伤亡约一百名。

敌军的首日行动虽然受挫，但是他们决不甘心失败。抗日军估计敌军必定会在第二天进行反扑，于是当晚再度部署战斗任务，着令各组先行占领有利地形，并在主要道路上埋置炸药。第二天早上，敌人果然再度来犯，并把兵力增至五百人。一路上敌军不断踩中抗日军所埋置的地雷，死伤甚多，其中一路敌军在山谷里遭到埋伏在山头的抗日军机关枪火力的猛烈扫射，损失甚大，当时敌寇曾经连续冲锋三次，但都不能得逞，结果只得铍羽回去。估计在这两天的反围剿战斗中，抗日军共打死打伤敌寇两百余名。这次战斗说明了人民抗日军的战斗质素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一九四三年春，一独第八中队决定对由加影通向武来

岸的士毛月警局发动进攻。部队首先在离开士毛月四英里的地方截获日军的一辆军车，俘虏车上的日兵四名。战士们换上缴来的日军服装后，就驱车直闯士毛月警局，伪装成为日寇军官，喝令伪警集队，战士们随即把伪警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枪支。其中一个伪警头目企图溜走，但未出门口就被警卫战士抓到了，最后经过一番教育，即将所有俘虏释放。

为了报复第八中队对士毛月警局的进攻，日军在三月间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用一个团的兵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分兵两路，一路从协利港正面进攻，另一路从拿督坳进攻，猛扑第八中队驻地。敌人企图在天亮前绕过农村，避开群众耳目，来个突然袭击，但是因为路途不熟，只得沿途洒石灰为号。但是当他们到达八中驻地附近的石头河时，天色已经微亮，即被巡逻哨兵所发觉，予以痛击。八中留下两个小队狙击，主力随即撤退。日军扑了个空，除烧掉几座空营房外，只好灰溜溜的下山走了。

随后，在五月、八月、十二月，敌人又连续发动进攻，兵力都在千人上下，时间一般为三至五天，但都一无所获。

气壮山河的半山芭越狱事件 一九四三年五月上旬某日傍晚，被拘禁在吉隆坡半山芭监狱里的一百零六位爱国者，在被俘的第一独立队特务队长陈大智和共产党员廖维生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与障碍，成功地越狱逃亡，创下了马来亚历史上第一桩悲壮伟烈的冲狱事件。不幸的是，在敌人实施全面戒严和大搜捕的情况下，有二十名爱国者在冲出敌牢之后，又被日寇捕回，壮烈牺

牲。其余的八十六位则在各个小组负责人的率领下，避开敌人的追捕，几经周折，最后大部份回到了部队的所在地。

冲狱时负责打先锋的是一位名叫符党的壮士，他身材魁梧，首先挥拳打昏了负责锁门的狱警，然后抢过狱警手中的大串锁匙，逐一打开各个牢房的门锁，接着又奔到牢狱的大门，抡起那只敲钟的大铁槌，用力把门锁敲碎。守卫在大门外的两名伪兵见状，还来不及举枪射击，就被符党挥起的大铁槌解决掉了。这位英勇的志士在等到所有的狱友冲出大牢之后，自己才跟着走。他为了全体难友的安全而忘记了自己，结果，他被敌人抓了回去，在大牢的门前当场被打死了。当时冲出牢狱而生存的八十六位志士曾经誓言要在日本法西斯鬼子被逐出马来亚之后，在和平到来的一天，在半山芭牢狱的门前，为这位忠贞的烈士竖立一个纪念碑，永志他的丰功伟绩*。可惜他们的誓愿到今天还未能实现。

这次越狱斗争为抗日革命战争的胜利坚持和最后胜利保存了大批干部，值得大书特书。特务队长陈大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被提升为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公开队队长，可惜的是，抗英战争爆发后，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于雪兰莪州某地与英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后来叛变投敌，未能革命到底。廖维生在抗战胜利后曾当选为雪兰莪州人民委员会主席，于紧急状态时期被拘捕和被驱逐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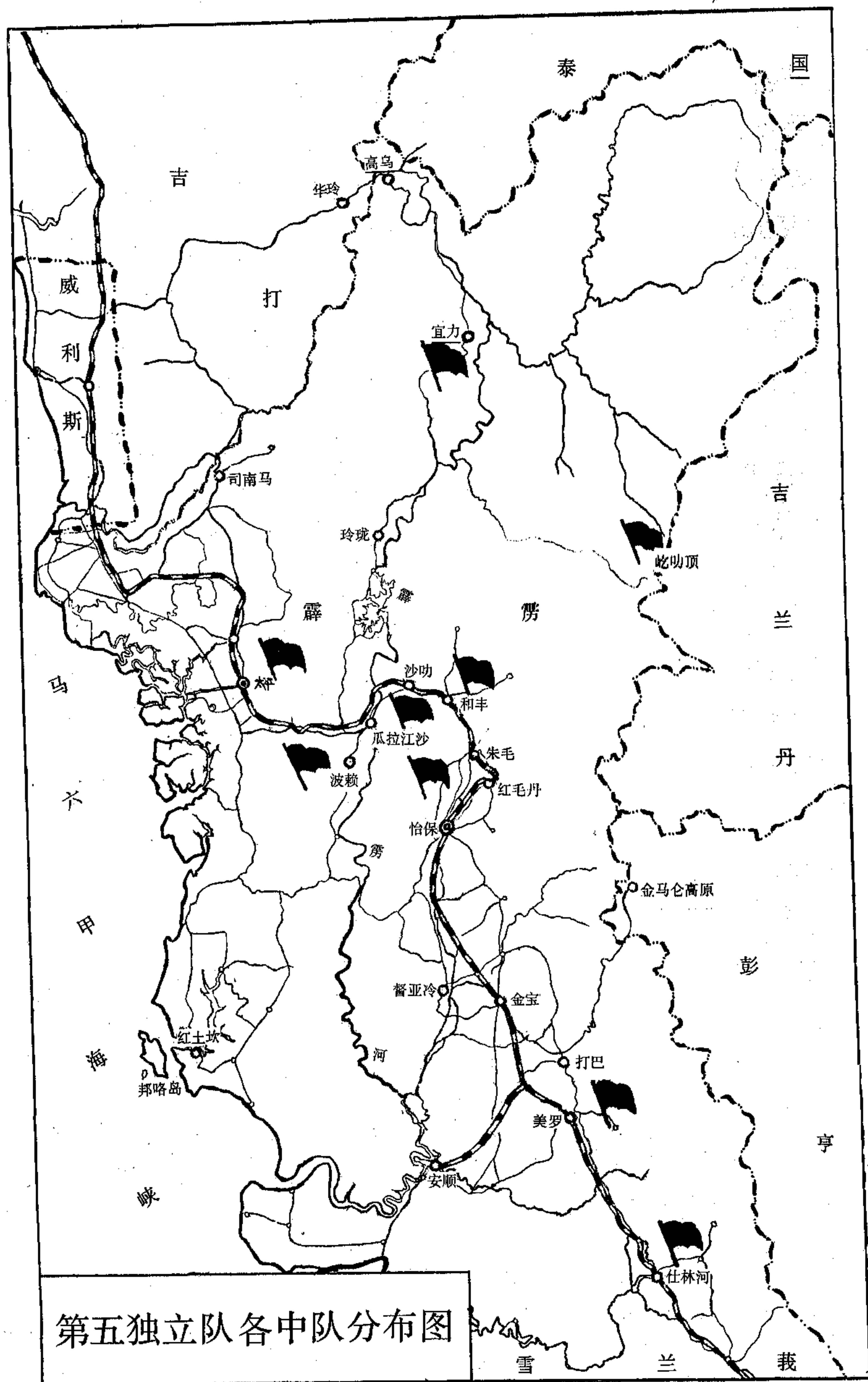
第五独立队宣告诞生 当英军从前线节节败退的时候，

* 吴柳斯撰：《生与死的角逐》、辑于《大战与南侨》中。

马共霹雳州地委就根据中央的指示，派人收集英军沿途所丢弃的武器，着手组织地方武装。因此，在霹雳州沦陷后不久，便有两支队伍活动于朱毛和仕林河地区，打击日寇的法西斯统治。在朱毛地区的队伍约有百余人，由张奇生（又名浪萍、万廷）领导，在仕林河地区的也有六十至七十人，由陈平领导。马共中央为筹建第五独立队，在九一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委派从森美兰来到霹雳州寻找中央关系的原二独党代表赖莱福带领五名受过军训的基干队员负责筹备工作，在筹备期间，由张奇生担任党代表职务，并代表五独出席党中央在吉隆坡石山脚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不幸牺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五独正式成立，第一任党代表廖伟忠，正队长赖莱福，副队长斯科。后来赖莱福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中伏牺牲，正队长一职由斯科接任，另任命黄立为副队长。在五独宣布成立的同时，又将朱毛地区的队伍改编为第一中队（即模范中队）、仕林河地区的队伍改编为第四中队。同时成立二中和三中。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和活动地区如下：

- 一中：党代表傅子冰，队长黄松，活动于朱毛地区；
- 二中：党代表李华，队长陈铁明，运动于沙叻地区；
- 三中：党代表江雁，队长钟剑川，活动于波赖地区；
- 四中：党代表刘子忠，队长汤汉波，活动于美罗地区。



另有一个分队仍留在仕林河地区。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九中队（太平地区）、第十二中队（屹叻顶、靠近吉兰丹边境一带）、第十四中队（和丰地区）和第三十五中队（宜力地区）。到一九四四年底，五独已经拥有八个中队；兵力约一千人。

五独成立不久，就遭到日寇的猖狂进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对波赖山区的扫荡，日寇共动员了一千多兵力，向活动于波赖山区的五独第三中队发起所谓“铁臂”攻势，还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英雄的第三中队战士，利用波赖山区的复杂地势进行抗击，一直坚持了三天，予日寇以重大打击，最后因为粮尽弹绝，才被退撤出战斗。这一役日寇死伤约三百名。

日寇对一中活动的朱毛地区，金马仑地区，二中活动的沙叻地区，四中活动的美罗地区，十四中活动的和丰地区，以及三十五中活动的宜力地区都曾先后发动过扫荡，但除掉烧毁游击队的一些空营房和给老百姓造成灾难外，大都无结果而返。

二独东撤另辟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寇在森美兰州进行大屠杀，这是日寇继新加坡的大屠杀之后而在全马各地实行大屠杀的一个组成部份，目的是为了恫吓人民，使人民服从他们的法西斯统治。森美兰全州被屠杀的无辜群众共有三千多人，其中知知港的余郎郎村全村房屋都被烧光，男女老少来不及逃跑的都尽遭杀害，无一幸免，其残暴程度，实在骇人听闻！二独为了回击敌人向人民的进攻，打击日寇的凶焰，就在四月下旬进攻知知港警察局，击毙敌伪警察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大长了抗日

群众的志气，大灭了敌寇的威风！

二独由于成立初期就向敌人的据点展开上述几次进攻，因此很早就引起日军当局的注意和围剿，处境十分困难。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九一”事件过后，二独跟上级失去联系，司令部也被敌寇破坏，只剩下政治部负责人马丁和后勤部负责人廖德二人，日寇就利用叛徒带路搜山，动员了二三千兵力对二独实行长达五个多月的围剿封锁，妄图断绝队伍和群众的联系，把二独困死在山中。当时二独处境虽然困难，缺粮无油，断医少药，但是始终坚持战斗。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打破敌人的长期围困和封锁，使日寇的图谋未能得逞。

在日寇围攻的几个月中，二独与敌人发生的战斗不下廿余次，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底某日，二独司令部接获线报，说有日军二百余人，将乘坐七八辆卡车，由知知港向简塘尾进发，立即指挥四十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双方交战一个多小时，毙伤敌军数十人，自己则无一伤亡。日寇对抗日军无可奈何，只好用屠杀群众来泄愤，并利用敌奸抓了四十三中队党代表黄爱平的两个只有五、六岁大的孩子，装进铁笼里，放在旷地上晒太阳示众，并且断绝给他们饮食，妄图诱使游击队投降，或迫使游击队出来营救，以便一网成擒，但是日寇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结果两个小孩竟被活活的晒死和饿死！

日寇在发现二独司令部所在地后，即大量增兵，不断进山搜索。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连续两次进攻司令部，第一次在月初，动员了五百多兵力，黑夜进山，三面包围，一俟天亮即发动攻击，抗日军战士在司令部的指挥

下，英勇作战，结果除一名护士因为受伤被俘外，其余全部安全突围而去，使敌人得不偿失。另一次进攻是在月底，日寇动员了一千多兵力，但一进入哨所便遭到抗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以数十人伤亡的代价冲上了哨所，但进入司令部营地时，又遭到猛烈火力的阻击，战斗由上午十时打至下午四时，日军又死伤数十人，结果日寇被迫退回山下住宿。抗日军不知敌人未走，当晚与日军同宿一个山头，一在东，一在西，直至深夜巡逻时方才发觉。日军误以为抗日军摸营，猛放空枪壮胆，直到天明！狼狈情况，可见一斑。

由于日寇的反覆进攻和扫荡，特别是对游击地区人民群众的烧杀掳掠，给群众造成了很大的牺牲和灾难，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特别是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三月，二独奉马共中央命令，撤离森美兰州，东调至西彭地区，协助当地地下组织建立抗日军第六独立队。从此森美兰州的游击战争暂告中止，直到一九四四年底，才由第一独立队和第六独立队各派一个中队回森州恢复二独建制，重新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第六独立队宣告诞生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第六独立队又宣告诞生，它是由森美兰州奉命东调的二独辖下的四个中队，一个分队和上彭（又称西彭）地区原来的三个分队合并组成。在六独未成立前，西彭地区的马共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经建立起地方抗日武装队伍，由黄春负责领导。黄春后来被日寇逮捕，改为章峰云、何浪彬、陈豪、刘光等人领导，辖有三个分队，分散活动于文冬明光及屹叻顶山区，共有二百余人。六独成立后，第一任

党代表是章峰云，队长是曾冠彪，副队长是陈豪，政治部是吴亮明，管理部是汪清。当时编有五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中队主要负责人及活动范围如下：

模范中队（直属司令部）：党代表以力，队长何友，活动于文冬生番港至加叻一带；

162 中队：党代表陈辉，队长陈泮，驻明光地区；

157 中队：党代表爱克，队长萧英，驻文积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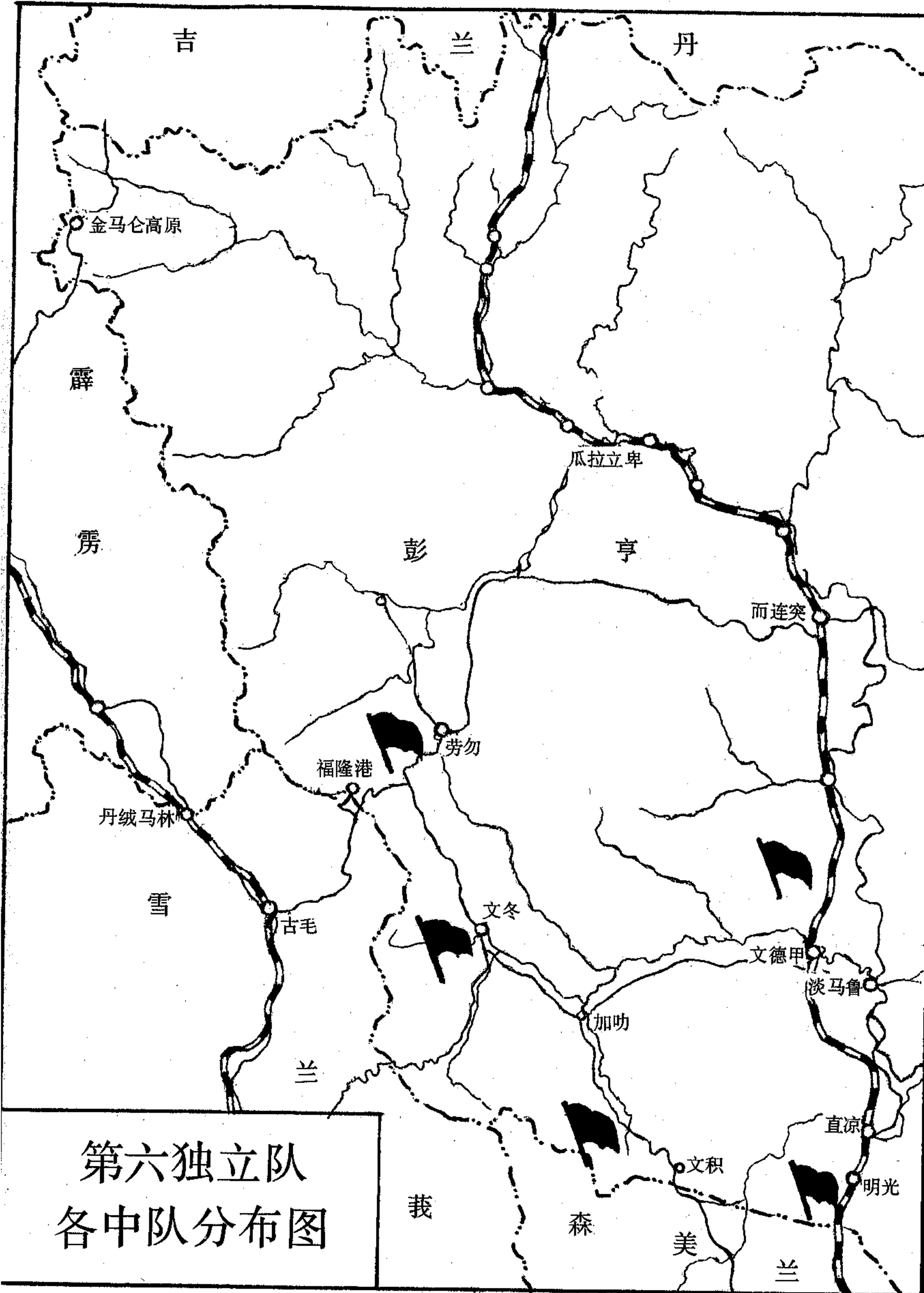
153 中队：党代表黄爱平，队长邓昌，驻劳勿地区；

屹叻顶中队：党代表罗勒，队长陈光来，冯成，驻屹叻顶地区；

159 独立分队：政教员胡冰（此人后被撤职，另调亚珍充任），队长陈来，驻文德甲地区加流一带。

彭亨地属山区，农村人烟稀少，又不是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上，所以日军驻兵不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日寇的烧杀抢掠，无论在暴烈程度及规模上，都没有西海岸各州那么残酷，这就给六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六独抓紧有利时机，积极在农村开展抗日活动，建立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消灭敌奸走狗，扩大和训练队伍，以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由于和群众打成一片，保卫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护拥和爱戴，因此六独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

日军疯狂进攻天吉港 天吉港是柔佛州哥打丁宜县属大森林里的一块盆地，周围山高林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只靠一条小河。英治时期有一个英资的锡矿场，沦陷后因



第六独立队
各中队分布图

为矿场停闭生产，矿工就在那里种植粮食为生，与外界很少来往。这个地方经过四独司令部的经营之后，面貌大为改变，号称“小延安”，设有医院、小型兵工厂，抗日报社、宣教团、抗日公学等，还成立了抗日总会和供销合作社。部队自己还开垦农场，解决了部份粮食供应问题，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总之，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成了四独的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正因为这样，日寇后来对这里的进攻和扫荡，就特别的频繁和激烈。

日寇对天吉港的进攻，前后约有四次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军调动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进攻，并出动空军投弹一百多枚和用海军封锁柔佛河，妄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抗日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小队为作战单位，四出骚扰和打击敌人，并派出一部份兵力，转至外线作战，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截击敌人的运输车辆，迫使敌军不得不抽调出一部份兵力，以保护其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减轻了正面进攻的压力。当日军分兵保护其交通线时，抗日军即迅速集中兵力，占领有利地形，在日军必经的道路上埋设地雷和炸药，痛歼敌人。九月卅日中午，日军于泗色路上中伏，死伤一百人左右。另一队敌兵于十月二日取道玻璃城退回姑来时，也在“才成园”的芭洋里遭受伏击，又死伤一百多人，迫使日军不得不全线撤退。这一次反围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从一九四四年起，昭南岛（新加坡）日寇当局开始强制推行所谓疏散居民计划，打算在一年之内把三十万昭南岛居民迁移到柔佛州东北部的兴楼地区，美其名曰“新昭

南模范新村”。四独为了打击日寇的这一备战计划，于是加强了在该地的第十八中队的活动力量，先后数次袭击伪新村建设指挥部，击毙伪新村治安部长黄达三，还在哥打丁宜至丰盛港、兴楼的公路上经常伏击敌运输车辆，一九四四年冬，游击队在接近丰盛港处击毙了昭南岛伪华侨协会理事，专责“新昭南”建设事宜的汉奸陈延德，使日寇的新村建设计划遭受沉重的打击。

三独继续发展壮大 三独党代表陈书在“九一”事件中牺牲后，由小林*继任为党代表，直至一九四三年底。由一九四四年起，队长小杨继任为党代表，另由政治部主任萧尔新继任为队长，直至日本投降为止。

进入一九四三年，日寇对三独的进攻更加频繁激烈。这年初，第五中队在昔加末东北部的西隆坡成立。由于不断的锄奸活动打击了日寇的统治秩序，日寇于是在当年的五、六月间接连发动了几次进攻，并强迫当地的群众迁走，制造无人区。

继五中之后，不久又成立了第六中队和第九中队。第六中队是一支从土匪改编过来的中队，主要在金马士一带活动，后来，这支队伍在少数原来匪首的操纵下，违背原先达成的协议，把司令部派去的领导干部隔离开来，背着司令部干了不少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事。司令部忍无可忍，终于采取坚决行动，把为首的几个坏份子处决了，并把六中解散，其成员大部份安排到五中来，少部份被编排到第六独立队去了。

*小林，原名吴梦超。

九中的活动地点主要在甲蓬一带，这里四面都是大森林，交通不便，只有一条藤河贯通其间。沿着藤河可以上溯昔加末、峇株安南、下达巴莪和藤坡，是抗日活动的理想地点。柔北地委的联系中心就设在这里。离甲蓬下游一个名叫“五条石”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警察局，驻有一批伪军，他们经常欺压老百姓，气焰嚣张。三独司令部决定拔掉这个据点，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战斗后，伪军死伤过半，其余的也都放下武器投降。这次战斗，抗日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获得了完全的胜利。鬼子闻讯，始终不敢派兵增援。

这年十月十二日，一中攻打了位于柔甲交界处的亚沙汉警察局，也获得完全的胜利。

进入一九四四年，抗日活动在各方面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各个中队不时派出锄奸小组，潜入敌后的城镇进行锄奸活动，如第五中队就数次派人潜入昔加末镇，打击敌奸。抗日军派出的宣传队，也常常深入到胶园、农村，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这个时候，敌人除非成众结队，否则不敢轻易下到农村活动。

鬼子鉴于大规模进攻的收效很小，因此从一九四四年起，便采用小部队长途奔袭，或者在游击队必经的小路上伏击交通员和运输人员的方式，来打击抗日军。这种做法在初期曾经收到一定的效果，给抗日军造成一定的困难和损失，例如一九四四年初，第五中队在夜袭昔加末至峇株安南之间的浮罗加什警察局失败而折返驻地后不久，日军即已尾随而至，幸而有大森林的掩护，人员才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但是营房被焚，物资全部丧失，即是一个例子。有

时，鬼子也派出小部队，深入森林，对抗日军实行“游击”战术，这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威胁作用。

但是由于鬼子的暴虐统治始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们的小部队活动，往往为抗日军侦悉，反而提供了被歼灭的机会，例如一九四四年五月间，鬼子在离西隆坡不远处伏击抗日军，即反被抗日军所伏击！全队十四人除一人逃生外，其余全部当场被击毙！这就使得鬼子以后不敢轻易尝试这一战术了。

这年七、八月，二中进攻巴罗警察局，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缴枪十余支及弹药一批。投降的伪警察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差不多与此同时，三独又在拉美士地区成立了第十五中队。十五中成立后即在拉属丁能铁路沿线地区展开活动。这个时候，三独司令部已迁到靠近彭亨的勿刹山下驻扎，在这里成立了警卫队，后来又建立了教导团，由陈刚复负责领导工作，以轮训的方式培养分队以上的军事政治干部。

到了一九四五年，日寇在柔北地区基本上以固守铁路干线城镇，维持南北铁路交通为主，很少再到农村地区向抗日军进行扫荡了，同时，强迫人民沿城镇四周筑起围栅，以防抗日军潜入活动和袭击。针对敌人战术方针的转变，三独司令部也及时地把打击重点转到城镇中来，其结果就是三独司令部在“红五月活动”中所号召的“五一三”战役。

“五一三战役”就是在五月十三日那天对柔北各地的警察局同时实行一次全面袭击的战役。当天，三独各中队经过周密的准备后，对除藤坡外的大小十三个警察局发起

全面进攻，在进攻中，除在昔加末和巴罗两地遇到抵抗外，其余基本上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昔加末是柔北地区的重镇，也是日寇向三独进攻的主要据点。这里除有几十名伪警外，还驻着一支日本警备队，人数约有百余人。他们住在昔加末市政局背后的小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三独当时的意图不在于攻坚而在于吃掉警察局和夺取警察局里的军械。警察局位于昔加末市南北马交通干线上，离日军驻地约有半英里之远。

战斗任务由五中和九中联合执行，五中主要负责阻击小山上日军的增援，九中负责攻打警察局，当战斗一打响，游击战士便冲进警察局，那些伪警不堪一击，只打了几枪，便纷纷缴械投降，恰好当时鬼子驻昔加末警备队的一名副队长也在警局内，战士们命令他举手投降，他却拔出指挥刀企图反抗，结果当场被打死，整个战斗只进行了十几分钟，抗日军便完全占领了警察局，火车站和邮电局。

真正的战斗是在日军驻地的小山下进行。鬼子一听到警察局的枪声，便立刻整队下山驰援，当他们到达山脚时，就遭到抗日军的阻击，鬼子一时摸不清楚情况，便退到山上固守。以后又组织了几次冲锋，但都被打回去了。就这样双方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警察局这方面的抗日军已完成了任务，狙击战士才撤出战斗。

“五一三”战役抗日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单以在昔加末一地，就打伤打死了鬼子数十人，包括一名副警备队长，一日军伍长和一个伪宣传队负责人，缴获各种枪械二百余支和大批弹药。所有伪警，经教育后都予以释放。自此以后，即使是白天，抗日军战士也可以在市镇的街道上

行走了。

一独越战越强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纠集千余兵力携带重机枪廿余挺，山炮廿多门，在敌酋村田大佐的指挥下，于午夜一时出发，向第八中队发动进攻。双方在一块丫形地面上进行战斗，抗日军只有三个分队的兵力，但利用森林掩蔽的有利条件，以逸待劳。第一、第二两个分队分别守卫在东西两个山头上，各配备有机枪两挺，冲锋枪三支，步枪猎枪共廿余支及手榴弹等。另派一个突击组扼守正面山头，阻击敌人。七时四十五分，战斗打响，敌人以猛烈火力掩护冲锋，但为抗日军击退，双方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敌寇伤亡不少。敌人接着改变作战方法，集中火力向抗日军机枪阵地射击，并发起连续冲锋。敌酋村田在督战时被击毙，但日军并不稍退，最后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抗日军在后援的配合下，才把敌人的冲锋打了下去，自己也有伤亡，副指挥腿部中弹。几分钟后，敌人又发起冲锋，终于打开缺口，随即实行侧后迂迴包抄。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十与一之比），抗日军指挥部下令撤退。这次战斗共打了两个多小时，击伤敌兵二百余人。战斗结束后，日军一改以往作法，占驻山头不走，意图长久围困。八中指挥部决定避敌锋芒，暂时撤离老区，转往新区继续打击敌人。

日军除了军事进攻之外，也采用派遣特务和收买叛徒的办法，以达到其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大约在一九四三年秋，已被提升为独立队副队长的原二分队党代表斯符，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逮捕。他经不起日寇的威迫利诱，终于向敌人屈膝投降，并接受了敌人的条件，跑回部队

充当内奸。他诈称自己是乘敌人不备时逃跑出来的，部队不疑有他，仍让他继续工作，后来发现他利用伪“昭南日报”的公开启事，和敌人特高科保持秘密联系，传递情报，经过调查，证实他已经沦为敌奸，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一独就把他处决了。

与此同时，在新古毛地区活动的三十五中，也发现在七条石地方，有一个本已半停产的华资锡矿场，却有一批工人模样的男女在那里全天劳动，经过侦查，证实是日人特高科派来的特务，专门侦察抗日军的活动的。抗日军立即作出决定，把该批特务全部逮捕。日寇很快就进行了报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把七条石周围的所有民房全部烧光，群众被迫搬到古毛镇上去居住。在扫荡中，三十五中有一个医院被敌人发现，十余名来不及转移的重病号和医务人员全部被杀害，无一幸免。

同年十月间，在甲洞的双溪普路，特高科的特务经过侦查，发现了雪州地委书记杨果的行踪，日寇当局立即派出几十个特务，包围了杨果的驻地，经过一番战斗，杨果终于受伤被俘。正当特务们押着杨果回返特高科时，在农村活动的武工队已经闻讯赶来，在特务必经的道路上设伏，准备截救杨果，当敌人进入火力圈时，队员们便突然开火，跟着发起冲锋，特务们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则逃得无影无踪。在战士们英勇战斗下，杨果终于得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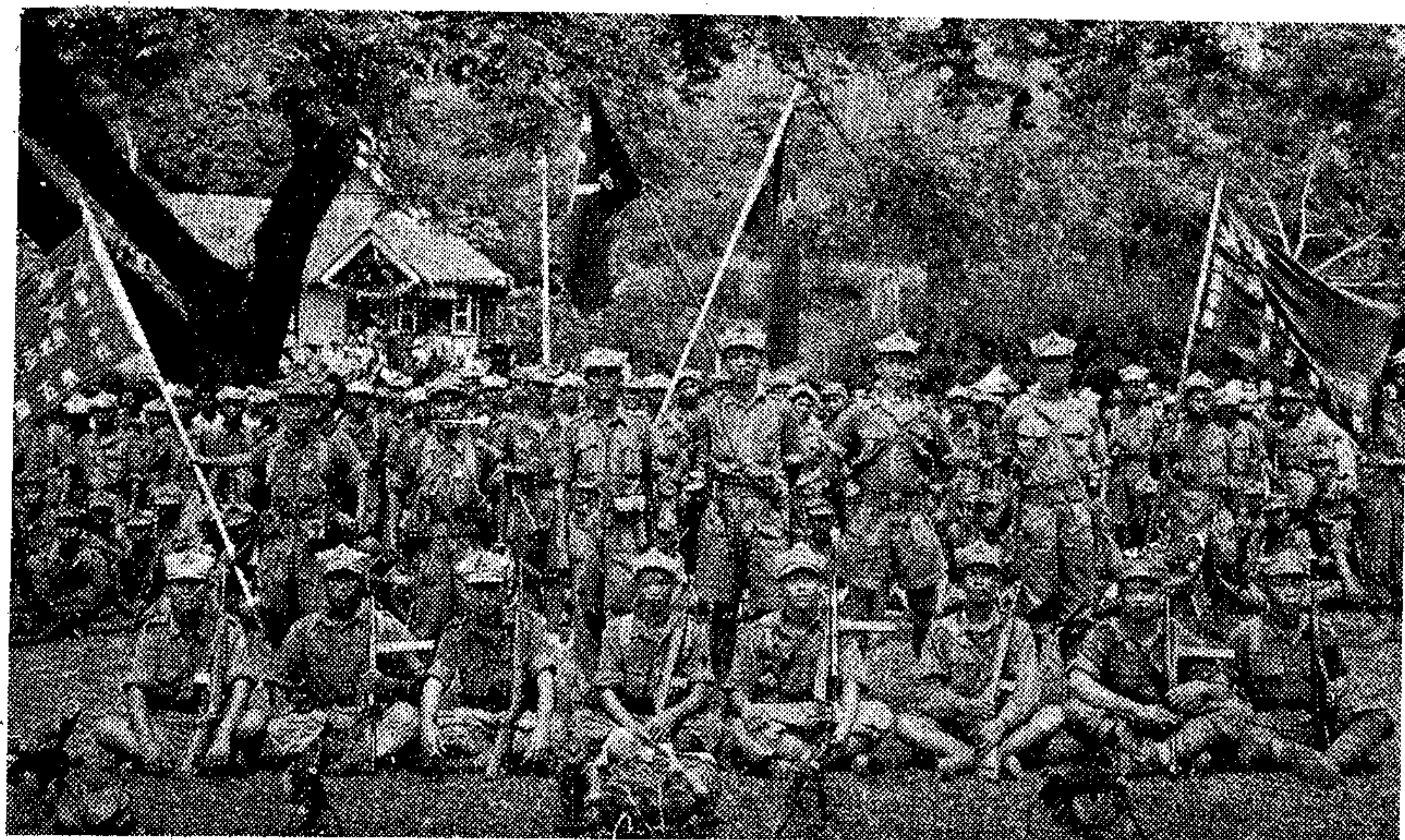
自然，日寇的特务活动并不总是徒劳无功的。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一独司令员陈天庆因事赴石山脚开会，当晚在石山脚农村歇宿，第二天临天亮时，即发现住处被日军团团包围，他和战友们冲出门来，隐蔽在不远处的一

个水塘中，日寇要他出来投降，并保证缴枪不杀，但他英勇不屈，终于壮烈牺牲。据说，日寇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还把他的遗体运到吉隆坡郊外某地安葬，并为他修筑坟墓和举行葬礼。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太平洋战局日益对日寇不利。为了配合联军的反攻，抗日军开始加紧打击敌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一独拔掉了敌人的大港据点，缴枪卅余支，俘虏了全部伪警，除一人因顽抗当场被击毙外，其余经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十二月二十四日，一独又攻占武来岸警局，一经接触，敌即缴械投降。

选入一九四五年，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更加恶化，士气逐渐低落，但是他们还在作垂死挣扎，不断地对抗日军进行所谓“肃清”。这时一独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吉隆坡郊区，并且渗透到市内去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大白天在距离警察局不远处击毙雪兰莪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黄铁珊和消灭敌宣传队队长朱某，并在新街场古腰路口伏击一个中队的日军，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和肉搏后，一部份敌兵投降，一部份溃逃，战斗总共进行了卅多分钟。这些战斗表明人民部队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已经用自己的双手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五独主动出击日军 五独曾经主动出击日军多次，其中较为重大的战斗有两次，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地点是在怡保郊区的狮甲尾。抗日军事先得情报，说有叛徒带领敌特高科特务下乡骚扰群众，于是布置了一次埋伏，结果毙伤敌特高科特务十多人，带路的叛徒郑景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一中队

华当场被击毙，大叛徒高克平*据说也于是役丧命。

另一次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在玲珑地区的遮坡甘榜袭击一队敌军，当场毙敌二十四人，缴枪廿余支和弹药一批。

但是五独的某些战斗也有失利的，比如一九四三年初四中攻打双溪警察局，一九四五年夏九中攻打安顺警察局。都失败而返，特别是攻打双溪警察局，由于情报不准，没有探明敌人在警局内有滑梯可通向战壕，结果，不但警局没有攻下，还遭受了损失，共牺牲战士两人，伤数人。

* 高克平是原马共马六甲州委书记，沦陷后不久即被捕，叛变投敌，接受日寇指示，公开组织马共伪中央，号召联日抗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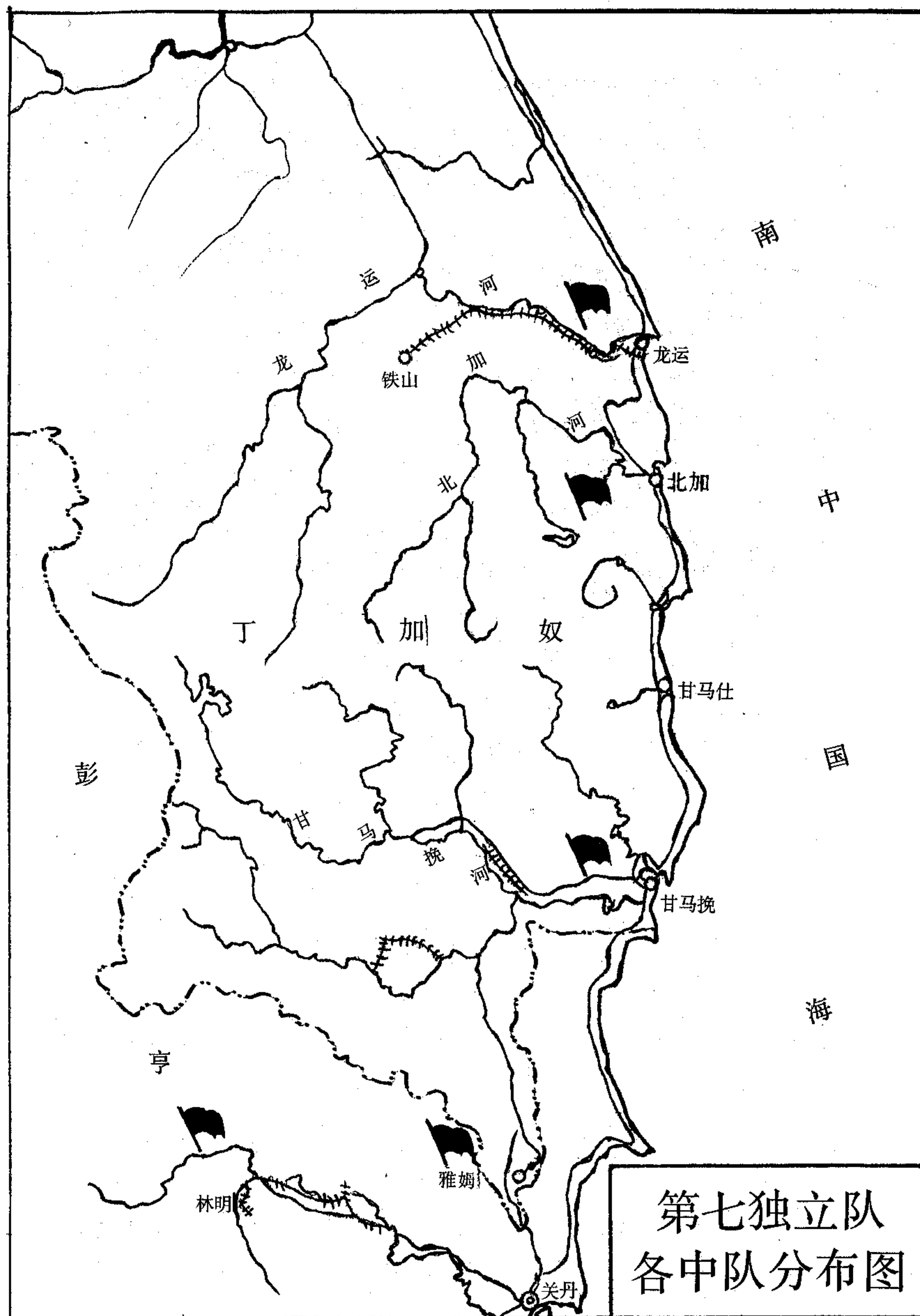
第七独立队宣告诞生 在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又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宣告诞生，它是在马共东彭地委（又叫下彭地委，后来改称东海岸特委）的领导下成立的。东彭地委在英军节节败退，关丹很快宣告沦陷的情况下，为了组织群众抗日，曾经派出吴田、庄清、张琦等廿多人在雅姆胶园组成三个抗日游击小组，趁日寇占领关丹后立脚未稳，向雅姆警察局发动进攻，只发数弹便攻下警局，缴获数十支步枪和一批弹药，同时发动群众，从战场上检获英军败退时丢弃的枪械。在丁加奴州的甘马挽、甘马仕和北加一带的抗日志士，也积极收集留存在民间的猎枪和大刀等武器，组织一支六十余人的队伍，袭击甘马仕警察局，缴获枪支弹药一批。当时因为还没有和马共中央取得联系，因此暂时称为“东彭关丹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就设在雅姆山。后来东彭地委终于在文德甲找到了中央的关系，于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统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庄清任党代表，张琦为队长，老杨为副队长，符亚山为政治部主任，吴克为后勤部主任，下辖三个中队：

第一中队：随司令部驻雅姆山，在雅姆至关丹一带活动；

第六中队：驻雅姆第二农场，在甘马挽一带活动；

第十一中队：驻林明山区。

为了打击日寇对马来亚资源的掠夺，七独成立后不久，就在邦振——林明线截击日寇运输物资的火车，卤获甚丰。日寇为了报复，随即进行扫荡。但是七独早有准备，在日军来路上设伏，日军果然中伏，这次战斗击毙了日军



第七独立队
各中队分布图

的一名指挥官和许多士兵。日寇为掩盖败绩，于是命令关丹伪维持会和自卫团等大小汉奸和暗探，组成一支数十人的招安队伍，由文某率领，到雅姆胶园抗日军活动地区进行招降活动。七独指挥部调集了两个中队的兵力，埋伏在胶园四周，并派出十几个队员化装成群众，引诱他们进来，结果敌人全部落网。抗日军除处决罪大恶极的为首份子文某和曾某外，其余全部释放。抗日军还让大资本家潘某参观营地后才予以释放。

日寇受此打击，恼羞成怒，于是动员千余兵力，从三个方面围剿雅姆山区，还出动炮艇和飞机配合进攻，计划在一个月內消灭东彭抗日军。在敌人的强大攻势面前，抗日军化整为零，并采用地雷战打击敌人，在敌人可能进攻的各个路口都埋设地雷，一等敌人大队到来，即予引爆，以此大量杀伤敌人。七独司令部又派出游击小组，轮番袭击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宁。最后，部队在雅姆至甘马挽之间的大森林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日军数十人，夺枪廿余支，并捕获迷路敌军五人。敌人所计划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围剿行动，不到半个月便草草收场，灰溜溜地撤兵走了。这是七独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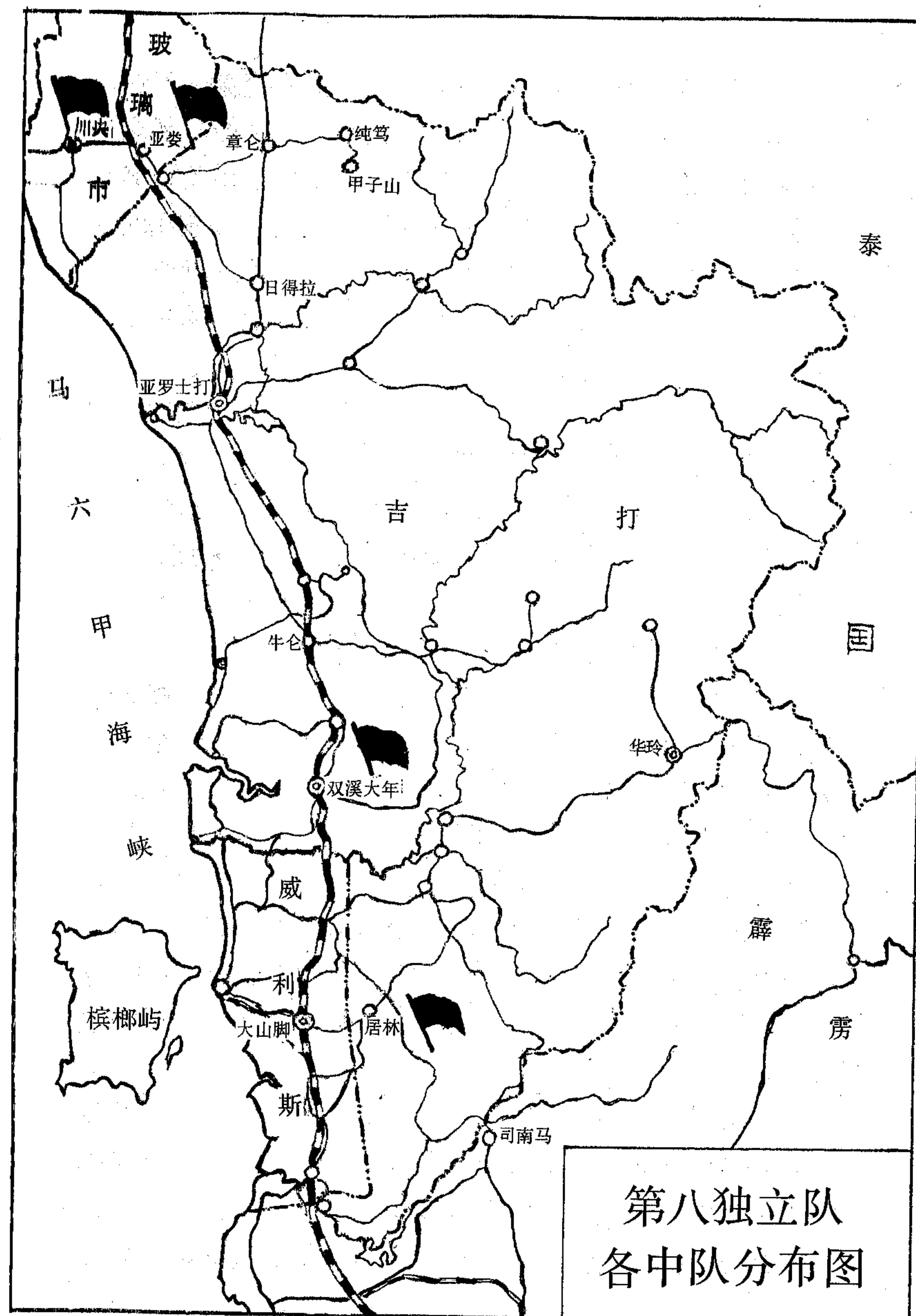
经过这次反围剿战斗之后，抗日军的士气更加高昂，群众的抗日情绪也受到极大的鼓舞，敌人则垂头丧气，龟缩在关丹市内。抗日军的锄奸小组经常出没在关丹的游艺场里，进行锄奸活动，击毙伪维持会会长张成庚，敌特高科特务张禄和击伤敌自卫团团长洪某。到了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又在北加港锡山成立了第十六中队，不久在龙运也成立了一个独立分队，另外还建立了三个大农场和几个

小农场，生产大米和蔬菜，做到自给自足。

最后成立的第八独立队 第八独立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最后成立的一个独立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投降前不久建制。队长白丝木，副队长张江海，公开队队长为何小力（又名萧立），没有任命党代表，当时共辖有四个中队：第一中队驻双溪大年，第二中队驻居林，第三、第四中队分驻加央和阿婆，共有兵员约五百余人。

八独的建立虽然迟至日寇即将投降之时，但是它的存在和活动，却早在日寇占领吉打和玻璃市两地后便开始了。当时马共吉打地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居林、牛仑、纯笃等地，分别成立了游击小组。人民抗日同盟会等群众组织也在城镇秘密进行活动。新加坡沦陷后，日寇在全马各地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马共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都受到极大的破坏，尤其是石山脚事件后，马共吉打地委和属下各区委大都被摧残，陷于瘫痪状态，但是幸存下来的干部并没有因此放弃斗争，他们仍然在各地坚持开展反法西斯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和鼓动，以提高人民斗争的信心，同时分别组织零星的锄奸活动，消灭少数作恶多端，民愤很大的敌奸走狗。

在这些分散的游击活动中，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一支由马共党员陈鲁领导的游击小分队。他们主要活动在泰马边境的新路、纯笃、甲子山（铅矿山）一带，向日寇守备比较薄弱的警察局和敌人的小巡逻队发动突然袭击，缴获敌人武器，用来武装自己。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发生的新路反击战，是陈鲁所领导的游击小分队所进行的一场比较重大的战斗，当时陈鲁率领几名战士化装成日军，成功地袭



第八独立队
各中队分布图

袭击了阿娄警察局后，回到新路召开军民祝捷会，入夜，除了派出一个战士在阿娄到新路的大路上放哨外，其余战士就在村后的茅屋里睡觉。下半夜四时半左右，几百名日军突然包围了新路村，分头摸进村中，在大路边放哨的战士发现了敌情，立即抛出一颗手榴弹，但是没有爆炸，他急忙从小路赶回宿营地，叫醒战士们从屋后的小路撤退，等到日军摸到茅草房时，战士们早已走远了，只有一位名叫白杨的战士，因为走避不及，被日军捉去，后来他坚贞不屈，被敌人用汽油活活烧死了。

游击小分队撤退到预定的地点集合后，天尚未亮，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利用日军还摸不清情况这个有利条件，组织反击。在做好部署之后，全体战士立即向原宿地快步前进，当到达新路村小街场对面的一片橡胶林时，正看见日军蹲在地上用早餐，枪支一组一组地分散架在马路边，毫无防备，还有几十个被捕的老百姓，挤在一起。小分队摸到距离敌人一百来公尺时，立即用机枪和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手榴弹也接连不断地向敌人掷去。日军慌忙拿过步枪，就地卧倒，盲目地回击，被捕的群众乘机一哄而散。等到日军看清楚游击队人数不多，组织起战斗队形向两侧迂迴包抄过来时，游击小分队借着橡胶林的掩护，早已迅速撤出战斗了。这次作战只牺牲了一个名叫小周的战士，而敌人却伤亡数十人！

新路反击战的胜利，轰动了吉打、玻璃市两州。抗日武装活动也更加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在东吉打华玲北面山区和北打吉泰马边境山区，分别建立起两个游击根据地，东吉打的抗日武装由陈鲁领导，北吉打包括玻璃市的抗日

武装，则由另一个马共党员陈古领导。在农村中活动的**武工队**力量这时也加强了，许多抗日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尽管这时敌我力量对比还很悬殊，但已经开始出现敌奸走狗不敢随意进村活动的有利局面了。

一九四四年，吉打州抗日武装开始和马共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到这时，部队的名称才更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吉打支队”，仍辖有两个游击区。一九四五年二月以后，联军开始为吉打支队空投弹药给养，这时，部队的生

活开始正规化起来。

抗日同盟会遍布全国 马共在致力建立抗日武装的同时，也着手组织抗日同盟会，把反对日寇统治的各阶层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抗日同盟会并没有全国的统一组织，而是隶属于各州地委的领导之下。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抗日同盟会的组织已经遍布全马各地。由各州地委在各个城镇和农村组织起来的抗日同盟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替游击队搜集情报、筹募基金、粮食、药品、衣物和担任交通员的工作，并通过散发地下抗日报纸等为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一个稳固的群众基础。它们经常配合人民抗日军召开军民联欢会、游艺会，以进行抗日文艺宣传，促进军民团结；它们也开办义务学校，出版街头壁报和油印小型报纸，分析日寇每个时期的政策和介绍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消息，指引人民团结战斗。据统计，当时在全国各地由人民抗日同盟会和马共所出版的小型报纸计有二十多种之多，这些报纸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的抗日群众，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兹将沦陷期间出版的地下抗日报刊臚列于下，以见一

班:

雪州: 抗日先锋报 (华文)、自由呼声 (英文)、自由报 (印、巫文)

森州: 大众报 (华文)

霹州: 人道报、北马战报 (华文)、马来亚之声 (英文)、人民呼声 (巫文)、自由呼声 (印文)

柔北: 抗日新闻、大众报 (华文)、抗日新闻 (巫文)

柔南: 群众报、打日本、抗建报 (均为华文)、胜利呼声 (英文)、打日本 (巫文)

彭亨: 人民报 (华文)

檳城: 公道报 (华文)

新加坡: 自由报 (华文)、解放报 (华、英文)

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保护下, 抗日同盟会积极领导农村地区居民开荒垦地, 进行生产运动, 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从而加强了军民的团结。它们在广阔的乡村地区, 实际上有效地行使着抗日政权的职能, 在扩大和加强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方面, 起了巨大的作用。

马共发布抗日九大纲领 一九四三年二月, 马来亚共产党召开三中执委会, 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任务, 并且发布了“打败日本侵略者, 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九大纲领, 为抗日武装斗争的向前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三大任务是: 一、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 为实现马来亚共和国, 为苏联、中国的胜利而斗争到底。二、联合

远东各被压迫民族, 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 争取远东各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三、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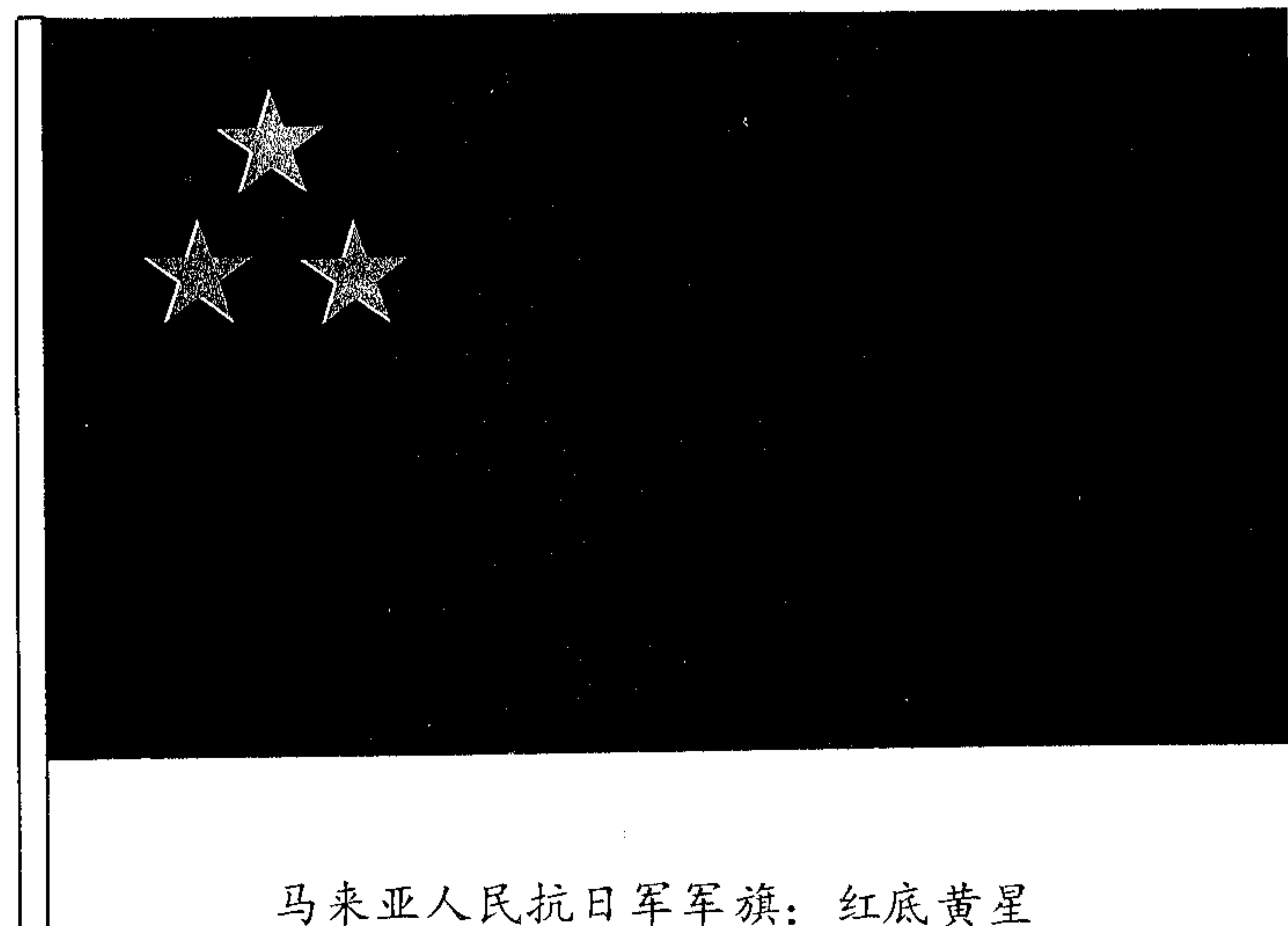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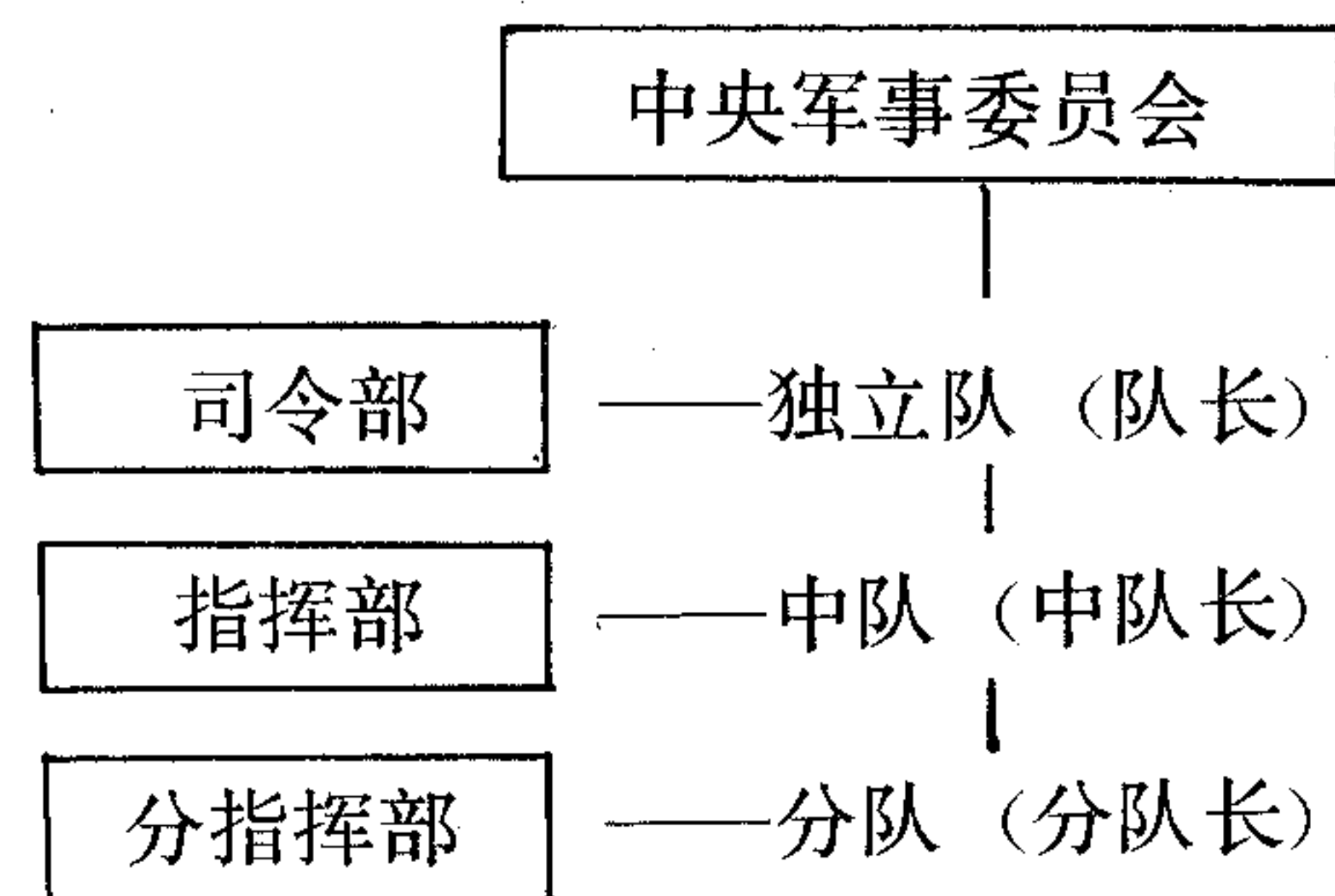
九大纲领是: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 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 保卫祖国, 实现民主权利, 改善民生, 振兴工农商业, 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马来亚。
3. 开放人民言论、出版、组织、信仰的绝对自由, 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 释放囚犯及抗日俘虏。
4. 救济失业难民, 普遍加饷、加薪, 取消苛捐杂税, 高利贷。
5.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国防正规军, 优待抗日士兵, 抚恤阵亡士兵家属, 救济残废伤兵。
6. 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教育, 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 发还被日寇没收的人民和各友邦人民的财产。
8. 实行关税自主, 建立和各友邦友好条约和商务关系, 承认友邦贸易自由。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独立, 赞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

这个纲领的发布标志着马来亚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渐趋成熟, 因为它首次阐明了党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行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 为抗日武装斗争指出了目标和方向, 因此这个纲领不仅体现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

益，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

抗日军的组织系统和分布范围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组织健全、纪律严明，活跃地区遍布全国（除新加坡外）的人民军队。兹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织系统列表如下：



抗日军的旗帜，是以红色作为底色，左上角有三颗五角黄色金星，象征着马来亚的三大民族华、马、印在抗日流血斗争中紧急团结，走向胜利。

抗日军的四大纪律是：1. 绝对服从指挥；2. 爱护人民利益；3. 没收敌产归公；4. 严守军事秘密。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织已经遍布全国（除新加坡外）。兹将各独立队属下的中队的活动范围列下，以资参考：——

第一独立队 雪兰莪州

第三中队 干增至叻思一带

第二十九中队 丹绒马林、加隆邦地区

第三十五中队 古毛地区

以上三个中队归北区司令部指挥

第八中队 武来岸地区

第十二中队 加影地区

以上两个中队归南区司令部指挥

第二独立队 森美兰州

模范中队 知知港简塘尾一带

第四十三中队 知知港半芭梨望、双溪罗丹一带

葫芦顶中队 葫芦顶一带

马口中队 马口地区

独立分队 芙蓉郊区

第三独立队 柔佛州北部

第一中队 余文打至东甲一带

第二中队 木各一带

第三中队 巴莪、蔴坡一带

第四中队 新邦基里河以北、永平一带
第五中队 昔加末、峇株安南、西隆坡等地
第六中队 金马士、大港一带
第九中队 武吉甲蓬一带
第十二中队 三合港、巴罗、美拉珍等地
第十五中队 拉美士一带
第四独立队 柔佛州南部
第一中队 新山、士乃、古来一带
第四中队 居銮地区
第七中队 哥打丁宜、旧柔佛一带
第九中队 新加兰、峇株巴辖一带
第十三中队 文律至小笨珍一带
第十八中队 丰盛港地区
第五独立队 霹雳州
第一中队 朱毛一带
第二中队 沙叻地区
第三中队 布端、波赖地区
第四中队 美罗一带
第九中队 太平地区
第十二中队 吉兰丹边境屹叻顶一带
第十四中队 和丰地区
第三十五中队 宜力地区
第六独立队 彭亨州西部
模范中队 文冬生番港至加叻一带
第162 中队 明光地区
第157 中队 文积地区

第153 中队 劳勿地区
屹叻顶中队 屹叻顶地区（后转隶第五独立队）
第159 独立分队 文德甲、加流一带
第七独立队 彭亨州东部及丁加奴一带
第一中队 雅姆至关丹一带
第六中队 甘马挽一带
第十一中队 林明山区
第十六中队 北加港地区
独立分队 龙运地区
第八独立队 吉打州及玻璃市
第一中队 双溪大年地区
第二中队 居林地区
第三中队 加央地区
第四中队 阿娄地区

收编土匪武装，扩大抗日队伍 在马来亚沦陷初期，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土匪骚扰群众的现象。原来日寇入侵后，许多林场和胶园都停止生产，伐木工人和胶工纷纷失业，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便自发地拉起队伍，收集英军丢弃的武器，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他们有时也抵抗日寇的进攻，但更多的是凭藉武力勒索群众财物，甚至公开抢劫，少数坏的更是公然强奸妇女，稍有抗拒，便遭杀害！在这些遭受匪患的地区，群众都迫切要求抗日军为民除害，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抗日军从大局出发，对于这些土匪武装一般采取团结教育和收编的方针，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只有对于少数顽固不化，继续危害群众利益的匪帮才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案。

例如上彭亨就有一支势力较大的土匪武装，为首的名叫李洪深，队员约有七、八十人。经过上彭地委派人做了思想工作后，他们表示愿意接受领导，共同抗日，初期命名为第十八中队，六独正式成立后，改编为第 158 中队由六独调派黄爱平任党代表，队长则由李洪深本人担任。李洪深被收编后，劣性不改，与抗日军貌合神离，不听从指挥，而且到处以抗日军名义勒索群众财物，影响很坏，经过耐心教育仍不肯悔改，一九四三年年底，司令部队长曾冠彪亲自带领战士六十余人，进入该队营地，要他们接受改编和调动，李洪深带头反抗，当场被缴械，并击毙十多个顽抗者。这场战斗，六独一个副中队长不幸中弹牺牲，三位战士负伤。残存的强盗份子逃亡外地，从此不敢再在上彭地区活动。

此外，在霹雳境内也有两支实力较大的土匪武装在活动，一支是以房贵（花名老鼠仔）为首，另一支以蒋石波为首。房贵的队伍主要在布先地区活动，经过抗日军的长期教育和争取后，终告分化瓦解，大部分接受抗日军的改编，只剩下房贵带领一心腹继续为盗，后来终被抗日军歼灭。蒋石波的队伍比较强大，最盛时有两百多人，活动于霹雳与吉兰丹交界地区，蒋石波是一个反共顽固份子，始终与抗日军对立，也不愿在抗日的前提下和抗日军合作，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五独不得不采取军事办法解决，联合六独展开围剿行动，蒋石波立脚不住，率领残部逃往暹马边境，战后抗日军复员，他又窜回宜力、玲珑一带活动，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底，马来亚抗英战争爆发后，人民抗英武装重新进入森林，这支强盗队伍眼看没有办法再混

下去，终于向英军投降，当时尚有八十余人。

“华侨抗日军”^①的分裂作用 一九四二年中，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也领导和成立了一支游击武装，名叫“华侨抗日军”，总部设在雪兰莪州，领导人是一些所谓资深的国民党员，其中以怡保闻人胡重益为主。

华侨抗日军据说在霹雳、雪兰莪、柔佛等地都设有支队，分别叫做第一、二、三、四独立队，其中以霹雳州的第四独立队实力较为强大，组织也较为严密。四独的总部设在峇眼那督和安顺一带，领导人是前任国民党安顺支部秘书李一文，根据地设在督亚冷一带。

华侨抗日军的人数和编制，远不及人民抗日军的庞大。据维多·巴素说，国民党游击队“为战前的职业性不良分子所组织，总人数不足五百人。”^②可见其作用之一斑。但是，由盟军潜艇从马来亚战区带出并送往印度接受特别跳伞训练、准备日后担任盟军与国民党游击队联络工作的翁信宾，为了骗取盟军的支持，却在他的报告中夸张说，国民党游击队的第四独立队“……实力强大，枪械充足，势力范围由北部的霹雳桥——其实为宁罗桥——到安顺一带。在安顺之近打河以南地带势力较小。”^③

华侨抗日军的成份也极为复杂，它除了大量吸收洪门份子之外，还有“不少曾在国内（按：指中国）受过保乡卫土训练的团练人马，与土匪打过仗，具有使用枪械及小

^① 参阅张奕善撰：《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一文。

^② 维多·巴素著，张奕善译：《近代马来亚华人》。

^③ 同^①。

钢炮的经验。……”^①所谓团练人马，实质上就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地主武装。这支军队在整个抗日期间，既不做抗日宣传工作，也不搞民运，只靠所谓“劫掠敌产”——实际上是打家劫舍，掠夺民财——的行径维持生存。

据维多·巴素说，“这支武力与抗日军曾有一个短时期的联盟。可是，这两个集团在方法、目标及生活的方式差异得太大，所以其间发生一个长时期的破裂，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国民党游击队的脱离而结束了。”^②巴素在这里所说的华抗军与人抗军的短时期的联盟其实是不存在的。到了抗日战争末期，这支与土匪无异的国民党游击队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把所谓“抗日”的枪口转向人民抗日军，在暹马边境地区多次与人民抗日军火拚，其中以屹叻顶山区的冲突事件最为严重。

屹叻顶山区位于上彭亨与吉兰丹交界处，有三批自称是“华侨抗日军”的队伍，每批约七十至一百人不等，其中一批以冯成、梁旺、刘旺三人为首的，大多是工人，思想觉悟比较高，愿意接受抗日军的领导。另一批以一个名叫高百乡的走江湖份子为首，表面上也讲抗日，但对抗日军却抱中立态度，同时不忘以“抗日”的名义向群众要财要物。最后一批则是以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的如假包换的匪帮，其为首份子名叫杨广，外号“独眼龙”，极为阴险狡诈。一九四二年底，日寇为巩固其统治，向屹叻顶山区发动进攻，冯成这批人主动要求抗日军派人领导，经研究后，上彭抗日军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派出老蔡等四人前往该

地，计划通过联合作战的方式击退日寇的进攻，从而促进团结，争取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队伍。但是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中，“独眼龙”却按兵不动，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高百乡则表面敷衍，并不积极配合，只有冯成真心实意接受抗日军的意见，动员当地群众与日寇周旋，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前后击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共打死日军五十多人，最后迫使日寇撤走。“独眼龙”看到冯成在抗击日寇进攻中深受群众的支持，害怕自己的土匪行动会受到群众反对，便阴谋制造事端，与冯成的队伍发生磨擦。总务刘旺首先成了这一阴谋牺牲品。事后“独眼龙”看到自己在群众中已经陷于孤立，冯成又接受了抗日军的领导，觉得无法再混下去，便离开屹叻顶，逃到暹马边境地区沦为流寇。高百乡这批人也发生分化，一部份投向抗日军，一部份则随高百乡流窜外地，后来，高百乡在霹雳地区被五独第十二中队俘获，畏罪自杀身亡。冯成接受抗日军领导后，被改编为六独一个中队，冯成任副中队长，后来这个中队划归第五独立队领导，冯成始终表现坚定抗日，英勇战斗，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为止。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军事当局也暗中扶植了一些马来贵族的武装游击队。据维多·巴素在他所著的《东南亚华人》一书中指出：北霹雳一三六部队的军官曾募集了一小支马来游击队，命名曰“马来效忠军”。同时，他们还在彭亨搞了一支名叫“祖国军”的马来抗日武装。对于这两支马来游击队的情况，我们知道不详，无法在此分析。

收容联军士兵和英国侨民 当英军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从前线节节败退时，有许多英、澳、印军士

^①张奕善撰：《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

^②维多·巴素著，张奕善译《近代马来亚华人》。

兵因为来不及撤退而流落于农村和森林之中，其中有一部份被日军搜捕后枪杀，小部份则被抗日军收容起来，于战争末期移交给联军方面，遣送回国。据统计，当时全马各独立队所收容的联军士兵共达七十多人，其中包括英军特派的敌后特工人员和英国侨民。

尽管当时抗日军本身的处境十分困难，他们仍然在生活上尽力照顾这些流落的盟国士兵和英国侨民。然而由于森林环境的恶劣和生活习惯的迥异，这些被收容的盟国士兵大都染病身亡，有一小部份则因忍受不了生活的折磨而私自离开森林，结果陷入敌手，遭受杀害。因此到战后余生的不过十多人而已。

在这十多个生还的人士当中，有七个是美国空军战斗员，其领袖是威尔逊少校，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空袭新加坡时被击落，乘跳伞降落在柔北森林地带，后由三独拯救和收容。另有几位是英军特派的敌后特工人员，后因粮食断绝和处境困难而由抗日军加以收容，例如留在五独的原新加坡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训育长查普曼先生，和留在四独的巴里先生和克罗斯先生等即是。查普曼在战后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森林是中立的》，忆述他在战争期间的生活经历。巴里是英军留驻柔南地区的特别队队长，克罗斯是副队长，巴里后来因为不堪森林的艰苦生活，精神过度沮丧而自杀，克罗斯则在战后也写了一本书，叫做《红色的森林》，忆述他在这段时间的艰苦经历。受抗日军收容的两个英国侨民是大胶园经理奎利先生和他的妹妹，他们都生活在第七独立队里。这十多位盟国人士都在日寇投降前不久被东南亚联军当局用潜艇接载回国去了。这些

事实表明：抗日军战士在对敌斗争中是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原则性的。

四 英军的反攻部署

成立一三六部队马来亚组 一九四三年初，国际战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局。接着，德意两个轴心国又在北非战场上节节失利。七月十日，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首相墨索里尼被人民处死，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开始崩溃。

在亚洲战场上，英美两国也在积极部署反攻计划。蒙巴登被委任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就职后，就着手组织一支特种部队，代号叫着“一三六”，总部设在锡兰岛的首府科伦坡，总指挥官是巴兹尔·古德菲罗，属有许多跟前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有关联的英国军官，其中一个战前曾经在怡保当过警察局局长的约翰·台维斯。一三六部队的中心工作任务是负责建立盟军跟各被占领国的抗日游击队的联系，以配合盟军的反攻部署。

一三六部队成立后，就委任林谋盛、庄惠泉两人为马来亚区华人正副区长。林谋盛、庄惠泉两人原是新加坡中国国民党干部，在新加坡沦陷的前三天，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在英国军事当局的安排下，与李金泉、林庆年等一齐离开新加坡，前往苏门答腊，再从巴东乘搭澳大利亚巡洋舰波巴特号前往锡兰首府科伦坡。林谋盛与庄惠泉二人到达科伦坡后，又从那里取道加尔各答，飞往中国的

战时首都重庆，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封赐的上校官阶，然后奉命重返加尔各答，负责组训当时因战争而滞留在印度的大约两千名中国海员，使他们协助印度政府进行战时的消防与运输工作。

一九四三年，蒙巴登获悉马来亚共产党所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在与日军奋战的消息，便决定派遣一支先头部队回马来亚调查实际情况。奉令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一三六部队马来亚组。

布兰丹营会谈 五月二十四日，一三六部队马来亚组指挥官约翰·台维斯奉蒙巴登的命令，率领五名华籍队员，乘坐潜水艇返抵马来亚西海岸。他们在霹雳州的红土坎附近登陆，然后潜入沿岸的各个小镇活动。六月二十五日，台维斯乘搭前来接应的潜艇回返印度，留下华籍队员继续工作。七月二十八日，华籍队员吴在新终于在木珍歪跟马来亚共产党霹雳州党委书记陈平的代表取得了联系，表达了一三六部队要寻求马共合作抗日的愿望。八月四日，台维斯再次乘坐潜艇返马活动。九月，一三六部队马来亚组另一名军官布伦米也奉令潜返马来亚，协助台维斯工作，并带来了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们逐渐渗透到怡保、打巴、美罗等地，并在抗日根据地美罗山区建立了营寨。

在陈平的安排下，台维斯于十二月卅一日与马共总书记莱特进行了会谈，地点是在台维斯自己所在的营寨布兰丹营。会议进行了两天，出席的马共、抗日军和抗盟会代表是张洪（即莱特的另一化名）、陈平和刘尧，而一三六部队代表除台维斯外，还有布伦米和刚刚潜返马来亚的林谋盛。林谋盛是在十一月二日乘搭潜艇到达霹雳州的，他

登岸后，由陈平接应，化名为陈春林，进入美罗山区森林与台维斯会合。

双方经过两天会谈后，终于达成协议，盟军方面答应供给人民抗日军武器装备、资金、军事训练、药品和补给等，但是一三六部队人员不涉及战斗任务，如果遇到日军扫荡的话，他们将尽快撤退，把战斗任务留给抗日军。人民抗日军方面则答应援助盟军，直到盟军以武力收复马来亚为止。双方对于战后的关系问题，避而不谈，英方的理由是他们是军事官员，未获授权讨论政治问题。会议结束后，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曾发出一项秘密指令，指示抗日军各独立队今后要组织公开的和秘密的队伍。

马来亚策划小组的设立 在英国军事当局积极部署反攻计划的同时，英国本土的政治官员也在处心积虑地筹划它对远东的各殖民地的战后政治策略。早在一九四三年二月，英国殖民部即与陆军部举行会议，讨论关于设立某种委员会来探讨处理战后远东各殖民地问题的可能性。到了七月份，包括马来亚在内的远东各殖民地策划小组即宣告成立。

领导马来亚策划小组的是霍恩少将。他是一个跟马来亚政治毫无关系的军官。这个小组虽然由陆军部资助和控制，但是它的工作却和殖民部密切联系在一起，主要任务是：一、制定关于战后马来亚的长远政策；二、成立和配备一支军事管制队伍，以便一旦日军投降后，迅速开进马来亚接管政权和行使政府的职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该小组所草拟的马来亚战后新宪制建议书已经大体上完成，它建议在战后实施临时军事管制期间，通过与马来亚各州

苏丹重新签定条约的方式来“简化”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地的行政结构，使之一元化。它也建议承认华人和印度人的公民地位。随着工作量的增大，小组成员人数也由初时的六人增加至二十五人。

由一九四四年一月起，马来亚策划小组的成员就陆续奉调到印度德里的东南亚联军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工作。三月廿二日，英国战时内阁的“马来亚与婆罗洲调查委员会”审议并接纳了马来亚策划小组所提出的关于在战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全部建议。五月卅一日，战时内阁会议核准了这项报告书，以此作为英国在战后对马来亚的总的政治战略方针。

至七月，马来亚策划小组的一部份成员又从印度奉调至设在锡兰坎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一九四五年三月，马来亚策划小组所拟订的关于战后马来亚军事管制的《基本计划》获得最高当局的核准。五月，小组的人数即扩增至包括一百六十二名军官和一百二十七名文官，并开始全部东调至印度。至此，英国对于战后接管马来亚的全部政治和军事部署工作已经大体上完成。

英军敌后谍报中心被破获 林谋盛返马后，就指示队员吴在新在怡保马结街七十七号开设建益栈，表面上经营暹米、机油和走私黄金生意，实际上作为谍报网中心。由于其后跟潜艇的几期接应都因日军的严密监视海面而归于失败，因而建益栈的资金周转日渐发生困难。

为了筹募资金，林谋盛决定亲自下山一行。一九四四年三月，林谋盛潜入怡保市，隐藏在近郊地区，派遣吴在新南下新加坡进行筹款事宜，而谍报中心的工作则由他自己

代为主持。但是不幸这时邦咯岛的外围情报站被日寇破获，株连所及，怡保、红土坎等地的组织都被破坏，而他的行踪也被日军宪兵队知道，在怡保通往美罗的公路上将他和另外一名队员拘捕起来，后来转押峇都牙也监狱。同年六月廿九日病逝于狱中，年仅三十五岁。

林谋盛原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县，十六岁时南来新加坡，进入莱佛士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负笈香港，进入香港大学攻读商科。二十岁时，父亲病歿，于是辍学回返新加坡，继承父业成为殷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曾经历任建筑公会会长、中华总商会董事、福建会馆执行委员等职位。由于他在战争期间曾经协助英军展开收复马来亚的计划，因此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为他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以志他的功劳。

关于林谋盛被捕牺牲一事，黄耶鲁在战后曾经公开指控说，是由于莱特的出卖所致。另方面，日人条崎护在《星洲日军暴行录》一书中也证实说：“一九四四年五月，为了筹募基金，林谋盛上校曾化名吴春霖走出丛林，并展开劝募工作。不料竟被名义上站在反日的同一立场，但实际上推行各种阴谋的马共头目莱特所出卖……”。但是事实是否如此，仍有待于档案资料的进一步证实。

一三六部队马来亚组自从一九四四年三月谍报中心被日寇破获和西海岸的潜艇登陆地点被暴露之后，就与印度总部失去了联系。四月廿四日，第三批华籍队员张德爵和郑新发两人冒险登陆成功，在抗日军代表的安排下，由交通员和武装人员护送到美罗山总部报到，才获悉外围工作泄露，机关破获，区长诸人被捕的情况。但在继后的几

个月内，马方敌后工作人员仍然无法跟潜艇取得联络。

盟军总部所派遣的潜艇人员在西岸的登陆虽然屡告失败，但是它所派遣的另一组队员却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在东岸的柔佛南部地区登陆成功，并于十二月中与抗日军四独司令部建立了联系。这一批队员共计十七人（英人八名，华人九名），以马丁少校为领导，先由印度乘坐潜艇前往澳洲受训，又由澳洲乘搭潜艇返马登陆。这一组队员与印度总部保持着正常的电报联系，经常将所得的重要情报拍发给总部。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盟军总部终于跟潜伏在马来亚西岸敌后活动的台维斯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台维斯先前所带来的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经过队员梁允明的不断努力，终于修好，台维斯就把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卅一日跟马共代表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拍发给蒙巴登。同月廿六日，盟军总部第一次空投降伞部队人员到马来亚，以增强台维斯的力量。四月十八日，台维斯再度跟马共代表莱特等人会谈，双方再次核准了上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

蒙巴登的战略建议 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英国远东最高军事指挥当局也在积极部署收复各殖民地的战略计划。

五月十一日，蒙巴登向帝国参谋委员会请示关于对待马来亚各种抗日力量所应采取的政策问题。他汇报说，在马来亚有三股抗日武装力量，第一股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这股力量虽然包含有共产主义的成分，但是据他看来主要的倾向还是抗日的。第二股是国民党的抗日队伍，情况还不大了解。第三股是马来人的

游击组织，其力量微不足道，而且组织似乎未臻完善。为了取得军事上的有利条件，他建议接受第一股和第三股抗日力量的帮助，同时进一步了解国民党游击队方面的情况，以确定对它的政策。蒙巴登指出，接受人民抗日军和人民抗日同盟会的协助，其主要危险是共产党人可能在战后会提出给予华人以平等公民地位的要求，因此他希望英国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方法，公开发布一项关于战后马来亚的政策，其中包括给予那些选择马来亚作为永久居留国的华人以公民权，从而制止共产党日后代表华人提出这项要求。英国对于各种抗日力量的军事援助，应以它们接受英国军事当局的指示行动为条件，而且在战事结束后必须采取行动解散游击队。

六月七日，帝国参谋委员会接纳了蒙巴登的全部建议，但是指出：关于战后马来亚的计划还在草拟之中未能立即发表。参谋委员会也指示蒙巴登要给予马来抗日运动以鼓励，以免显得有厚此薄彼之嫌，而且英国军事当局跟抗日运动的任何联系，都只能局限于军事方面而已，不得涉及政治的讨论方面。

八月四日，蒙巴登又提出一系列新的建议。他提议说，帝国参谋委员会应该授给他接受人民抗日军和人民抗日同盟会全面合作的权力，而且允许他诱使马来抗日力量与前者合作，但是英国军事当局对于国民党方面则不应该有任何的交往，理由是：抗日军与抗盟会是热切地‘亲马来亚’的，而国民党则带有种族主义倾向，主张马来亚华人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而且，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华侨抗日军彼此水火不相容，因此英国

人难以同时支持双方云云。蒙巴登认为，共产党人的‘亲马来亚’的政策虽然旨在把英国人驱逐出马来亚，建立一个受共产党控制的共和国，但是如果英国人答应给予华人以平等公民地位的话，那么马共的普通成员或许会放弃这些观点的。因此，他再度促请发布英国对于战后马来亚的计划。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来得太突然，因此帝国参谋委员会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和决定蒙巴登所提出的这些建议。

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把反攻马来亚的作战时间从十一月份提前到八、九月间，于是加紧空投物资和人员到马来亚，以增强游击队的力量。在六月份和七月份期间，它一共向马来亚空投了二百四十九次，在八月份和九月份期间，空投的次数更激增至七百五十六次，据统计，被空投进入马来亚森林的战斗人员共达五百多人，空投的武器和物资超过七千包以上。

拉练作战行动 英军收复马来亚的作战计划叫做“拉练行动”，由第三十四军辖下的两个师和一个旅的兵力组成，意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马来半岛西南岸的巴生港与波德申之间的海滩登陆，他们一旦占领了滩头阵地之后，就会分兵两路，一路北上，直指吉隆坡，另一路南下，进攻新加坡。不过鉴于进攻新加坡时将会遭到日军的负隅顽抗，因此必须先等到登陆的兵力达到五个师，一个装甲旅、一个降伞旅，而且第十五军司令部和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都已达到之后，才能发动进攻。英国希望能够在登陆后的三个月内拿下新加坡，然后再从吉隆坡派出先头部队往北面作扇形展开，收复马来亚内陆的其余地区。跟随部

队参与作战行动的还将有十支民政作战别动队、两支警察别动队、一些处理交通运输与供应品问题的民政官员、两支医疗卫生小队等。

但是，由于日军的突然投降，英军的这一作战计划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因此它的可行性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历史并没有机会予以证明。

第五章

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一九四四年起，战局日益对日本不利。六月十日，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这意味着“大东亚圣战”快要失败了。一个月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提出辞职。八月，美军在关岛登陆，揭开了反攻战的序幕。十月十五日，美军又在菲律宾登陆成功，歼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雄一时的海军联合舰队。

一九四五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走向最后胜利的一年。由年初起，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更加频密。据日本参谋部统计，在这一年首五个月的空袭中，日本军民伤亡人数共达二十一万四千余人，其中以三月十日东京所受的空袭伤亡最为惨重。当天，美国军事当局共出动了一百卅架飞机，对东京进行猛烈轰炸，共投下十九万枚燃烧弹，在两个半小时内，东京百分之四十的地区都成了火海，炸死了居民八万九千人！

一 日寇投降和人民抗日军接管城镇

日寇的垂死挣扎 在前线节节失利、败报频传，后方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力量又日益壮大的情况下，马来亚日寇占领当局也变得更加疯狂起来，决心作困兽之斗。他们一方面采用最残酷的“讨伐”行动进击游击队，另一方面又向三独和四独施展诱和的阴谋，但是遭到人民抗日军的坚决拒绝。当这一阴谋遭受失败之后，日寇就采用煽动民族冲突这一更加血腥的手段来达到其打击抗日军的目的，造成空前规模的民族相互残杀的严重局面。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日军化装成抗日军，窜到柔佛州西岸的新加兰一带的圆教堂里杀猪和吃猪肉，还在教堂里到处大小便，亵渎先知穆罕默德，以激起不明真象的马来群众对抗日军的仇恨情绪。接着，他们又假惺惺地跑来向马来群众表示同情慰问，鼓励他们向华人报复，然后发枪支给他们，并派遣马来兵补和马来警察参与其事，以加强暴徒的力量。日寇声言：凡华人支援抗日军者，可以就地格杀勿论。这样一来，一幕屠杀华人的血腥惨剧就首先在柔佛州西海岸的峇株巴辖、新加兰等地上演了。

针对日寇的疯狂排华阴谋，抗日军始终坚持教育为主的方针，以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揭露日军挑拨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但是因为同时打击为首的顽固份子，因此收效不大，排华浪潮很快地向巴力拉惹、新加兰、文律、巴力亚年、巴力土隆等地蔓延开去。暴徒不但洗劫华人财物，而且见华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房屋也一律被纵火焚毁。抗日军只得改变做法，配合组织起来的民众自卫队，加以反击。在中江和眼东两地的战斗中，抗日军一举而击毙了为首的暴徒和混杂在暴徒中间的日寇指挥官，大奏凯

歌，排华浪潮才稍为敛止。可惜在此役中抗日军第十三中队长^本水光荣牺牲。接着，四独又在龙引市伏击大队来犯的日军，毙伤敌军数十人，日军五名指挥官全部被击毙。又在文律狙击日军数小时，救出被困在市内的华人群众千余名，抗日军于是声威大振，不少被蒙蔽的马来群众也纷纷脱离暴徒队伍，至此暴徒队伍遂呈瓦解之势。恰好这时日寇宣布投降，抗日军大队开到市镇来维持秩序，这一场民族大残杀的惨剧才得以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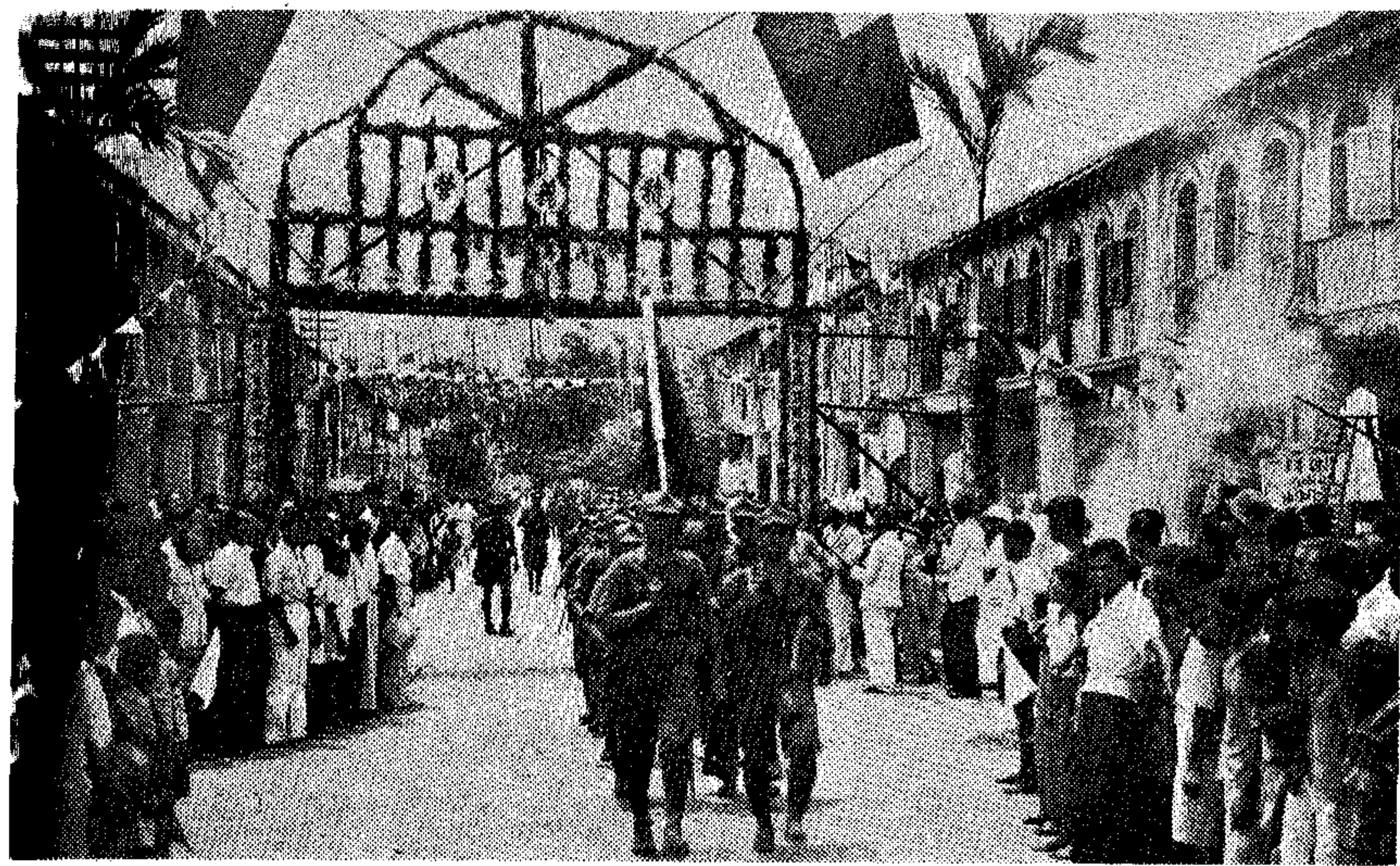
日寇除了公开武装马来暴徒以挑起华马两大民族的互相残杀之外，还雇用了许多华人鸦片鬼和民族败类，化装成抗日军到警察局去上演所谓“归顺”、“招安”等丑剧，以蒙蔽抗日群众。但是在“大东亚圣战”即将面临末日的情形下，这一切垂死的挣扎都只是枉费心机的。

日军投降和抗日军进城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九日，苏联红军攻陷柏林，纳粹头子希特勒服毒自杀。五月二日，柏林解放，欧洲方面的战事宣告结束。

六月廿二日，日皇裕仁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召集首相、外相、陆相、海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等所谓“六首脑”商量战局。裕仁对于战争前途表示失望，要求“立即实现和平”。七月廿六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宣言”，力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在军方代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了这项要求。八月六日，美机在广岛市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杀害了十三万日本人民，使日本全国震惊。八日，苏联又向日本宣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总反攻和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百万关东军迅速被消灭。九日，美机再次

在长崎市投下原子弹，造成八万人伤亡。眼看大势已去，日皇在十四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结束战争。十五日早上，日皇在东京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战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法西斯对马来亚人民的三年八个月的黑暗统治也同时宣告终结！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

八月十七日，即日寇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天，马来亚的一三六部队人员就接到东南亚盟军总部下达的停火令，和“命令”人民抗日军人员不要进入城镇的指示，理由是他们不知道日军是否会接受或遵守停火令。但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不理睬英军的这个“命令”，立即下令各独立队进城接管全国大小城镇。



积莪营人民欢迎抗日军入城盛况

抗日军在数日之内就接管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全国大部份城镇。抗日军进城时纪律严明，军容整齐，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城镇居民竖起牌楼，用素馨花、木槿花、椰叶和芭蕉叶作点缀，夹道欢迎抗日军入城，并举行胜利大游行。以下引述李郁所撰《日寇侵占登嘉奴见闻录》一文所记述一九四五年八月卅一日人民抗日军接收丁加奴的情景，可见当时人民抗日军深受人民拥戴之一斑：

“十时许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第十六中队由黎队长领导到登市接收，吾国旗（笔按：指中国国旗）即于是日起飘扬空际。欢迎之民众万人空巷，道为之塞。黎队长演说再三致意，感谢侨众，嘱暂回家，才得勉强行车。”

抗日军进城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收敌寇警察局的枪支、弹药，并协助抗日同盟会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没收敌产企业，仓库粮食和布疋等，负起维持治安、救济难民，恢复交通等工作，安定了战争结束初期的社会秩序。其次是逮捕敌奸特务，成立由各阶层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法庭，举行公审大会，公审的程序一般上是由抗日军代表先宣读罪状，然后经过法庭审议，法官定讞，群众通过而成最后判决。接着，是由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代表正式推选成立各级人民委员会，以取代临时治安委员会，真正行使政府的职能。当时全国各地所成立的州级人民委员会计有：雪兰莪人民委员会、柔北人民委员会、柔南人民委员会、丁加奴人民委员会、新山人民委员会、马六甲人民委员会等。



新山市军民举行胜利大游行

各地日寇驻军对于抗日军接收城镇的行动，基本上采取‘冷静’的态度，没有跟抗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仅在马六甲一地例外。马六甲人民委员会于九月三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刚从日寇监狱中获释的进步人士吴世健、郑学琛等人，他们甫从监狱出来，就出版《大众报》，揭露日军的暴行。日寇驻军头目大本恼羞成怒，竟于九月五日上午率领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军封闭了《大众报》，午后又率兵包围人民委员会会所，逮捕了吴世健、郑学琛等十四名委

员，于当天晚上用汽艇押往五屿屠杀，幸亏中途有四人逃脱，最后押至目的地杀害的仅十人而已，惟其中两人因伤势较轻，后来被救回治愈。

马来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计划 原马来青年联合会领袖依不拉欣和布哈努丁二人，在日寇投降前夕，即一九四五年七月间成立了“半岛暨印度尼西亚人民联合机构”（KR I S）；继续推行他们的马印合并建国的计划，但是由于他们两人跟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和哈达二人在霹雳州太平所进行的会议归于失败，因此这个运动也就告吹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依不拉欣曾经派遣代表到吉隆坡跟抗日军代表接触，建议共同以武力抵抗英军重返马来亚，但是当他正在等候抗日军的答覆时，忽然又改变了初衷，决定动身到椰加达去，原因是害怕英军重返马来亚时会把他逮捕起来，治以通敌之罪。依不拉欣后来定居在苏门答腊，一直没有回国。英军重返马来亚后，果然立即逮捕了所有的志愿军成员和半岛暨印度尼西亚人民联合机构的会员，依不拉欣可说有先见之明。

二 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

英军登陆 正当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忙着接管全国大小城镇，致力于建立具有初步政权性质的各级人民委员会的时候，英军的先头部队却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打着“向日军受降”和“维持秩序”的旗帜，重返马来亚，攫取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四日后，英军主力部队又在马来亚西南岸的摩立海滨大举登陆，九月十二日占领了吉隆坡。负

责占领新加坡的是第十五军，负责占领半岛的则是第三十四军。

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后，立即在全国各地成立军事管制政府，实行军政统治，把马来亚再次变为英国殖民地。

九月十二日，日寇马来亚区司令坂垣代表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在新加坡签署投降书，接受投降的是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登。

九月十五日，英国最高军事当局把第十五军和第三十四军两个司令部合并起来，成为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负责管制整个马来亚，并宣布成立军事管制政府，直接听命于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军事管制政府总部设于新加坡，首脑是前马来亚策划小组主任霍恩少将，其职衔叫做民政长官。军事管制政府下分两个行政单位，一个负责管制新加坡，一个负责管制马来半岛。

英国为了巩固它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地位，在军事管制政府成立后不久，就着手解散各级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抗日军的工作。它首先用怀柔政策，邀请马共参加所谓“咨询委员会”，用以代替各地的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所谓“咨询委员会”，实际上是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所玩弄的一种政治欺骗手段而已，因为它们的成员，除了马共代表之外，还有敌奸和不在马来亚战场的“战争英雄”以及其他的社会渣滓。接着，它又在“授勋”的名义下，诱使抗日军放下武器。由于当时的马共领导层对于国内外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因此他们竟然容许各地的人民委员会，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起，先后被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所和平接管，而且在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接受了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所提出

的解散抗日军的计划。

马共斗争策略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空前澎湃，亚非拉三大洲的人民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使它加速走向崩溃。历史的洪流，正朝着有利于包括马来亚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革命运动的方向推进。

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日寇投降后迅速接管了全国大小城镇，在广泛的城乡地区普遍建立了具有初步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爱戴，而马共也再一次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党员迅速发展到将近八千人，有组织的群众达五十万人之众，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一支经过战火考验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经历了严酷的战争锻炼的各族人民，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强烈要求实现国家的政治独立和持久和平。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在日寇投降的历史转折时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莱特，却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分析，说什么“马来亚华族、印族是外侨，马来族则是本地人，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华族和马来族之间存在不平衡。群众受了很多苦难，希望和平，不支持我们再打。世界大战结束了，联合国已经成立，国际上和平气氛。”^①他并以这个分析作为根据，主张全党放下枪杆子，停止武装斗争，转而采取人民阵线的和平战略，继续反对英国重建

殖民统治的斗争，“把公开队复员，武器交出去。把秘密队解散，武器则收藏起来。派干部战士去做群众工作，准备以后再打。现在先争取自治，以后才争取独立”。^②由于当时党内的广大干部党员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还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做好建立政权的工作，更没有把抗日武装斗争的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因此在日寇骤然投降的混乱局势下，不能对国内外的新形势作出正确的和清醒的估计，盲目接纳和执行了莱特所提出这条错误路线。

八月廿五日，在莱特的主持下，马来亚共产党举行了中北马领导干部会议，通过了莱特所提出的新的八大主张，其具体内容如下：

1. 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联盟，拥护新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
2. 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所普选的民意机关。
3. 废除日本统治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法令法律。
4. 实现言论、出版、组织、集会、信仰的绝对自由。
5. 振兴工商业，改善民生，加饷加薪，救济失业和难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6. 实行民主教育，废除旧教育，用各种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
7. 平抑物价，审判贪官污吏和投机黑市份子。
8. 优待抗日士兵，救济死亡将士家属。

这八大主张虽然是抗日九大纲领的继续发展，但是原

^①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编辑部文章：《马来亚共产党的光辉战斗历程》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

^② 同^①。

有的两条重要纲领，即：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改编人民抗日军为国防正规军却被放弃了。这是马共历史上所犯的一次最严重的和无法弥补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奉令解散 在和平斗争路线的指引下，马共在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接受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所提出的解散抗日军的计划。十一月廿二日，人民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刘尧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招待各界人士，就抗日军全面复员一事发表谈话，他说：“……这次本军的解散问题，是英军司令部提出的，我们很同意。因为第一，今天战争已经结束，全世界已重新恢复和平，马来亚已从日寇的占领解放出来，应该进入民主建设时代，本军抗日任务已经完成，抗日军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今天全世界人民热烈地拥护联合国，到处展开巩固和平保卫民主的斗争。从日本殖民政策解放出来的马来亚人民也正以满腔热情，争取民主制度在马来亚的实现。争取民主保证和平已成为每个人的任务，而且决定于人民的团结的力量，人民觉悟的程度，所以武装组织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三，过去我们拥护马共抗日九大纲领，把本军改编为国防正规军，但这次是英军和平接管马来亚，马来亚人民主要任务是协助英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马来亚，而英政府在今天和平的环境中，会有力量与方法保卫马来亚，所以，我们认为解散是应该的。”

不管刘尧个人是否同意解散人民抗日军武装这个观点，但是他的谈话无疑是代表了整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和马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十二月一日，抗日军各独立队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正

式解散。据称当时共有六千八百名抗日军战士缴出各式武器五千四百九十七件。英国军事当局在全马的十二个地点举行了所谓复员检阅典礼，每个抗日军战士获得三百五十元的所谓慰劳金，并给所谓抗日有功的抗日军将士颁赐了奖章。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份的月报中沾沾自喜地说：“本月初对于抗日军的解散工作，在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抗日军所缴出的武器超过预期的数目，在森美兰州，我们发给一三六部队的武器只占全部缴出的武器的百分之十五而已”。

抗日军复员之后，为了继续团结同志，联络感情，互相学习，先后在各州成立了退伍同志会。而马来亚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反抗日寇的侵略与占领的斗争，也到此宣告结束。

陈田对《马来亚的反抗》一书的一些意见

罗武编著的《马来亚的反抗》一书中，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有些地方则与史实不符，现仅就我所知道的，提出意见如下：

（一）第 17 页倒数第三行：“十二月二十日，英国殖民当局释放了全马各地的共产党人和抗日份子，……”

建议改成：“从十二月二十日起，英国殖民当局陆续（或分批）释放了全马各地的共产党人和抗日份子，……”理由是 41 年 12 月 20 日英军释放的是部分共产党人和抗日份子，不是全马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抗日份子。林江石、杨果、陈锡清、黄耶鲁、陈涌等是在新加坡首批获释的马共主要干部。关在柔佛居銮的一批同志（如陈培农等人）迟至 42 年 1 月中旬才释放。

（二）第 18 页末行至第 19 页第三行：“……十二月二十八日，陈嘉庚和华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二百余人应邀出席了汤姆士在总督府召开的会议，共商抗日大计，其中包括甫从监狱中获得释放出来的共产党人林江石、林亚当、黄耶鲁等人。十二月三十日，新加坡华族各界代表集会于中华总商会会所，正式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

建议改成：“……十二月二十八日，汤姆士邀请各党派、各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陈嘉庚等华人各界知名人士共二百余人到总督府开会，共商抗日大计，其中包括马共代表林江石、林亚当、黄耶鲁以及马共领导的地下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的代表……”理由是：这样改比较符合当时情况，当时应邀的除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地下群众组织代表之外，还有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代表、中国民主人士胡愈之、邵宗汉和各主要华文日报主编等人。

（三）第 45 页第十一行：“另一个疏散地是彭亨州马口的天主教新村。”

马口当时是属森美兰还是属彭亨？如属彭亨，可不改，否则，应改。

（四）第 50 页第 9 行：“……因为迷失道路，便把武器藏在丛林里……”

据事后到柔北三独找关系的黄国平说：“因为迷失道路，他们便把武器藏在树胶园里，……”

（五）第 51 页倒数第 4 行：“第三独立队成立时约有六十名骨干，都是从雪兰莪州各地挑选出来的马共党员。”

建议改成：“第三独立队成立时的六十名骨干，大多数是从雪兰莪和吡叻两州挑选出来的马共党员。”理由是：三独的六十名骨干不是全都从雪州各地挑选出来的。在这六十人中，有六人来自新加坡（其中有以余洪为首的四个工人党员，两个学生党员），其余的五十四人来自雪、吡两州，据说来自雪州的同志当中，有一些原在西彭工作。至于多少人原在雪州工作，多少人原在吡叻工作，现已记不清，只记得雪州的同志占多数，其中有陈书、萧尔新、阿元、公干、小刘、大保、小玉、小白、阿元的弟弟（名字已忘了）等等；来自吡叻的有李德明、罗彩生、关江海（即叛徒何浪）等等。

(六) 第 52 页第三行起所谈的关于“第三独立队司令部领导成员和属下两个中队负责人名单”，与事实出入较大。现将当时实际情况分述为下：

(a) 当时中央代表宣布的只是司令部领导成员的名单；没有宣布两个中队负责人的名单。中队负责人都由司令部到柔北后在各该中队筹建时讨论决定后，由司令部任命并向中央报告备案。

(b) 离开星洲前夕中央代表宣布的三独司令部领导成员是：党代表陈书；队长余洪（即阿福），副队长小杨（即吴科雄）；政治部主任萧尔新，副主任陈田；保管部李德明。

出发时，队长余洪因病未随行，中央决定他暂留星州治病，一俟病愈，立即赴任。后来，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加上四独缺少干部，中央便决定余洪同志到四独任司令部队长。**42 年 5 月**，莱特到三独开会时，才把这一决定传达给三独司令部，并且代表中央任命小杨接替余洪为三独队长，萧尔新为副队长，政治部主任由陈田暂时代理。**42 年“九一”事件**后，中央任命小林同志为党代表，接替在“九一”事件中牺牲的陈书同志职务；同时，决定从三独调走陈田和李德明两人去柔南。此后，三独司令部领导成员又经历了一些变动。萧尔新在日本投降后脱离革命。当时抗日军尚未复员。我记得他带着老婆从柔北去新加坡，途经新山时曾到我们部队的办事处歇脚，我问他是否调动去星州，他愤然回答：“我是被人家用大扫帚扫出来的！”大有恶人先告状之概。

(c) 至于三独几个中队的负责人，据我在 **43 年 2 月**离开柔北之前所知道的，计有：小刘（即后来蜕化为马六甲反党集团头子），小玉（即李友瑞），公干（煤炭山工会干部，抗日时期牺牲），阿元，大保（和平后在马总工会机关报编辑部工作），开发，何浪，**XX**（在东甲金山岭被自己同志误伤牺牲的中队长，恕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43 年 2 月**之后，还提拔一些同志当中队干部，其中包括昌明、叶汉、王香圃等人。

(七) 第 52 页第十一行：“过了永平不远，便向左拐进一条黄泥路，找到了先头出发的人……”

事实是：不存在“找到先头出发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派先头出发的人。”

我们是 **41 年 12 月 20 日**从新加坡动身的。这之前两天，即 **12 月 18 日**，英军当局派人先用军用卡车把我们的全部炸药和一分子弹、手榴弹和粮食送往柔北目的地（据说当时是昔加末以北的地方），我方派二、三位同志陪同前往，以便认识收藏这些弹药和粮食的地点。由于战局发展很快，他们没能到达昔加末，便被迫将这批东西草草收藏在拉美士以北不远的丁能地区，然后返回新加坡。我方这二、三位同志也回来，并在 **12 月 20 日**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过了永平不远，便向左拐进一条黄泥路”，到了一片小胶园地带，那里叫做顺天港，我们在那边找到了柔北地委的交通员阿信同志。通过他到麻坡找到柔北地委和关系。同时，在顺天港芭边一个难民营同一批来那里避难的三合港商店的主人建立了联系。这为往后筹备资金，粮食及其他供应品打开了道路。

(八) 关于“陈田任特别队翻译”一事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里顺便简要谈谈特别队的情况。

特别队是根据党中央同英当局达成的协议于 42 年 1 月成立的，全队干部战士共约四十人，都是马共正式党员，90%以上来自柔南。成立时，中央委任的领导成员是：党代表小康（柔南地委委员，“九一”事件中牺牲），队长何排，副队长大友，管理部阿波（此人后来叛变，被四独在一次伏击战中俘获，经公审后枪决）。特别队由中央直接领导，柔南地委和四独司令部协助解决该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特别队指挥部下设三个小队，小队长有水连（新加坡码头工友）、大清、陈苟、阿华、阿菊等同志。

小康同志牺牲后，到 43 年二月陈田继任党代表之前，该队指挥部由大友、黄美德、何排、阿波、小友担任。陈田接任特别队党代表之前不久，何排、阿波先后调离该队，陈田到任后，黄美德也调走了（此人后来作叛徒，在吡叻被我抗日军消灭）。这样，指挥部剩三人，即陈田、大友（任队长）、小友（任管理部）。小友后为柔南地委，“九一”事件中被捕，后逃出来回到柔南，日本投降前夕中敌人埋伏牺牲。

陈田到任时，《解放报》已迁进该部队。据说《解放报》于星洲沦陷后迁入雪州，“九一”事件后，才迁往柔南特别队。该报当时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陈涌、兰加、李秀端、陈干儿等四人。陈田到任后，中央决定他参加《解放报》（英文版）的翻译工作。这之前，中央还决定在该部队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由蔡克铭同志主持，校舍、课室、礼堂等则由特别队负责建造。当校舍、礼堂、桌椅等已建成时，传来了蔡克铭被莱特出卖而英勇牺牲的消息。抗日军政大学也因而未能办成。后经中央批准，改办柔佛地方党校，由兰加、陈涌、小友、陈田等同志分别担任政治理论和军事教员。

一九四四年初，中央决定四独司令部改组，并把特别队划归四独司令部领导；任命陈涌为四独司令部党代表，阿电为队长，卢成为副部长，其他司令部成员有：“陈路、陈田、张天和（即李南学）和小饮（即小马）。特别队的小友继续为柔南地委委员。《解放报》也改组，兰加调往柔北。《解放报》日常之作（主要是出版《每周电讯》和英文版。华文《解放报》每月出一期，由陈田兼管）。部队扩大后，四独司令部领导成员增加炳光和王环光两人。第一批英军联络官到达后，陈田调出《解放报》。此后，中央决定建立公开和秘密司令部。陈涌在 48 年事变后叛变。

（九）第 90 页列出各州抗日时期出版的地下报刊中，柔北方面，应加一个部队华文文艺月刊《艺兵》；柔南方面应加一个部队综合月刊《红星》（华文）。同时，书中所说的柔南有个《抗建报》（华文），不管在柔北或柔南，直到日本投降，我从未听说过或看见过这一刊物。

（十）第 94 页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各独立队属下的中队的活动范围”一节中，提到四独属下的中队也与事实有出入。

事实应该是：第一中队（公开）：新山、士乃地区（原秘密队一中改编）

第二中队（公开）：和平、哥打丁宜地区（原秘密队七中改编）

第三中队（公开）：古来、士年纳（原秘密队四中改编）

第四中队（公开）：居銮（原秘密队九中和四中一部分改编）

第五中队（公开）：峇株巴辖地区（由原九中一部分成员和后备队员编成）

第十二中队（秘密）：玻璃城、财成、古来油子山

第十八中队（秘密）：丰盛、兴楼

第二十中队（秘密）：笨珍地区

第三十三中队（秘密）：边加兰地区

秘密司令部的警卫队

庄生

1983年5月20日